

目 录

| | | |
|-----------------------|-------|--------|
| 土默特部蒙古语初考..... | 卜·图力更 | (1) |
| 我的回忆(续)..... | 云 祥 生 | (21) |
| 二叔走了以后 | | |
| ——对一户抗属的忆述..... | 云 荫 | (41) |
| 查获归绥国民党三青团女主任的经过 | | |
| | 塔 拉 | (56) |
| 《蒙古知行月刊》创办的经过..... | 殷 石 麟 | (60) |
| 亲历见闻片断杂忆..... | 张 希 孟 | (67) |
| 哲布尊丹巴搞外蒙独立时 | | |
| 土默特人的参与概况..... | 张 尔 杰 | (83) |
| 下里巴人之话 | | |
| ——土默川上的歇后语..... | 云 瑞 | (96) |
| 土默川农谚百条试释..... | 王 道 | (104) |
| 从历史档案看土默特煤矿业的开发与矿权之斗争 | | |
| | 石 志 余 | (126) |
| 土默特蒙古户口地的由来与变迁..... | 彭 勇 | (170) |
| 土默特地区戏曲..... | 崔 殷 月 | (179) |
| 逸闻三则..... | 官 步 生 | (189) |
| 土默川烟毒史话..... | 张 尔 杰 | (193) |

土默特部蒙古语初考

卜·图力更

前 言

蒙古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它属于阿尔泰语系。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族、通古斯—满语语族和蒙古语语族。蒙古语语族又包括莫戈勒语、达斡尔语、蒙古尔(土族)语和蒙古语等诸语言。

现代蒙古语分卫拉特(西部)方言、布里亚特(北部)方言和内蒙古—喀尔喀(中部)方言。卫拉特方言包括伏尔加土语群、科布多土语群和准噶尔土语群；布里亚特方言包括西部土语群、东部土语群和南部(或色楞格)土语群；内蒙古—喀尔喀方言包括察哈尔土语群、鄂尔多斯土语群、科尔沁土语群、巴尔虎土语群、库伦喀尔喀土语群、西部喀尔喀土语群和东部喀尔喀土语群。

一、土默特蒙古语的系属

西土默特蒙古语自十三世纪以来，应隶属于内蒙古

一喀尔喀(中部)方言,它是现代察哈尔土语群中分布地域上不太广,使用人口较少的一个土语。为了追溯土默特蒙古语的历史演变,应先将蒙古语中部(内蒙古—喀尔喀)方言的形成及其历史发展概况阐述一下。

大家知道,额尔古纳河东岸一带,是蒙古民族兴起的发源地或历史摇篮^①。大约从公元七世纪开始,蒙古诸氏族或部落逐渐西迁,到了十一、二世纪的时候,蒙古诸部落基本上被分为“森林”部落(即林木中的百姓)和“草原”部落(即毡帐里的百姓)两大群。当时,蒙古“森林”部落居住在贝加尔湖沿岸和叶尼塞河上游一带;蒙古“草原”部落则游牧于呼伦贝尔湖和阿尔泰山山脉一带。经过几个世纪的繁衍、发展,蒙古“草原”部落逐渐分布在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内蒙古地区。他们世世代代生息在这个地区,从事畜牧业,保持着游牧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往往被称为本土或本部蒙古人。换句话说,他们正是蒙古贵族首领成吉思汗的祖先。

内蒙古和喀尔喀蒙古人主要是从古代蒙古“草原”部落繁衍而来的。蒙古“草原”诸部落,在古代多半是处于大联合、小分裂的社会状态。大约在十一世纪初叶,他们之中,以塔塔儿部为首的部落称雄于蒙古高原地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曾经是蒙古“草原”诸部落或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势力强大。因此,当时的

注^① 参见《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汉文版,第10页。

塔塔儿部(鞑靼部)便成为蒙古“草原”诸部落的代名词。到了十二世纪初叶,蒙古“草原”诸部落又被称为漠南(白鞑靼)和漠北(黑鞑靼)两部,漠南部占据现今的内蒙古地区,漠北部占据外蒙古地区。十三世纪初(1206年),蒙古“草原”诸部落首领帖木真(即成吉思汗),经过数十年的奋战,统一了蒙古高原各部,建立了游牧军事贵族政权—蒙古汗国。当时的大漠南、北特别是漠北地区便成为蒙古汗国的统治中心,由于蒙古社会的统一,使漠南和漠北西部逐渐融合为一个新的社会共同体,所以,漠南和漠北蒙古诸部落方言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基本趋于统一。正如桑席叶夫教授所指出:“在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各种不同的蒙古方言构成相当统一的统一体。这些方言是统一的蒙古语的部落分支。使用这些方言的是蒙古诸氏族和诸部落的各个集团。”接着又指出:“……曾经统一于各族人民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国家的各个蒙古部落所使用的统一的蒙古语的诸方言,它们之间的区别较之现代蒙古诸语言之间现有的区别小得多。”①

由此可见,在蒙古汗国建立的前后,蒙古“草原”诸部落之间的语言差别很小,同时,就在这个时期(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里,蒙古书面语—古回纥蒙古文首先在“草原”部落的乃蛮部里开始使用了。这就是说,如果古代蒙古书面语最初产生于乃蛮部落的话,那么,这

注①桑席叶夫:《蒙古语比较语法》,民族出版社,1959年汉文版第1页。

样文字很可能是在乃蛮部落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因为任何一种书面语，都是以活的口语为依据而产生的。

十三世纪中叶(1260年)，蒙古统治者忽必烈可汗称帝后，将蒙古汗国的统治中心由漠北的哈刺和林转移到漠南的上都(今锡盟正兰旗境内)，后迁燕京(即大都)并扩大了其统治范围。忽必烈可汗为了更有效地行使国家的统一政权，统治全国各个民族起见，便命西藏八思巴大喇嘛于1269年创制了“方块蒙古文”，亦称“八思巴字”，企图拼写各个民族语言。但是，随着元朝的逐渐衰亡，这种方块蒙古文很快被停止使用了。尽管这种文字能够反映出当时漠南蒙古各部的语言特点尤其是语音特点，但由于八思巴文的字形比较繁琐，不易学习和掌握，所以它不得不让位于古老传统的回纥蒙古文。

十四世纪初，蒙古佛教学者却吉斡色尔对古回纥蒙古文进行了某些重大改进后，而这种文字仍然是漠南和漠北蒙古各部通用的蒙古书面语，并且是整个蒙古社会标准的、正统的书面语。

十五世纪下半叶(1478年)，成吉思汗的后裔达延汗统一了漠南和漠北蒙古各部，消除了蒙古各部落的内战，在本土蒙古地区重新建立起比较稳定统一的游牧贵族政权，并将大漠南北的蒙古各部分为六万户，其中察哈尔、永谢布、鄂尔多斯和土默特四万户，都分布在现今的内蒙古地区。当时，大漠南北蒙古各部的语言，基本上处于统一的状态，而没有发生大的分化，因为蒙古社会重新出现了统一稳定的局面。

十六世纪中叶，在蒙古达延汗之孙、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的倡导下，喇嘛教首先在漠南蒙古地区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与发展，大量的藏文经卷开始被翻译。

从十七世纪开始，由于喇嘛教在漠南和漠北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先后翻译出版了《甘珠尔》、《丹珠尔》、《牧莲僧救母经》、《大般若经》和《波罗密心经》等佛教经典著作。同时，在这个时期内，漠南蒙古地区的佛教僧侣们还撰写了许多蒙古语言和历史巨著，如察哈尔林丹汗时代呼吐克图·颂梯坦·贡嘎斡色尔的《居日亨内·陶勒迪》(蒙文启蒙)、阿拉善拉布金巴·大喇嘛丹津达格瓦的《敖格特尔贵·玛尼》(蒙文启蒙续编)、阿拉善拉仁巴·大喇嘛阿格旺丹德尔的《贺楞·其木格》(语言的修饰)、鄂尔多斯部呼图克吐·彻辰·洪台吉的《蒙古白史》、土默特部阿勒坦汗随臣达延恰(或恰台吉)记录的《阿勒坦汗传》、鄂尔多斯部萨囊彻辰洪台吉的《蒙古源流》等等。由于这些蒙古文巨著的流传和影响，进一步促进了旧蒙古书面语的发展，而书面语的发展又促进了口语的发展。大约正是在这个时期内。蒙古语中部方言(或内蒙古—喀尔喀方言)。在漠南和漠北蒙古语活的口语的基础上形成了，并且它已具备了不同于蒙古语西部方言(或卫拉特方言)和北部方言(或布里亚特方言)的许多特点。正如桑席叶夫教授所说的那样：可以说，正是在这第三个时期(指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之交—笔者注)，旧书面蒙古语言成了本土蒙古人的语言，对于布利亚特—蒙古人跟卫拉特人来

说，它好象处在“外国”语的地位。上面所说的意味着，从这个时期以后，旧书面语言只由本土蒙古语的方言成分补充，这些成分只是在正字法形式中复古了。当然，这种旧书面语言的形态学外貌还继续保留从前的样子。到18世纪初，地方方言的影响显然加强了，这引起仿佛是几种标准方言的形成”①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清朝统治者先后征服了漠南和漠北蒙古部，后于十八世纪下半叶(1778年)又征服了漠西蒙古准噶尔部，重新统一了蒙古各部。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即1644—1911年)间，漠南部(内蒙古)和漠北部(外蒙古)虽然在行政区域上被划为两大部，但在语言方面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分化成两个不同的方言。

在历史上，漠南和漠北蒙古人一向共同使用着传统的旧蒙古书面语，在旧蒙古书面语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曾经不断地吸收过内蒙古蒙古语诸土语群和喀尔喀蒙古语诸土语群里一切优秀的语言成分(其中也包括土默特语的语言成分)。由此可见，旧蒙古书面语无疑是在内蒙古一喀尔喀(或中部)方言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丰富起来和精炼起来的。

二、土默特蒙古语的演变

阐明土默特蒙古语的历史源渊及其演变情况，是很困难的；研究土默特土语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也是很

注①桑席叶夫：《蒙古语比较语法》同上，第15—16页

困难的。因为历史上在土默特部保存下来的蒙古语文献和活的口语材料甚少，再加上现代西土默特旗人普遍转用了汉语，即使有高令者会讲一些不完整的蒙古语句或单词，也是寥寥无几。这会给我们了解或考究土默特部蒙古语的演变历史带来许多困难。现在要想追溯或构拟土默特部蒙古语的历史演变，也只能结合土默特部的族源和历史发展，加以推断与分析，作一次尝试，可能不那么准确。

土默特部的历史悠久，渊源流长。土默特部的历史经过漫长的演变，颇为复杂，学者们对其族源的考证，又多分歧。土默特部的族源又和土默特部的原始蒙古语（或者说12世纪前后的蒙古语）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先从土默特部的族源谈起，去探讨一下土默特蒙古语的来源。

许多蒙古学学者认为，土默特部源于古代的豁里·秃马敦（惕）部落。根据现存最早的蒙古文献，即1240年成书的《忙豁仑纽察·脱察安》（“蒙古秘史”）中记载，在第一卷第8、第9节和第十卷第240节、第241节里都出现过“豁里·秃马敦”或“秃马惕”部。如第8节中写道：“那群百姓是〔属于豁里刺儿台·篾儿干一族的〕。〔当初〕阔勒一巴儿忽真洼地的主人，巴儿忽歹·篾儿干把名叫巴儿忽真·豁阿的女儿嫁给了豁里·秃马惕部的首长豁里刺儿台·篾儿干。那个〔女子〕就是豁里刺儿台·篾儿干的〔妻〕，巴儿忽真·豁阿，在豁里秃马惕部，阿里克一兀孙所生名叫阿阑·豁阿的女

儿”①在这一节里，主要指出了豁里·秃马惕部人与巴儿忽真（惕）部人的婚姻关系。巴儿忽（浑）人就是现代巴尔虎人的远祖。

在《蒙古秘史》第9节里又写道：“豁里刺儿台·篾儿干在自己的豁里—秃马惕〔部〕有貂鼠、灰鼠和〔其他〕野物的地方，互相禁〔猎〕，彼此交恶，〔自立〕为豁里刺儿氏，听说不而罕山的野物〔和〕可猎之物甚多，地方〔又好〕，就迁徙到不而罕山的主人们晒赤·那颜，〔和〕兀良合〔族〕的地方来。朵奔篾儿干在那里娶豁里—秃马惕〔部〕豁里刺儿台·篾儿干〔之妻〕在阿里黑—兀孙所生的女儿阿阑·豁阿的经过是这样。”②这一节主要指出了豁里·秃马惕人居住在古代蒙古北部森林地带，属“林木中百姓”，从事林业生产，为狩猎民。同时，又指出豁里·秃马惕部的姑娘嫁给成吉思汗十一世祖朵奔·篾儿干的经过。

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哀丁在十四世纪初撰写的《史集》中谈到秃马惕部落时说：“这个部落的所在地，靠近上述巴儿忽真—脱窟木〔地区〕。它也是从巴儿忽惕人的亲属和支系分出来的。”③他还指出：秃马惕部也是从巴儿忽惕、豁里和秃刺思部落中间分出来的。这些部落彼此接近，他们被称为巴

注①扎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汉文版第10页。

注②同上书，第11页。

注③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00页（汉文版）商务印书馆。

儿忽惕①。

如果拉施特的论断准确的话，那么，古代豁里·秃马惕的部落方言应与巴儿忽惕部落方言同类，或者说彼此相近，假如我们设想古代的豁里·秃马惕人就是现代土默特人的始祖的话，那么秃马惕人是从巴儿忽惕部落中派生出来，又是同一部族，而现代土默特人的原始蒙古语应该与巴儿忽惕部落方言相同或相近，甚至可以说源于巴儿忽惕部落方言。但是，这种推论恐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难以立论。我们认为，在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的时候，巴儿忽惕部、豁里部、豁里·秃马惕部、豁里·不里牙惕部等诸部落，大概已经形成了一个部落联盟，语言彼此接近，基本上属于类似的部落方言群。正如《布里亚特蒙古史》中写道：“十二—十三世纪，豁里—秃马惕部、亦乞刺思部、巴儿浑部（巴儿忽惕部）、不刺合臣部、克列木臣部和斡亦勒惕部，还不是一个统一的部族，还没有共同的名称。依据史料仅知他们是非常不巩固的、临时的部落联盟。当时，这种部落联合体可能有两个：1. 豁里—秃马惕部（今豁里地区布里亚特人的祖先），2. 巴儿忽惕部，3. 布里亚特部。加入后一个部落联盟的有不刺合臣人、克列木臣人，也可能有亦乞刺思人。”

这三个“森林”蒙古人（布里亚特人祖先）集团，是居住在安加拉河和勒拿河流域以及贝加尔湖东岸和色楞格河下游的部落联合体，即后来形成成为布里亚特部族

注① 参见同书，第198页。

的部落联合体产生核心。”①

由此可见，远古的豁里·秃马惕人、巴儿忽惕人和木里牙特人，均属同一族类，他们的语言属古代蒙古北部诸部落的方言，即现代蒙古语的北部（布里亚特）方言。

蒙古历史语文学家达木丁苏隆在蒙译《蒙古秘史》时，将豁里·秃马敦一词译成 ᠬᠣᠷᠢᠰᠢ ᠲᠤᠮᠠᠳᠤᠨ ，并注释为（ ᠬᠣᠷᠢᠰᠢ ）即豁里·不里牙惕。可见，豁里（ ᠬᠣᠷᠢᠰᠢ ）一词为不里亚惕部的一种族姓，所以他们往往又称作豁里·不里牙惕、豁里·秃马惕、豁里刺儿台·篾儿干等等。在远古，豁里部或豁里人，大概正是秃马惕人和不里牙惕人共同的祖先。所以说，豁里·秃马敦人并非现今土默特蒙古人的始祖，而是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祖先。

拉施特在其《史集》中又提到秃马惕部时还说，“这些斡亦刺惕部落的禹儿惕和驻地为八河（Sankis muvan）地区。在古代，秃马惕部住在这些河流沿岸。……

这些部落自古以来就人数众多，分为许多分支，各支各有某个名称……。

虽然他们的语言为蒙古语，它同其他蒙古部落的语言〔毕竟〕稍有差异，例如：其他〔蒙古人〕称刀子为“乞秃合”（ kitugeh ），而他们〔称作〕“木答合”（ mudageh ），诸如此类的词语还有许多。”

注①《布里亚特蒙古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汉译本第42页。

①拉施特认为，古代秃马惕部的语言与斡亦刺惕部落的语言也相近，而与其他蒙古部落的语言有所不同。也就是说，秃马惕人所操之语言又属于蒙古“森林”部落的斡亦刺惕方言，即现代蒙古语西部(卫拉特)方言。

不管古代豁里·秃马惕部的语言，属不里牙惕(或巴儿忽惕)部落方言也好，还是属斡亦刺惕部落方言也好，都与土默特人的原始蒙古语无关，或者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根据土默特部的历史沿革和方言特点，其族源很可能来自古代的客列亦惕或克烈惕部落②，为蒙古“草原”诸部落之一。

历史记载表明，古代客列亦惕部始居唐努山脉萨彦岭谦州，后南迁至土兀刺(土拉)河一带，逐水草迁徙，往往在杭爱山脉与肯特山脉之间游牧，北邻“森林”部落，南隔大漠，西邻乃蛮部，东接蒙兀，常与突厥畏兀儿人来往，为蒙古中部的一个强劲的部落。该部落的首领王罕，初与帖木真(成吉思汗)结为“安答”(盟友)后决裂，被帖木真所击溃，客列亦惕部众纷纷被俘，变为蒙古汗国的属民。如《蒙古秘史》第187节里写道：“俘虏客列亦惕百姓，分配给众人，不使任何人缺少。分配土棉—秃别坚〔氏族〕人口，使大家都分得足

注① 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册，汉文版第192—193页。商务印书馆。

注② 参见黄静涛：《土默特历史问题丛说》—“土默特史料”第八卷。

够，〔分配〕斡亦—董合亦惕〔氏族〕人口。不到整天就分配完了。把〔性好〕血战掠夺的尺儿斤氏的众勇士解散，〔但〕不够均分。那样消灭了客列亦惕百姓以后，那年冬天在阿卜只阿—阔迭格里〔山〕过冬。”①

从上述引文中可知，客列亦〔克烈〕惕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部落或部族。在这个部落里还包括许多氏族或小部落。如只儿斤、董合亦惕、撒合亦惕、土别兀惕和阿勒巴惕氏族等等②。在《多桑蒙古史》中也指出：

“克烈部，部众甚多，居斡儿寒（orcoun）秃刺两河沿岸，邻于哈刺和林诸山。有六部落：曰赤儿乞儿（Tchirkir），曰董合亦惕（Toungcaite），曰秃马兀惕（Toumaoute），曰撒乞阿惕（Sakiate），曰额里阿惕（Eliate），曰克烈惕（keraite），自从诸部并属克烈部长以后，由是皆名克烈。”③

由此可见，古代客列亦（克烈）惕部落中有若干支系，其中秃马兀惕或土别兀惕氏族大概就是现今土默特人的先祖。《史集》中的土别兀惕，就是指《秘史》里的土棉·秃别坚、土棉·秃别干、土棉·土别格或土别格等氏族。《秘史》蒙译本里写着 ᠲᠦᠮᠡᠨᠲᠦᠪᠭᠡᠨ (tumentubegen)，虽然它在语音上与秃马兀惕或土别兀惕 (ᠲᠦᠮᠡᠨᠲᠦᠪᠭᠡᠨ —tumed) 有所差异，但与史实基本相吻。不过，还应该作进一步研究。

注① 扎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第205页。

注② 参见《史集》第209—211页。

注③ 《多桑蒙古史》（上册），第4041—页，中华书局。

土别兀惕人既然是现今土默特人的祖先，那么，土默特人的原始蒙古语自然应源于古代客列亦惕部落方言。追溯客列亦惕部落方言的来源，那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关于客列亦惕部落的活的方言材料，学者们往往是依据客列亦惕部落的社会历史，而推测其所操之语言的概况。

在远古，客列亦惕人属突厥—蒙古人，后来由于客列亦惕部曾经强盛一时，向外扩张，其周围的许多蒙古人纷纷投入该部，所以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发生了变化，促进了蒙古种族与突厥种族的融合，最后当客列亦惕部被成吉思汗所灭之后，其部众被分配到当时的蒙古各部，逐渐融化在蒙古人之中。正如拉施特在谈到客列亦惕部落时指出：“他们是蒙古人的一种；他们住在鞑难、怯绿连〔两河沿岸〕蒙古人的土地上。”①

大约在十三世纪以前，由于客列亦惕人与突厥（回纥）人相互来往，或长期杂居在一起，无论在语言方面，或在生活习惯上，都互有影响，彼此融合着。所以，在客列亦惕人中间还保持着突厥人的某些特征，“其风俗习惯语言与蒙古人颇相近，此部人奉基督教。”②

但是，到了十三世纪初叶，随着蒙古汗国的建立和蒙古部落联盟的产生以及蒙古部族的形成，而客列亦惕部落随之灭亡，其突厥化的部落方言也逐渐溶化在蒙古部

注①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一分册，第207页（汉译本）

注②同上书，第41页。

族的共同语言之中，或者说溶化在本部（中部）蒙古语言之中。正如《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所说：“蒙古部族的形成的问题也是比较复杂的。蒙古语系的和突厥语系的中央亚细亚部落（其中包含一些从东方渗入的通古斯成分），是蒙古部族构成的基本部分。这个过程主要发生在13世纪。蒙古语在与突厥语和通古斯语混合时，取得了优胜的地位。

它丰富了它的字汇，同化了这些语言，但对自己的文法体系，除了加以改进以外，并不改变。”^①

综上所述，关于土默特部的原始蒙古语也只能大改追溯到源于古代的客列亦惕部落方言，而客列亦惕部落方言又融合于“草原”诸部落（即蒙古本部诸部落）的共同蒙古语中，以后沿着成吉思汗氏族的传统蒙古语言继续发展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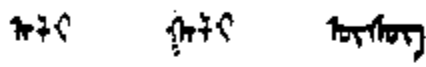
土默特人是成吉思汗氏族的直系后裔，他们一向属于蒙古汗国的本土部众。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土默特部就是全体蒙古的四十万户（不包括已拉特部四万户）之一。蒙古帝国崩溃后，蒙古本部（中部）只剩六万户，分左右两翼。如蒙古《黄金史》（阿勒坦·脱卜赤）所说：博格达成吉思汗的六万户是鄂尔多斯一万户、十二土默特一万户、永谢布一万户为右翼三万户；察哈尔一万户、喀尔喀一万户、兀良合一万户为左翼三万户。同时，在《黄金册》（阿勒坦·德卜特尔）里也谈到：“十二土默特万

注^①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汉译本，第82页，1958年，科学出版社。

户为羈马之桩，为狙击之俘，为蹶踪之食，为阿尔泰山，为十二通衢之守护，为山巅之鄂博，为平地之丰碑”。^①这里明确指出古代土默特万户的驻守范围和职责。可见，土默特部自古以来就是蒙古汗国或本部的基本组成部分。

十五世纪后半叶，成吉思汗十五世孙达延汗（巴图蒙克），命三子巴尔斯博罗特赛音阿拉克征服了十二土默特万户，并以济农（副汗）汗位统率了右翼三万户。十六世纪初叶（1531年），巴尔斯博罗特赛音阿拉克济农死后，其长子衮必里克墨尔根世袭济农位，统率鄂尔多斯万户；次子阿勒坦汗（成吉思汗十六世孙）占据十二土默特部，成为土默特万户的最大领主。

从阿勒坦汗统治时期（十六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土默特部政治和宗教文化的日益发展，土默特部的蒙古语言文字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对蒙古中部（内蒙古一喀尔喀）方言的形成与繁荣，也起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末叶，约三百五十多年，在土默特部地区先后出现了许多蒙古语言、历史和佛教经典译著。

十六世纪下半叶，土默特呼和浩特席力图（锡呀图）召固什·大喇嘛阿尤希创制了蒙文《阿利伽字母》（）并在蒙文字母表中增添了 ᠬ [kh]、 ᠮ [tsh]、 ᠳ [dz]、 ᠬ [ph]、 ᠵ [z]、 ᠡ [e] 等拼记梵语和藏语的音标字母，进一

注①《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第9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步改进了蒙古文的正音、正字和拼写借词的规则。

十六世纪末叶，即公元一五八〇年（明代万历八年），统率十二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曾向明朝神宗皇帝朱翊钧写过一份贡马表文，该表文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原件或转抄本现藏于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在我国只有影印本。土默特部的贡马表文，一般称为《阿勒坦汗表文》（ $\text{ᠠᠯᠡᠳᠦᠨ ᠬᠠᠨ ᠲᠠᠭᠤ ᠶ᠋ᠢᠨ ᠭᠣᠨᠮᠠ ᠲᠠᠭᠤ}$ ）全文约五百多个字，为十六世纪时期珍贵的回纥或（畏兀儿式）蒙古文古文献之一。

十六世纪中叶或末叶，土默特部阿勒坦汗的侄孙呼图克吐·彻辰·洪台吉（即衮必里克墨尔根之嫡孙）曾整理出版了《十善福白史册》（ $\text{ᠰᠢᠨᠰᠤ ᠪᠢᠰᠢ ᠰᠠᠨᠠ ᠰᠢᠨᠠᠨ ᠰᠠᠨᠠ}$ ）简称《白史》（ ᠪᠢᠰᠢ ᠰᠠᠨᠠ ）。该书用畏兀儿式（回纥式）蒙古文撰写，全书约五千字。书中叙述了忽必烈统治时代实施政教两道的法律和有关规定。

十七世纪初叶，在土默特部出现了一部历史（诗史）巨著——《阿勒坦汗传》（ $\text{ᠠᠯᠡᠳᠦᠨ ᠬᠠᠨ ᠲᠠᠭᠤ ᠶ᠋ᠢᠨ ᠭᠣᠨᠮᠠ ᠲᠠᠭᠤ ᠶ᠋ᠢᠨ ᠭᠣᠨᠮᠠ ᠲᠠᠭᠤ}$ ）。该书的真正作者不详，只根据阿勒坦汗的随臣或侍卫臣仆达延恰或恰台吉的记录撰写成书。全书长达数十万字，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土默特部始祖或领主阿勒坦汗（1508—1582年）生平事迹或转战生涯。与此同时，还记载了土默特部与明朝的经济“互市”以及西藏佛教最初传入呼和浩特地区的经过。

根据《阿勒坦汗传》所载的历史事件，中外学者们认为，该巨著的成书于1607年左右（即明代万历三十五年前后）。全书以韵文的形式撰写而成，在蒙文的书写法和形态学以及词汇方面，还保存有古蒙语的许多特征。它是研究土默特部蒙古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变以及整个蒙古语文发展史的一部很重要的古文献。该文藏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蒙文书库。

十七世纪中叶，阿勒坦汗的第六代后裔—萨囊彻辰·洪台吉撰写了历史巨著《蒙古源流》（ $\text{ᠮᠣᠩᠭᠤᠰᠤᠯᠤᠯᠢ} \quad \text{ᠶ᠋ᠢᠨ} \quad \text{ᠰᠤᠨᠠᠭᠤᠯᠢ} \quad \text{ᠶ᠋ᠢᠨ} \quad \text{ᠮᠣᠩᠭᠤᠰᠤᠯᠤᠯᠢ}$ ）。该历史巨著以近代蒙古文撰写，成书年代为1662年（即清圣祖康熙元年）。《蒙古源流》的作者萨囊彻辰·洪台吉虽为阿勒坦汗之兄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鄂尔多斯部领主）的嫡系后裔，但他撰写的书毕竟也可以反映出当时蒙古右翼两万户—鄂尔多斯部和土默特部的某些语言特点。同时，在《蒙古源流》中还出现了许多梵语、藏语、汉语和满语等借词。因此，它对研究土默特部的语言演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十六世纪末叶开始，到十七世纪下半叶为止，土默特部已经发展成为蒙古各部以及蒙、汉、藏、满、回各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特别是成为喇嘛教最初在蒙古草原兴起和传播的中心。在呼和浩特席力图召固什·阿尤希和固什·绰尔济著名的翻译大师主持下，大批的藏、汉佛教经典在土默特部（主要在呼和浩特）被译成蒙古文。例如：

《甘珠尔经》(部分卷、函,阿尤希、绰尔济合译)。

《让退口舌经》(阿尤希译)。

《大般若经》(一卷、七卷和十二卷,绰尔济译)。

《波罗密心经》(绰尔济译)。

《妙法莲花经》(同上)。

《牧莲僧救母经》(同上)。

《众菩提道次第之纲》(同上)。

《佛学要义》(同上)。

《彰所知论》(同上)。

《阿毗坛论》(同上)。

《本义必用经》(同上)。

《弥勒佛传与证道歌》(同上)。

《胜乐佛修法》(同上)等等。

由此可见,到了十七世纪后半叶,以席力图召固什·绰尔济为代表的土默特部佛学家,对蒙藏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蒙古语言文字的发展,都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从十六世纪末叶到十八世纪末叶(即从万历年间到清嘉庆初年),约二百多年间,在呼和浩特土默特部先后已建造大小召庙二十多座,喇嘛人数可达两千余人。在这些召庙里,蒙古语言文字曾被广泛使用。同时,清康熙等皇帝还给这些召庙赐名立碑,而这些满蒙碑文对于研究土默特部的历史发展和语言演变,都是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

十九世纪初叶(1828年即清道光八年),在北京嵩

祝寺印书馆陆续出版了一部蒙古语语法巨著——《蒙文诠释》（*ᠮᠣᠩᠭᠤᠯᠠᠭᠤ ᠰᠢᠨᠠᠭᠤ ᠨᠠᠭᠤ ᠨᠠᠭᠤ ᠨᠠᠭᠤ ᠨᠠᠭᠤ ᠨᠠᠭᠤ*）。

《蒙古诠释》的作者嘎拉僧为土默特部呼和浩特西郊乌素图村蒙古人。他是十九世纪我国著名的蒙古语言学家，也是国际蒙古语研究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蒙古语法巨著创始者。他的巨著比西欧德国蒙古语学者什米特著第一部的《蒙古语法》（于1831年在俄国圣彼得堡出版）还早三年出版。

《蒙文诠释》篇幅较长，共有八卷。第一卷为序言，其它七卷分别叙述了语音学、形态学和修词学，尤其是着重叙述了蒙古书面语的正字法和正音法。作者还严厉指出了当时的蒙古文书写形式的混乱现象，明确提出了某些语言规范的标准和规则，从而对近代蒙古语起了一定的规范作用。

十九世纪末叶，土默特旗人都格尔扎布编著的《蒙古辑要》（*ᠮᠣᠩᠭᠤᠯᠠᠭᠤ ᠰᠢᠨᠠᠭᠤ ᠨᠠᠭᠤ ᠨᠠᠭᠤ ᠨᠠᠭᠤ ᠨᠠᠭᠤ ᠨᠠᠭᠤ*）于1909年（宣统元年）正式出版，它是继《蒙古诠释》之后的又一部蒙古语法巨著。原著共有八卷，一至六卷为蒙文版，第七、八卷为满蒙混合版。

都格尔扎布在其《蒙文辑要》中主要阐述了蒙古文或蒙古书面语的正字法、正音法以及满蒙文字比较和互译问题。与此同时，还将《蒙文诠释》中的部分内容作了某些新的注释和补充。如果从这两本巨著的中心内容来看，可以说大同小异，应视为姊妹篇。

综上所述，从十六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叶（即清末），土默特部贵族封建主、僧侣上层以及官署文人先后撰写了许多民族历史、语言和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巨著。这些巨著在历史上对于土默特部的蒙古语言或民族文化教育以及整个蒙古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历史时期（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叶或20世纪初），是土默特部蒙古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的黄金时代。并在整个蒙古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成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而载入蒙古民族光荣的史册。

但是，从二十世纪开始，土默特旗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却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社会的种种原因，蒙汉民族的长期杂居，人口比例的悬殊，使土默特蒙古人从操民族语言逐渐换为使用汉语文。这个转换过程自然不会是暂短的，而是经过双语并存的过程，最后才完全转换为使用汉语文。在1909年出版的都格尔扎布《蒙文辑要》（蒙文版）序言中写道：“今吾等之子弟，大半不操蒙语，也不习蒙文，长此下去，日后必将失母语忘本，故穷心撰此文，以示忧虑”（笔者汉译）由此可见，在十九世纪末叶，土默特旗蒙古青年一代逐渐失掉了母语，而转用了汉语；到了二十世纪初叶或上半叶（解放前），土默特旗蒙古人老年一代也相继忘掉民族语，而转用汉语。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民族语文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转40页）

我的回忆（续）

云祥生

五、天灾人祸

一九二八年秋，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打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主力象潮水似地沿绥包铁路向西溃退。当时，庄稼渐已成熟，眼看就要收割了，但在散兵游勇的扰乱下，农民们被迫停顿秋收，躲避兵灾。

父亲出走邻村还没有回来，哥哥又怕把刚买的马被散兵抢走，准备带上米面和草料到山里躲藏。当时情况十分紧急，须在夜晚动身。在给马铡草时，因为我人小力单，压不动铡刀，哥哥就叫我放草，他压刀。由于我精神紧张，注意力不够集中，就把左手同草一起放到了铡槽上，待我感到不对劲赶紧往外抽时，左手的食指已被铡刀铡下了半截。顿时，我的半个身子麻木起来。哥哥见状，当即放下铡刀，抱住了我那铡伤的手，和我一起哭了起来。哭声惊动了同院的婶子、大娘，在她们帮助下，我的手被包扎好了。哥哥含泪带上了米面、草料，拉上了马躲藏去了。

国民军在溃散时，撒下无数的枪支弹药，大部分落在了坏人手里。绥远地区很快就发生了抢劫杀人事件。什么杨猴小，郭长青、排姑娘、苏雨生、大二老汉、干莞豆、铜匠二则，大黄狗、斜眼老三、张老六、三罗汉、二乐子、阿当则、金翅雕等土匪群蜂起云涌，使广大劳苦群众不能安然太平地生活。土匪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遭殃，良家妇女被奸污，财产被抢光，家人被杀害，使好多群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那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也是加在人民头上的枷锁，他们以繁重的苛捐杂税敲榨老百姓的油水。他们的军队，实质上是官土匪。如是年农历十一月，“杨猴小的土匪队伍要由西向东来”的消息传到了我们村，村里的人只顾西传的消息，没有注意东来的情况，就在一个寒冷的雪夜，排姑娘的匪众约二百余冲进了我们村，住了一黑夜零半天。仅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粮食被人吃马喂糟蹋了无数，衣物钱财被抢光。土匪从我们村出去以后，走在毕克齐镇南圪什贵和兰粘村与从归化城里开出一团官兵相遇。他们被官兵的一阵排子枪吓得四处逃散，把抢我们村的骡马丢下一部分。官兵顺便带上回了城，把骡马拉到市上卖了。我们村的父老弟兄几人，进城找见官兵的领导，要求认领自己的牲畜，他们不但不给，反而说这是他们发得洋财。我们村的几人被他们打了一顿，眼含着泪水返了回来。这些国民党的所谓官兵，不正是“官土匪”吗？

一九二九年（即民国十八年）春，绥远省境内荒旱

千里，每日从早到晚刮大风，刮得天昏地暗。天空连一丝云都不挂，天色象火烧过似地灰闷闷、死沉沉。河水断流，池塘和湖水全干涸，耕地里的粪堆都没有撒开。天灾人祸折磨得广大穷苦人没有粮和钱，他们被饿得挖野菜、掏草根、剥树皮充饥。野菜、草根和树皮很快就被吃光了，人们还是活不下去，他们只好背井离乡去逃荒，或者卖掉自己的儿女。没有儿女卖、又逃不走的鳏寡孤独老人就被死神夺去了生命。我家路南白二牛的母亲为了抚养大几个儿子，守了半辈子寡，而穷光景熬瞎了她的双眼。大儿子不争气，撇下母亲，跟上坏人走外乡被打死；二儿子白二牛年岁小抚养不了母亲。她老人家就这样连病带饿死去了。她的尸体被邻居们用二人抬杠、猴扒杆杠送出村外让野狗吃了。那时候的死人太多了，野狗吃死人吃得眼都发了红，有人饿倒还没有断气就被吃掉了。

在荒旱无期、生无出路的情况下，我家西隔壁韩三喇嘛叔忍痛将十三岁的小莲妹妹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就象捉猪娃似地用绳把她拽住，拉上就走，小莲妹妹边哭边喊，一直被拉走了。喇嘛婶知道后，紧跑慢赶没追上，坐在村口号啣大哭。此状此景，真是凄惨之极啊！

就在这严重的灾年下，父亲忍痛割爱，把姐姐包办卖给西村一家大烟鬼的儿子为妻，但生活还是没有办法，父亲整日发愁苦闷。最后以“添粮不如减口”的办法，找人说情帮助，把我送到毕克齐镇画匠铺当学徒工。从此，就开始了我的学徒生涯。

六、学徒生活

毕克齐镇画匠铺的师傅四十五六岁，师娘三十四五，有四岁的姑娘，一周岁的儿子。在我来以前，他家已有三个学徒工，都是吃饭没工钱，打烂一个碗赔十八个钱而招收的。这些学徒工的家都在毕克齐镇，家境又比较好，父母还常借看望儿子的机会给师傅家送这送那，加上他们本人聪明伶俐，对师傅和师娘殷勤奉承，便得到了师傅和师娘的宠爱。师傅和师娘不让他们到农田劳动，不让挑水、扫院、煮饭。而我家景贫寒，又住在穷乡僻壤，父亲忙常不看望我，也就没有给师傅和师娘送过什么东西，加之我人笨傻，不会花言巧语、阿谀奉承，师傅和师娘对我不喜欢，因此，天还没亮我就得起来给人家扫院、担水、烧火煮饭或提茶壶、倒便壶。人家早饭用完后，我赶紧收拾碗筷，清理炉灶，然后上街采买，回来再煮饭，吃过午饭后，见我有空，就叫我哄孩子，一直到夜深人静。

师傅和师娘都爱抽大烟、串门子。他们抽到什么时候，我就得伺候到什么时候。我去的第二年冬天的一个晚饭后，外面刮着大风，飘着雪花，师傅和师娘放下饭碗就抱上娃娃串门去了。当时我只穿一件大薄棉袄，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他们走后，我就在屋里暖一会儿，再到院里听一会儿，就这样，一直到了半夜。由于我身上寒冷、精神疲倦，就在取暖的时候爬在炕沿上边儿迷迷

糊糊地进入了梦乡。不知什么时候，师傅和师娘回来叫门，我没有听见，后来听说是邻居李大娘给开的门。他们进院后，师娘回他们屋去了，师傅来到我的住屋，劈头盖脸打了我一顿。我从睡梦中惊醒，精神恍惚，不知所措，只觉得头上和腿上非常疼痛，耳朵里尽是他那嗡嗡地叫骂声。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当学徒的苦难真是太多了。一天内不论外出或在作坊里，总是繁忙无暇，不是叫办家务事，就是叫到地里劳动，名为学徒工，实际是师傅掌柜的家奴院工。我的师傅在土默川大黑河畔买有二十多亩耕地，不管是春播夏锄，还是秋收碾打，主要劳动全由我一个人负担，要想学些绘画技术，那只有自己在劳动之余模仿着练习。我就是用这种办法，经过一年多的刻苦自学，学会了画人、马、花、草和油、糊、裱、刷等简单技术。

是年夏天，给毕克齐镇崞县巷三卜太揽做画炕围和粉刷墙壁的时候，师傅叫我跟他一块儿去。在工作中，三卜太老伴儿想让师傅在一块儿油布上给她画一些人、马、花、草等，她向师傅要求了好几次，都被师傅婉言推辞了，三卜太老伴儿很灰心。这大概是师傅另想要老婆婆几个小钱，专门刁难她，可我却没领会其意。又隔了几天，三卜太老伴儿背着师傅让我给画。我毫无顾忌地接受了老婆婆的要求，利用了两个午休时间，在油布上画了山、水、树林和几匹骏马，涂上了颜色，上了亮油。老婆婆一见高兴极了，伸出大拇指一个劲儿地夸

我，还给我煮了鸡蛋吃。没想到这事被师傅知道了，在一天晚饭后，他把我臭骂了一顿。

自从给三卜太家做完工后，师傅对我就更苛刻了，时间抓得很紧，任务布置得很严。我从早晨一起来就做家务事，紧接着，不是叫掏胶泥、捣纸团、和泥脱人头，就是叫磨砖粉、熬胶水，糊纸花、洗衣、上街采买。使我最伤脑筋的是在大热天给死人油画棺材。师傅在屋里画好小样，让我拿上照着往棺材上画，并且要涂颜色、上油面。在炎热的天气下，死人味臭得脑门儿发痛，尽管在旁边放了许多茵陈蒿、煨了几柱香，仍然是呛得令人发呕。我的鼻子至此以后就失掉了嗅觉。由于所给的任务繁重，我经常疲乏困倦，打盹瞌睡，精神不佳。这种情况一旦被师傅看见，他就用尺子打我，用污言秽语骂我。

这年秋季，我给师傅把庄稼收割碾打完，回毕克齐路径王毕克齐村时就进了舅父家。舅母听说我当了画匠，就想让我给将要出嫁的表姐糊裱一下大红柜。回到毕克齐见了师傅，我就把舅母的要求向他细说了一遍，并提出要请假。当时师傅较为开明，准了我三天的假。我高兴地带上工具去了王毕克齐村，帮助舅母裱糊柜里儿。到了舅父家，我起早贪晚忙了三天半，勉强做完。我独自觉得已超假半天，赶紧收拾了工具回到了毕镇。进了师傅家，他正好不在，家里只有师娘一人。进门后我还没有坐下，师娘就板起面孔、冷言冷语地数算开了我，嫌我超了假。我给师娘说明了情况，还解释了半天，她就是

不听，居然破口骂开了我。我被骂得脸上热辣辣的，实在有些忍不住了，就顶了她几句。这可闯下祸了，她象一只母老虎似地，脸色变得白里透青，小眼珠瞪得象玻璃球一样圆，两条扫帚眉立得象麦芒尖儿，鼓起了鼻子，张开了嘴，骂得更凶了。她一边骂一边从灶火杵旯拣起个烧火棍，照我头上打了三下，我抱头踢开门跑了出去。母老虎师娘不死心，持棍追出门，又照我打来。我用手腕一架，把棍返挡回去，打在了她的脑门上。她把牙一龇，翻手又向我打过来，我乘势把棍子抓住不放，她使劲儿往回夺，我一松手就把母老虎师娘闪倒在窗台底下。她没有占上便宜，死皮赖脸地坐那儿不起来，象宰猪似地哇哇乱嚎，脏话骂了一串又一串。

她的哭闹声惊动了左邻右舍，妇女和小孩子们都跑来看热闹。师傅在邻居家听到哭骂声也赶紧跑了回来。母老虎师娘见她男人回来，就又骂了起来，并且撒谎说她肚子疼得厉害。她又骂了几句就哼哼呀呀地装起死来。师傅恶狠狠地说了这么一句，“哼！没想到他这样坏，这还了的，以后算帐！”接着，要求人们帮他往屋里扶婆娘。这时，同院李大娘听说院内打架也快步赶了回来。老人家见到此状，赶紧去劝解掌柜和婆娘。

同院邻居李大娘五十多岁了，是位心地善良的老人。她守寡已有十年，可是没一个人说不然的。我刚进画匠铺时，在大娘家住了两三个月。她对待我象亲儿子一样，一有顺口吃的就留给我吃，我也主动地帮大娘挑水、扫地、抱柴、烧火。平常师娘虐待我时，大娘很抱不

平，总要想法设法帮我解危叫屈。李大娘对师娘那狐狸精似的人格、品性和为人是很了解的。在这场风波中，师娘打了我还硬说成是我打了她。对这件事，李大娘虽然不在场，但全都理解和明白，她老人家是怕我受委屈才解劝人家的。

经李大娘的解劝后，师傅没有打我，只是训了我一番。他那讽刺、威胁、污辱的话使我憋了一肚子气，要不是已下决心远离，我非顶撞他几句不可。师傅把我训完走了以后，我打好了行装背在背上，轻轻地关上了门，也没同任何人打招呼，就离开了这个魔窟，结束了这二年奴隶般的学徒生活。

七、三次失学

一九三七年春，我家因天灾人祸，生活极度困难，我不安心在农村劳动，想进城做工混日子。哥哥不同意我的想法，经他搬亲友说情，把我送进了土默特旗立文庙街学校蒙文专修班公费学习。当时我很高兴，节假日总是不离开学校，刻苦学习文化知识。

是年夏季的一个星期天的早饭后，同学们都出去了，我从食堂回到宿舍复习功课。这时，汉文班四年级的三名学生，各拿一根湿柳棍进了我们蒙文专修班的宿舍。一个姓王的走进屋里，站在我的身后就骂，骂得非常难听。我生气地警告他们：“赶快滚出去！再捣乱，

小心我揍你们这些王八蛋！”

姓王的学生是林校长的亲戚，富豪之家的阔少爷，一贯高傲自大、目空一切。他听了我的警告，冷笑了一声说：“你来触一触爷，睁开你的狗眼看一看，爷不是好惹的，哈倒一根×毛要你扶三年。”他边骂边用湿柳棍打翻了桌上的墨水瓶，把我辛苦了半天的笔记和作业全污染了。这一下我可生气了，指着他的鼻子厉声说：“你这个王八蛋，依仗你校长老爷的粗腿，到处横行霸道，你赔我的作业！”

这个少爷趾高气扬地回了我一句：“赔你个×！”随后，举起湿柳棍冲我头顶“啪、啪”打了两下，逼得我火冒三丈。我伸手把棍夺下，顺势将他摔倒，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这家伙“哎哟、哎哟”地嚎叫了一阵，爬了起来，哭丧着脸，跛上一条腿，踉踉跄跄地离开我们宿舍告状去了。

不一会儿，校部公务员小张来宿舍通知我说：“云宪文！林校长让你马上去办公室。”

我预感到，叫我去不会有什么好事，肯定要整治我。我跟上小张边走边想：有钱有势的人太可恶了，欺负人占不上便宜就告，真是以势压人。不觉得就到了校长办公室。我整了整衣帽，喊了声：“报告！”

“进来！”尖细的喉音从室内传出。

随着回声，我推门进去，环视了一眼：办公室迎门的北墙上挂有威武雄壮的肖像，像下横写着“元世祖成吉思汗”；像的左右两边贴着两张写着“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与人相处，言行相顾，平易近人，表里如一”的条幅；靠左墙的方桌上放一个茶盘，盘内放着一套用吴家窑泥烧制的茶具，靠右边的小方桌上，摆着一盆含苞未放的月季花；办公桌上，靠墙放有《词源》、《辞海》和卷宗，顺卷宗放着尺半长、寸半宽、三分厚的手板，这是校长的法具。

林校长油头粉面，戴一付养目镜，身着银灰色绸布大褂，坐在办公桌后盯着我。五十岁左右的修身课教师阎晋斋，头顶瓜壳儿帽，身穿皂布长袍，八字胡须两边翘，嘴里叼着卷烟，很神气地端坐在林校长左侧的软椅上。四年级丁老师，乌黑的大背头，粉底皂鞋，海昌兰旗袍，斜坐在林校长右边。坐好后，林校长命今我站在他的对面，好象衙门里过堂审案似的，整个校长办公室变得非常森严。

林校长眨巴了一下小眼，以判官的手势和口气质问我：“你为什么打人呢？谁给你的权利？打人是违法的、要处分的！”

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向他们如实地说了一遍。

“噢！你有理，那么你要我们给你赔礼道歉不成吗？看你那个萎靡不振、愚顽不化、傻头傻脑的穷样子，就不象个来学校学文化的学生，你不如早些回家督牛屁股，还少浪费政府的钱粮。”林校长就用这样蛮横无理的言词讽刺和侮辱我，连陪审的二位老师也有点儿坐立不安。我实在忍耐不住了，以严词回答：“请校长按事实秉公处理。至于我傻不傻，不是穷苦的过，穷苦

也可以学文化，督牛屁股并不可耻！”

这下可把林校长气坏了。他从椅子上猛然跳起来，顺手操起手板，睁大一双鼠眼，立起疙堵儿眉，颤动着嘴唇，气势汹汹地高喊：“你，你愚顽不化，你……你过来伸出手，罚你五手板！”

我既不伸手，也不说话，站着一动不动。在这种情形下，丁、阎二位老师更加不安了。他们站起身，以帮助校长解围下台的口气向林校长说：“他是初犯，让了吧。叫他回去好好想一想，改过来就是啦。”

林校长听了丁、阎二位老师的话，大概考虑到，象这样闹下去不会有好结果，一旦出了问题影响更坏，不如就此收场。于是，他看了二位老师一眼，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说：“看在二位老师的面子上，可以不罚打，但要给你记一过。”这一场风波就此结束了。

一九三八年三月初，塞外的归化城仍是冰封大地、寒气袭人，同学们从大青山陆续进城来上学。

学校的生活很坏，早餐是瞪眼米汤和半生不熟的黑豆炒面，吃上常拉肚子；中午和傍晚是二两半黑面馍馍、稀饭就咸菜。教室和宿舍不生火，同学们冻得愁眉苦脸，满腹牢骚。有的同学钻进被窝不出操，教师从宿舍里往出赶。做操的学生操手弯腰，哆哆嗦嗦。

住校的蒙古族学生闹情绪的原因，体育教师路思文完全清楚，可是他不同情，也不说公道话，在学生面前还骂骂咧咧，把我们比作没有办法管教的一群乏羊。我们当时非常气愤，决定要给旗政府报告这些对我们少数

民族不当人看待的卑劣行径。这个报告由年岁较大的一些同学，如文卿、志安、霖秀、启瑞、玉庆、宪文、景山、尹俊、士俊等起草整理，又联合了四十多名同学签名，送到了旗政府。旗政府领导看了报告后，就派康振邦等几名录士和科员到学校调查。经过调查了解，他们认为学生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就向旗政府作了汇报。旗政府有关领导将林校长等叫到旗政府训斥了一顿，并命令他们把贪污学生的伙食款如数退还，命令学校把侮辱蒙族学生的路教师减雇。从此，林校长对住校的公费学生怀恨在心，只要抓住一点缺点毛病，就以记过、开除的手段打击报复。

一九三八年四月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冲进厚和市（归化城）内，消灭了敌人一个哨所，并把日本资本家在大十字街经营的商店——阎记和福兰斋的财物没收了一大部份。待日本鬼子知道后，游击队早已无影无踪了。抗日游击队奇袭厚和市，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反动势力，使其不敢随意欺压老百姓。但是，日本鬼子狗急跳墙，纠合和组织敌伪武装，向大青山根据地进行了报复性的扫荡，一方面搜山清剿，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一方面在城镇乡村加强特务组织，派出便衣特工人员深入基层进行侦探，发现稍有嫌疑的人，就抓住关押起来，用触电、狼狗咬、灌煤油辣椒水等野蛮手段杀害中国人民，把杀害后的人头高高地挂起来，并在附近墙上张贴青脸、红发、巨齿獠牙的画像，写上“赤魔不死，大乱不止”等反动

标语。

在此期间，土默特旗立文庙街学校也派进了一名叫高桥的日本特务。他以学蒙古语文为名，侦察反日嫌疑分子为实，在学校到处乱窜。有一次，窜到汉文班三年级教室，富彩霞老师正在讲中国近代史八国联军进北京屠杀中国人民的情况，被日特高桥听了去，他硬说这是反帝国主义，逼着富彩霞老师交出讲稿。富老师坚贞不屈，拒绝日特看讲稿。日特高桥没有得逞，就给校方施加压力，命令把富彩霞老师送进警察署审查。校方卑躬曲膝，忙给高桥赔礼道歉，还贿赂了不少财物才算了事。

日特高桥逼看讲稿事件发生后，如同降了灾荒，首先吓破了校长林子仁的胆。他当即下令，“全校停课三天，清理全校教科书和图书，”致使土默特学校自建校二百年来积存的珍贵图书和历史资料惨遭破坏。校方下令将清理出的书搬到大操场天桥下烧毁，搬书的师生和公务员象受洪水淹没的蚂蚁，愁眉苦脸、垂头丧气、无精打采，背的背，抱的抱，乱哄哄地往天桥下扔。林校长站在高处，一面监视搬书的，一面指挥放火烧书。一阵烈火过去，被清理出的图书和历史资料全部化成灰烬。

在这次烧书中，有几名学生在爱书的思想支配下，拿了几本，被林校长发现了。校方除把书没收、把他们训斥一顿外，还给三名学生各记过一次，开除了两名。

是年八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旧城小东街大观园剧场

公演《孔雀东南飞》。没等话剧开始，日本鬼子的一位翻译官就冲了进来。他歪戴礼帽，眼挂一付墨镜，嘴上叼着烟卷儿，横冲直闯，欺负来往的人，调戏妇女。这条日寇忠实走狗的野蛮行为，使戏园秩序乱了起来，也激起了群众的公愤，以李秀山为首的蒙族青年军官举枪将他击毙。

这一事件轰动了全城。伪行政机关的人们吓得惊慌失措，东张西望。日本鬼子都警戒起来，有的钻进了“乌龟壳”。土默特学校的林校长吓得胆战心惊，在办公室里团团转。可他又觉得这正是对住校公费学生打击报复的一个好机会，于是命令新来的公务员老崔将校门全部关闭，并下令“凡在午饭前回校的，罚跪、站和记过处分；凡午饭后回校的一律开除”。我和尹俊、文卿几位同学在午饭后赶回，被林校长开除出校。这是我第一次失学。

我被开除后，生活上没有办法，只好将皮大衣卖了九元钱，在归化城内勉强维持了将近两个月。在这期间，我看到了厚和市开办警官学校的招生广告，考试地址在西河沿归绥县政府小礼堂。我当即改名叫张贵荣去投考，经口试、笔试、体检后，被正式录取。

我觉得生活有了出路，高兴地回到住处，把这件事告诉了李永发、云启瑞和云昌。可他们听后，一致劝我说：“不要去警官学校学习，这个学校是为现政府培训爪牙的，结业后要你当拿警棍的大黑狗，劝你不要去为好。”听了朋友们的劝告，我就死了这条心。

这个时候，伪蒙古学校在大台什也开始招生，我约了几位失学青年去报考，但因没有得力的人介绍，虽然考得不错，但未被录取。

是年九月初，我又打听到乌兰察布盟在百灵庙成立起青年学校，要招收厚和市的学生，只要有旗一级单位的介绍，就可报名考试。我托人到土默特旗政府开了一封介绍，去乌盟驻厚和市办事处报了名，只简单地试读了一次就批准入学了。

百灵庙青年学校属于中学性质，只有甲乙两级，六个学习班，二百多名学生，以蒙古语和日语授课为主。兼授汉语文。土默特旗籍的学生，在我去以前已有五六名，他们是：云爱礼、李景玺（李永年）、云霖秀、尹俊，云瑞详（巴音巴图）、瑞俊（锐军）等。他们的蒙语较差，汉语程度较高，全编在甲班学习。

青年学校的校址，在百灵庙河西古庙佛殿大院东侧的陪殿院内。学校将殿内泥塑像和铜铸像清理出去，做为教室和宿舍。这些房子因供佛多年，灯火和烟把墙壁熏得象墨涂过似的，墙上的泥巴，有的地方脱落，墙根鼠洞透风，房顶露雨，顶棚纸全被人们扯走。天热时屋里潮湿腥臭，天冷时室内烧上火，仍是寒冷冰冻。冬天烧的是武川出的臭炭，煤油灯烟和臭炭烟呛得人实在受不了。连鼻涕和痰都是黑色的。农历十月中旬落了一场坐冬雪，宿舍里不过火的土台子上，只铺一层沙毡，一到夜间，同学们冻得就象龙虾一样，弯腰蜷腿过夜。

一九三九年三月的一个早晨，和我同名的分队长斯

沁毕立格，手提一根烧火棍冲进了我们宿舍，催同学们起床。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起了床，正准备洗脸，分队长就大骂睡觉的同学，骂完后，很神气地走近我，把手中带泥土的烧火棍放进我的脸盆搅了两下，把水全给弄脏了。当时，我就质问他：“你这家伙，为什么这样欺负人？把我的水弄下这样脏！赶快拿去给我换水来！”

“我给你换个×！”他回了我一句，就拔腿往外走，我迅速到门口挡住了他。这时，云霖秀起来也替我帮腔。分队长转过身，站在当地，两手叉腰，睁大眼，立起眉，放开嗓门又大骂了起来。我拉他往门外推，他举起烧火棍冲我脑门狠狠地打了两下。我气急了，伸手把他抓住摔倒在地，痛打了一顿。他爬起来，连哭带喊地向日语教官告状去了。日语教官派了两名年岁较大的学生，把我和云霖秀叫到办公室，质问了半天，用板子打了我俩一顿。我的手被打得鲜血印出，肿了起来。

我和云霖秀从教官办公室出来一边走一边骂：“这些野坨胞，哪一天有机会，老子把狗日的们统统地枪毙了。”

这天还不到开午饭的时候，中队长萨那木就跑进伙房吃了起来。李景玺随后跟了进去，也盛了一碗大米饭要吃，中队长萨那木就不让他吃，要把他赶出伙房。李景玺不出去，大声质问：“谁能吃，谁不能吃？”萨那木蛮横地回答：“你就不能吃！”“啪”打了李景玺一个耳光。这一下激怒了李景玺，他扔掉饭碗，抽起了煤堆上的铁火柱，朝着萨那木的腰部狠狠打了两下。萨那

木支不住，倒在伙房地上嚎叫起来。

李景玺见事不妙，赶紧跑到佛殿大院，进佛殿内爬上了弥勒佛的头顶，藏在金冠里。萨那木挨了打，还没认住李景玺是哪个班的学生，教师把学生全集合起来查问了一番也没查清。这件事就这样马虎过去了。

没过几天，学校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后勤处保管现金的铁柜被撬，盗走了蒙疆币两千七百多元。这起盗窃案，校当局某些领导毫无根据地怀疑是土默特旗籍的学生干的。他们采取听大报告的办法，把全校师生员工带到东河区盟公署，搜查了土默特旗籍学生的宿舍。尽管这样，也未获得半点证据。他们又变本加厉，把召河（属土默特旗的牧区）的一位叫博音乌力吉的学生，用残暴手段屈打成招。竟给土默特旗籍学生加上刁厥诡诈、野蛮、爱打架闹事、搞不团结、不守校规、影响教学工作等罪名，报请盟公署批准，全部开除出校。这是我第二次失学。

从百灵庙青年学校被开除的同学们，有的当兵，有的回农村种地，也有的上大青山参加抗日游击队。而我仍想学文化、求知识，经席勒图召索木腾大喇嘛的介绍，进了贝子庙青年学校。

贝子庙青年学校是初级中学，有一百八十多名学员，五个学习班，蒙语授课，兼学日语。学生主要是从锡盟各旗牧区来的，绝大多数不懂汉语，有少数几个懂汉语，但说不好。学生年龄大都是十五六、十七八岁。这些学生既有平民子弟，也有牧主、贵族的阔少爷。该

校址在大庙东边的草滩上，设有一百多顶蒙古包，灶房、食堂、教室、图书室和领导办公室，都在十数间平房内，教职员和学生的宿舍多数在蒙古包里。

学校管教学生，是用法西斯的办法。上课坐不端，出场站不正或迟到，教官不是用带铁钉的皮鞋踢，就是打耳光、罚跪、罚站。有一次，阿巴嘎旗的一位名叫森盖的学生，忍受不了学校的虐待，逃回了家，学校把他抓回来，交给了日语教官。日语教官将全校学生集合到操场排成两行，命令森盖把衣服脱光，爬在队列间，叫四名同学扯住手脚，用红柳条抽打。森盖被抽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哭喊吉喊阿布。他的眼泪哭干了，喉咙沙哑了，连站也站不起了。后来，是由三位同学扶起来，送到蒙古包内的。这一惨状，对我刺激很大，使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国民党反动军队迫害父母的凄惨情景，仇恨的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

在这个学校，不仅受日语教官的侮辱，还要受牧主儿子的欺负。和我同班、同宿舍有一个西乌旗牧主的儿子叫道不清的，长像很古怪，鹰勾鼻子、三棱眼、耷拉眉、尖下巴、兰眼睛、红头发，说话带口吃。他依仗着在盟公署任科长的父亲，经常欺负人，上学还喂着一条细狗（猎犬）。他每天让同宿舍年纪小的同学给他喂狗、叠被褥、端饭、打水。我对他的所作所为非常讨厌，但是，自己为了学习好，就以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对待他，既不和他共事，也不和他说话。

后来，我发现牧主的儿子道不清经常鬼鬼祟祟地偷

同学们的铅笔、纸张和奶食，还要欺负年岁小的同学，揍他一顿的念头油然而生。

五月底的一个星期天，食堂的午饭是面条。我刚打回一桶饭放在蒙古包前，道不清的细狗就从东边草滩跑过来舔舐洒在桶沿上的面汤。我喊了一声：“呸！克义纳黑生！”这条狗抬起头向我翻了个白眼，龇了一下牙，又去舔。我气愤不过，抬起右腿踢了过去，不偏不倚正踢在细狗的下巴颏上，细狗被踢了个仰面朝天，“吱吱吱”惨叫了几声跑了。道不清从蒙古包内冲出来骂了声：“扎纳格呵！”就猛扑过来打了我两拳。刹时，一股怒火冲上了我的心头，什么日语教官的耳光、带钉皮鞋、红柳条，我全然不顾了，伸手就把道不清抓住摔倒，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其他同学在一旁看热闹，道不清滚了一身土，爬起来就跑向日语教官的住处告状去了。

第二天上午听完第一堂课后，校部下通知开除了我。这是我第三次失学。

三次失学，使我认清了国家沦亡、人民惨遭外敌蹂躏、压榨的现实；阶级仇、民族恨，使我萌发了革命的念头：要想得到自由平等，全国各族人民必须上下团结战斗，推翻反动政权，把日寇赶出国土！

为了实现这一愿望，在一九三九年的秋天，经贾力更，刘卜一（奎璧）、李才等革命老前辈的指引，我和云生格、云曙碧（女）、云曙光（布赫）、云成光、云照光、云成烈、云霖（女）、刘金（云世英）、赵有

禅、小成义、李文精，李永年、巴增秀(女)、云治安、云志忠、张玉庆、朱玉珊、赵戈瑞、云林秀、齐俊山、金玉、李贵毛等二十多人，由张录同志带领，跋山涉水，历尽艰险，胜利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从此，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编辑 赵国恩)

(上接20页)

中“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的规定精神，土左旗党政领导十分关心和大力支持在蒙古族青少年中恢复民族语言的工作，并创办了蒙语幼儿园，蒙古语授课民族小学以及加授蒙语民族中学，在恢复民族语言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们坚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路线指引下，恢复民族语言的教育工作，必将获得更大的成绩，并在自治区的四化建设事业中能够发挥民族语文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 万青林)

二叔走了以后

——对一户“抗属”的忆述

云 荫

为配合《土默特文史资料》第一辑和第二辑发表的我二叔云祥生所写的《我的回忆》和《在延安的学习与生活》两篇文章，特写此稿，以供读者了解二叔走了以后我家这户“抗属”的一些情况，并从这个侧面增加些《土默特文史资料》所登稿件的连续性。

一、被逼上“梁山”

在旧社会，蒙古族是一个遭受重重剥削压迫、灾难深重的少数民族。土默特旗的蒙古族，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比其他地区蒙古族的灾难更加深重，因而被逼从事革命活动的人也就较多一些。这是符合辩证法原理和革命发展规律的。但从每个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来说，又有他主客观的具体原因。

我们中海流村，是个离城仅六十华里的不太偏僻的

纯蒙古小村。村子虽小，在旧中国时也有近二十户人家、百余口人。自从我大祖父阿木格去世后，从民国初至“七·七”事变这个时期，我们村不仅没有一个在官府做事的，就是连一个进城做工经商的或上“洋学堂”的小学生也没有；相反，因不堪忍受阶级和民族压迫、不愿再过困苦生活而冒险为“匪”的，倒有王富财（号称张老六）、王财财、王进财和白二牛等数人。其实，在旧社会的所谓“匪”，除了少数专事抢劫外，大多数是一种敢于反抗剥削阶级统治和民族压迫的自发革命行为（事实上，他们在抗战后曾与大青山抗日部队有过联系，特别是白二牛因参加抗日而被日寇杀害，王家弟兄的父亲根九老爷爷也因子为“匪”而被日寇抓走死在狱中）。我祖父阿古鲁的汉学文才很高，汉字写得特好，为人很耿直，因对旧中国的社会制度不满，既不愿设法到官府做事，也不愿为“匪”反抗，只好平平愤愤一生，在临终前曾嘱咐我说：“你长大以后若和汉人在县公署打官司，千万别说自己是蒙古人，否则，就得先打你一顿，有理的官司也打不赢。”老人的肺腑之言，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看来，他的这些嘱咐绝不是一般地不满汉人，因为他要好的几个朋友就是汉人。他所反对的正是当时的国民党省政府、县公署推行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和旗总管衙门的腐败无能。

祖父死后不久，日寇侵占了绥远。我们村的老百姓对日寇非常恐惧和不满，对打着民族招牌的蒙奸德王当了伪蒙政府主席却抱有一定幻想，以为他对蒙古人总会

比国民党的省政府，县公署要好些。于是，我父亲云富良在1938年春节后，进城搬起舍力图召索木腾这门亲戚的门子，紧家备产地让二叔到著名的“南高”——土默特旗立文庙街高等小学校上了学。父亲先让二叔上学而不先培养我这个儿子的原因，一是家境贫寒同时供不起两个小学生，二是二叔的年令已大不能再耽搁了，三是按孔孟之道，先要尊父爱弟，以示他在我们这个小家庭中的大公无私。

二叔到“南高”上学那年，已25岁了。这么一个大令青年开始上小学，在今天看来真是天大的笑话，可在那时却不然，我们全家族和全村人都很崇敬和羡慕他，因为他是我们村自民国以来第一个进“洋学堂”的“洋学生”。特别是我这个年已12岁正读《百家姓》的少年，看着身穿兰布学生服回家来的二叔，听他讲述“南高”的故事，经他教会蒙文字母和10个阿拉伯字母以及简单的加减乘除法，好象增长了多大的“才智”，对他崇拜得更是五体投地，并且苦苦哀求父母和三叔也让我进城上学。第二年春节后，我进“南高”上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但这时二叔已离开了母校。

事后我才知道，二叔在“南高”时，因同几位大令同学看戏违犯“校规”被开除了。我堂姨夫索木腾又先后将他推荐到在百灵庙的乌盟中学和贝子庙（现锡林浩特）的锡盟中学，也因与人打架、听不懂全蒙语授课和路途太远、拿不起路费等原因中途辍学。他想当兵，父亲说“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坚决不同意；又报考

市立师范学校，因文化低没考中。在这些事实面前，蒙奸德王“为民族”的幌子在二叔心目中破灭了。但天无灭人之路，他就在走投无路的徘徊过程中，经恒升老师的帮助，与李洪奎（云一立）、张玉庆、成德仁（成少江）、云治安，云志忠等几位大令同学一起，分别与我党工作人员贾力更等同志取得了联系，遇到了真正的救星。特别是有一次他在火车站候车椅上躺着等车时，有个日本兵红黑不说将他踢起狠打了一顿，使他一气之下连火车也没坐，步行去了王毕克齐村。这种亡国奴的气，更坚定了他奔赴延安学习、参加抗日的决心。

1939年秋二叔走时，他把我找到舍力图召后院低声对我说，他要到很远的地方学习去，走多长时间不清楚，让我把他存放在召里我姨母家的东西取出来使用。我问他这地方在哪儿，我能否去，他不告知在哪儿，只说因我年幼不能去，于是我俩就对哭了一阵。第二天，他还让云志忠捎给我两元钱，可见他当时对我是多么关心。从此以后，一直到1946年春，我在河北省张北县见到李文精同志时才知道了他的准确消息。经过整整十四个年头，在1953年冬，他作为阿拉善旗学习参观团负责人来到呼市时，我们叔侄俩才在现公安厅大院我的家见了面。

由上可见，我们村的王家三兄弟和白二牛是在旧社会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下被逼上“梁山”——冒险为“匪”的，我二叔云祥生也是由于同样原因被逼上了“梁山”——投奔到革命圣地延安的，只不过是出于时

代的不同当时所走的道路不同而已。

二、接济“沟里”人

二叔走时，为了保密，也怕我父亲阻拦，所以并未告诉家，而是从他娘舅家王毕克齐村悄悄走的。事过之后，才由该村我一位表叔和塔布赛村我堂姑母云兰（云曙芬的母亲）先后悄悄地告知了父亲，父亲又悄悄告知母亲、三叔他们，除此之外，我们村院中的人谁都不知二叔的去向。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家向父亲问二叔去向时也被一板子顶回去，说是小孩子管这些事干什么。可见父亲对二叔去向的密确实保得好，因为在那个时代，谁家有人参加抗日若被日寇发现，轻者就得坐牢，重者就要杀头。

父亲对二叔的去向可以不告知人，但他突然长期不见了，这是村院中人都可看到的，总得有个妥善的说法，方能掩人耳目。说来事也凑巧，我有个当兵的族兄云宜常有一次回村公开对人说，他的一位朋友在马占山的军队（马是“七七”事变后由绥远退到陕西的一位国民党将军）见到富山（二叔的小名）叔了，说是有个指头还短了一节（二叔铡草时将左食指铡掉一节），肯定没错。宜常兄这“消息”是怎样听来或编造的，那就不必考究了。父亲听后心里是又好笑又高兴，从此他就以假当真掩盖实情了，因为日寇对国民党军队的军属并不怎么追究。

大约在1940年秋的一天，有位中等身材、年近三十、穿着破棉衣、扎着一把镰刀的人突然来到我家，问清父亲云富良的名字后低声说，他叫杨老全，是从大青山“沟里”来的，并说他们和二叔做着一样的工作，因此要和父亲交个朋友。

那时，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已在土默川的蒙汉群众中有了广泛的传闻，一说是大青山“沟里”的，谁都知道他指的就是八路军。父亲对这位不速之客的突然来访，是又惊又怕又喜悦。喜悦的是又一次听到了二叔的消息，心知自家是一户抗日家属，见到“沟里”人就是见到了自己的亲人；惊怕的是，那时日寇的特务密探很多，他们也常用冒充“沟里”人的办法侦探八路军的活动和老百姓的情况，万一遇上这种人向他吐露真情那可就糟了，这个警惕是绝对不可没有的。于是，父亲对这位不速之客就不冷不热地说：“听说我们老二是在马占山的军队里当兵，他走时也没和家里说，几年了也没个音信，究竟在哪儿，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不管你是哪里来的，我们老百姓是谁来了也得伺候，至于交朋友，我看你这人也善良，只要不嫌我是个穷百姓当然可以，你看有什么事就说吧！”

杨老全同志确实是“沟里”人，他现名杨永胜，曾任呼市糖厂党委书记和市轻工局长，现已离休。他当时对父亲那种若接若离、保持高度警惕的态度似乎很理解，于是，就避开二叔和“沟里”的事，唠些家常，吃过饭就走了。自此之后，老杨真的和父亲交上了朋友，

不管白天黑夜，常到我们村来。他来时不管冬夏常天，总是农民打扮，拿个适时的农具。来的次数多了，不仅同父亲和三叔熟悉了，还和三祖父阿色楞、二伯父那木吉拉、六叔照连等我们这个家族的不少人称兄道弟地交上了朋友。因他常来，我家也不当外人看待，遇上什么吃什么，有时还带些炒米炒面作干粮，或背些土盐、粮食走。经过这样的交往，父亲也早已改变了初期对他那种保持警惕的若接若离态度，完全变成了“沟里”人与抗属之间亲人般的关系。有年秋天的一天，老杨正在我们家呆着，村里突然来了几个“号草料”的伪军，父亲很快指引他从三祖父院东的小门出村，装作农民下地的样子向北溜走，保护了他的安全。大约在这年冬的一个夜晚，我家窗前突然有人低声叫门。母亲问：“是谁？”外面答：“是我，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了！”父亲一听是老杨，就赶快开门让进来。这次他们是两个人来的。一进家老杨就说：“有什么便宜吃的快给吃些，我们要到别处去！”母亲见天气很冷，就把仅有的七八个鸡蛋给全部荷包上，吃完鸡蛋就是荷包蛋汤拌炒面饱饱地吃了一顿。那时我家的光景很紧，有了鸡蛋除卖作零用钱和招待至亲好友外，自家人是从来舍不得吃的。可见，这时我家已把老杨他们“沟里”人当作至亲好友看待了。

大约是1942年，轮到我父亲“应事”当“甲头”（类似村长）。在那个时代这可是个苦差事，谁也不愿当，可没有又不行，只好按户轮流，每两户当一年，只

要轮到，谁也不能推辞。过去，老杨也从我家或三祖父、二伯父家带些粮食、土盐等东西走，不过从来不多要。这一年因父亲“应事”，老杨就让父亲向村里起了一牛车小米、一些土盐、麻油和十几双军鞋送到了“沟里”。这既是父亲的任务，又是他作为一户“抗属”愿意干的。这次送的军鞋仅有十几双，其中母亲连明昼夜赶做出的就有三双。当时我家五口人，做针线活的只有母亲一人，可见，连母亲也想方设法地接济“沟里”人。

父亲这次送粮总算做得巧妙，把敌伪密探瞒了过去。可是，轮到三祖父和二伯父“应事”，让六叔和宜善哥往“沟里”送了两次粮，不知怎的就走露了风声，出了问题。那是宜善哥还在病中的一个冬天，我们村突然来了两个日寇和几十名伪军，强迫老百姓集合在一起，因大“甲头”刘达二闻讯兵来逃跑了，就把小“甲头”宜善哥叫去盘问。问他给八路军送了多少东西，是谁送的，宜善哥没有承认，他们就在大冬天把他的上衣脱光用马鞭狠狠地抽打。可怜宜善哥强支着病体被打得死去活来，可他一口咬定出门是走亲戚，绝不是给八路军送东西。两个日寇觉得实在打不出口供，在全村百姓中苦苦“哀求”担保和一个较有良心的翻译官周全下，才停止了毒打，抢劫了东西扬长而去。宜善哥的伤病却整整调养了一个冬春，更严重的是，有一次六叔照连突然被日寇伪军抓到西红岱村，硬说他私通和接济过八路军，不承认就严刑毒打，一直把他的耳朵打坏，打得不

能行动，在日寇伪军走后，家院中人才用牛车将他拉回。经过长期调治，别的伤总算好了，可他的严重耳聋却成了终身残患。方邻左右和亲戚朋友，凡是认识或知道六叔云照连的，都知道他是聋子，但真正知道致聋原因的并不多。就在宜善哥和照连叔险些被打死的这两年，离我们村很近的东、西红岱、新营子、朱根岱这一带，因接济“沟里”人被日寇逮住杀害了的村长和普通百姓就有七、八个人。那个时代，接济“沟里”人真是危险啊！可是，在这之后，杨老全还是照样到我家和我们村来，我们还是照样接济，只不过是减少了些不必要的来往，做得更巧妙了。日寇的刀再多再快，也割不断“沟里”人同群众和“抗属”之间的深情厚谊。

三、不准考留日

在我上“南高”的第二年（1940）暑假开学以后，我从学校得知一个消息：伪蒙政府设在张家口元宝山的留日预备学校要招考公费留日预备生。按我当时在蒙文甲班的学习情况，估计有可能考上，我就向学校报了名，准备应考。

正好在考试前几天父亲因事进了城，我在舍力图召见到他后，兴致勃勃地将我报名应考的情况告知了父亲，满以为会得到他的支持和鼓励。不料父亲却放低声音很严肃地对我说：“日本人在中国是占不长的，你还考那种学校干什么！好好在‘南高’念书好了。”看来

父亲的态度很坚决，当时只有十四岁的我哪还敢辩驳什么，只好唯命是从地说：“那我就不考了”。可是父亲又对我说：“报名了，考还得考，不考怕日本人和老师对你猜疑，只要考不中就行了。卷子是想答对不容易。想答错还难吗？”

父亲的话使我顿开茅塞，我就这样抱着故意不考取的目的，进了设在旧城的留日预备学校考场。这虽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但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试卷中有一道题目：蒙疆地区的著名产盐地在何处？我明知应答锡盟东乌旗盐湖，我却故意写成“土默特旗中海流村”。不考取的目的，当然容易达到了。

当时日伪的宣传声势比我党抗日的宣传声势要强大的多，父亲作为一个初通文字的朴素农民，为什么他不相信日伪的宣传说教而能看到日寇在中国占不长的形势呢？这首先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反日爱国感情的本能反映，同时也是受了二叔出走延安和大青山抗日活动的影响，因而他才给我出了前述那个故意不考取的对日寇保持高度警惕的主意。

1943年初秋，我在集宁的伪蒙古绵羊协会平地泉种羊场学习绵羊改良技术，结业后被分配到该协会公会种羊场（在张北县公会镇内）下属的尚义种羊管理所（在大青沟镇）当技术雇员，临走之前我回了一次家。我虽是日伪小企业中搞绵羊改良工作的小雇员，但父亲还是基于上述原因，反复地告诫我说：“不管怎样也是在日本人手下当差做事，日本人在中国是占不长的，要

多和老百姓交朋友，绝不能苦害他们。”我在近两年的小雇员生活中，就是按照父亲的这个教诲来工作和生活的，在大青沟镇内和附近农村交下了不少家境贫寒的穷朋友。因此，在日寇投降、八路军解放了这个小镇以后，有些伪警政人员逃跑了，我却安然地一直呆到1946年春季参加了革命。

四、婚事费周折

在二叔还没走时，因他年令已很大了，父亲就通过我一位亲戚的媒介，从城东八拜村为二叔定下了一门亲事。定亲不仅要给女方一批彩礼和衣服钱，而且按那时的规矩，从定亲至娶亲，女方每年的穿用也得由男方负责供养，再加上我上学也得花些钱，所以在二叔走后我家的光景也就越来越紧了。

大约是在二叔走后第二年秋的一个上午，我们村的刘巴应大爷来到我家，因见父亲和三叔进城果粮不在，就对母亲说：“富山让我亲戚毛拴给你们捎来话，说他在‘那地方’很好，让你们放心，并让好好培养给他订下的媳妇。”母亲问“那地方”是哪儿，巴应大爷只说“就是那地方嘛！”不具体告知。又问毛拴在哪里，说是在他家，就要走了。于是，母亲赶紧跑出去追上骑着毛驴刚出村的毛拴想问个究竟，但毛拴除了前述那几句话外，什么也不说就走了。父亲回来后又到巴应大爷家问了情况，这才知道毛拴与塔布赛（指乌兰夫家）有

亲戚关系，所谓“那地方”指的就是延安。自此之后，父亲就更加尽心竭力地“培养”二叔的这门亲事了。

听说和二叔订亲的这位姑娘人品端正，很是贤良，但她不幸早年丧父，婚事得由哥哥做主。这是旧社会妇女“三从四德”的一条原则，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她的哥哥总想从妹妹的婚事上多捞些油水，多使唤些钱，这样一来在二叔亲事上的花销自然也就多了。那时，我家的家境是很紧的，父母亲和三叔从来不花一分闲钱，父亲对我说的学费卡得特别严，每学期花多少钱都得一笔一笔记起来回家报帐。因此，我在“南高”上学三年半，从来没看过一次电影、一次戏或下过一回饭馆，有一次买了两分钱辣椒糊糊沾馒头吃的帐被同学们发现了，他们讥笑我太吝啬。其实我何尝不想买些零食吃，而是父命不敢违。父亲虽然对家人很刻薄，但是在二叔的婚事上却表现得很大方，尤其在听到毛拴捎话后，更是十分慷慨，除了依时按节给姑娘送上吃穿外，每当和媒人、姑娘的哥哥商谈有关事情时，还要在麦香春、凤麟阁这些名饭馆内用大鱼大肉款待他们，并且按照女方提出的要求，要丝绒旗袍就给丝绒旗袍，要金戒指就给金戒指，从不拒绝，生怕人家发现家穷，吹了这门亲事。这么多花销从哪儿来呢？除了出卖粮食和土盐外，再不够就借贷。好在父亲有个好信誉，对到期的债务，哪怕是借东补西或变卖家产，总要按期还债，说一不二，所以光景虽穷，也能借出钱来。

订亲的目的是娶亲。女家见父亲对这门亲事是只作

供养不提娶亲，就以姑娘大了为理由主动催娶。起初，父亲以二叔“念书”不在为由往下拖，但“念书”总不能一去几年不回家，慢慢地女方家就测听出二叔不是当国民党兵就是八路军，肯定不在伪蒙地区呆着。姑娘倒好，不管二叔干什么也想等着，可她的家庭不同意，非逼着我家限期娶亲不可，否则，他们就要另行许配，对彩礼和别的东西，除去姑娘已吃用的以外，其余的让我家看着办。这一下可真难坏了我父亲，既不能娶，又不能再拖，只好允许人家另行许配了。至于彩礼物品，父亲和三叔一商量，觉得人也娶不回来，还要那些东西干什么？尤其担心的是为退财物而引起纠葛要深追下去后果不好，所以也就一忍算了，什么也不要了。父亲和三叔费尽心机和财物为二叔“培养”的这门亲事，就这样弄了个“竹篮子打水”人财两空。

五、逢凶化吉祥

父亲对二叔到延安之事，尽管对谁也不肯轻易讲，但时间久了，总还是泄露了消息。这就难免不出问题。

二叔婚事的失利和连年欠收，我家的欠债越来越多了，全家人很是忧愁。在1944年冬季，父亲和三叔又闹了一场伤寒大病，自此以后，生活更加困难了。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出现了一场财主告状的风波，真可谓“流年不利灾难多”了。

在1945年旧历二月的一天，突然有毕克齐伪警察署

的两个警察到我家对父亲说：“署长让你走一趟。”父亲问是什么事，他说是署长没说不知道。父亲对伪警署长的传讯有些害怕，但从两个警察的身上又看不出多大恶意。当时，父亲在大病之后因得不到应有的补养，身体还未完全复原，本不想出门，但对署长传讯又不敢不去，于是，草草作些准备，拖着虚弱的身体，硬着头皮在当天下午赶到毕克齐警察署。一名警察传下话来说：“署长现在有事，让你先在院里等着，有空时再叫你进去。”

说来凑巧，人不该出事总有救。在毕克齐警察署当伙夫的王掌全，是王毕克齐村人，与父亲是远房的姑舅亲。他见父亲呆呆地站在院里等署长问话，就急忙走过去在父亲脚上狠踩了一下说：“你要小便时厕所在这边，跟我来！”父亲对这位姑舅的用意略有领悟，边跟他边走边说：“我早想尿，就是找不到厕所。”两人走到没人处，王掌全赶紧低声对父亲说：“署长传你是你们村×××为富山到延安的事，给署长送了100斤白面和几两大烟将你告下了。其实署长也与‘沟里’有来往，明里不接他告的案子又不行，他把你叫来不马上问你，让你在院里等着，大概是想给你个逃跑的机会，质在面上就不好办了，你还不跑等什么，快到别处躲一躲吧！”父亲听后又惊怕又感激地说了句“啊呀！原来是这样！姑舅你可救了我了！”赶紧溜出了警察署，在毕克齐附近的亲友家躲避了七八天，打探准警察署再没追究这个案子才回家。父亲和全家人都认为，这是托八路军的洪

福才逢凶化吉祥，避免了一场大患。

父亲这次回来，表面装着没事的样子，见到这位告状人还得和往常一样，兄长弟短地称呼，内心却十分恨他：你为什么要花上钱借日本人的刀置我死地呢？至于这位告状人看到父亲安然地回来又是怎样想的，那就不得而知了。又过几个月，日寇投降了，“沟里”人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八路军的大部队也不断在这一带过往，父亲的这口气总算松了一些，但这场官司还得和往常一样不声不响地拖着，因为绥远的大局总还是由国民党主持着。一直到全国解放以后在我们村召开的一次土改反霸群众大会上，父亲才声泪俱下地吐出了憋了多年的这口气，告状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花钱错告“抗属”的一条罪行。这场不声不响拖了六年的官司，到此才得到了公平合理的解决。

以上记述，因父亲去世多年，母亲年迈记忆很差，我又调查访问得不够，如有忆述不准之处，请知情人谅解和指正。

（编辑 赵国恩）

（上接59）

我说，她家没有燃料了，让我给她弄些炭，我满口承应下了。以后，她经常来找张汉石、李维忠同志，由于我先离开了萨拉齐，以后的情况就不了解了。

查获归绥国民党 三青团女主任的经过

塔拉

一九四五年秋末冬初，正是绥远战役紧张之时，我随绥西专员李维忠同志进驻到了萨拉齐镇，当时，萨拉齐镇是县政府的所在地。不久，又来了许多干部，其中有绥蒙区党委的同志，也有从延安和晋绥来的同志。绥蒙区党委来的同志中，有一位是绥蒙区党委城市工作部的副部长，名叫张汉石。他身躯魁伟、端庄匀称，面孔白净、带着眼镜，三十左右，举止稳重，身边还带着许多便衣人员。那些便衣人员，有的穿得和讨饭的差不多，有的象走口外的商人……。这些人经常向张汉石同志汇报情况，但在公开的场合是不出面的，只和张汉石同志一人接触。由于工作关系，我虽然经常见到他们，但从未参与过他们的情报活动。

张汉石同志不仅要听取那些人所反映的情况，而且还要审阅许多敌伪材料。当时府院内到处是国民党逃跑时丢下的文件、破纸，有的文件原样未动，仍放在桌柜里。别的同志因没有时间都没把这些东西当成回事，不

是点火就是揩屁股，或扫出门任其乱飞，而张汉石同志却把这一堆“废纸”当作宝贝，收拾起来反复查看、细心研究，除此而外，还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因此，他对敌情无论是公开的或是隐蔽的都掌握得比较全面。

我当时算是忙人，除了完成李维忠同志的任务外，还要管镇内的一些事，而张汉石也经常让我跑腿办事，特别是抓了几十名可疑的人犯也要我看管，有时还得进行审讯。

有一天晚饭后，张汉石同志叫了县委书记张翼诚和我，说要出去找个女人，至于什么样的女人，他没有说明，我和张翼诚也弄不明白。他领着我们出了旧萨县政府门一直向西走，走到约离县政府门三四百米处，转入一个向南的巷子，走不多远，又进了路西的一个大门，看样子他对路线是很熟的，只是让我和张翼诚给予协助。他进了院就和院里人打招呼，说些与那女人不相干的话。在我刚迈进大门这一瞬间，从南边过来一个穿戴较为讲究、脚蹬一双皮鞋的女人，我发现后，就赶紧撤回身看她往哪里去。就在这时，张汉石同志在院内大声呼唤我，连唤了我几次，不得已，我将那个女人的去向放弃，回到院内，并向张汉石同志说：“门外有个女人。”他说：“不是”。我心里想，你没看到就知道不是，还没等我再开口，他便指着东厢房最北头的一间屋子说：“那间房里刚才躺倒一个女人，快去问她叫什么。”他大概是从小玻璃窗看见的。我走到那屋门口，室内平静，推门进去，果然炕上躺着一个女人，还有几个小孩

儿。这个女人有三十岁上下，穿得很破，与刚才在门外看到的那个女人相比，悬殊很大，象是很穷的样子。

见她躺着，我便问：“你贵姓？”她回答说：“姓韩。”我再问她叫什么，她用同样的口气答道：“我叫韩香兰。”张汉石同志在我后边，那个女人的答话早已听见。他走进门说：“韩先生起来吧，你不叫韩香兰，你叫韩佩兰。”那女人没答话，慢悠悠地从炕上爬起来，低着头，用一只手托着炕，显出一付无力支持的样子。这时我还不明白，张汉石同志为什么叫她韩先生，看来这个女人的身份不一般。她虽然穿着破烂，住室简陋，但称她为“先生”时却毫不惊惶，也不狡辩，非常坦然，这更使我莫名其妙。

天色已经昏暗，屋里点起了小油灯，这个人坐在炕里仍然是无精打采、垂头丧气，我们三人坐在了炕沿边儿，那几个孩子由于看见陌生人一声不响，有的已睡着，有的还呆呆地坐着，好象要听我们说些什么。

这时，张汉石同志单刀直入地说：“韩先生，你是国民党三青团归绥女团务筹备处主任吧？”她供认不讳。

“那你丈夫何清怀是国民党绥远省省党部的吧？”

“对”她不假思索地答了一声。

紧接着，张汉石同志又提出了许多问题，她都作了回答。关于绥远省国民党的一些情况，她比较了解，应答自如；关于军事上的问题，她可能不了解，回答不上来。当问到我们来时她为什么不跑时，她答道：“丈夫

不在，孩子多，无人照管。”接着，她又边叙述边咒骂起国民党杂牌军是怎样把她父亲及其他亲属迫害致死的。这是否真实，我们未去调查。谈话进行的时间较长，我和张翼城同志由于不了解情况，提不出问题，只是给张汉石同志作陪。

夜已经很深了，张汉石同志提出要她跟我们走一趟，去见一见她的老同学李维忠同志。她强调没衣服，说衣服都埋在了地下，穿戴不好不想去。经我们再三说服，总算下地了，可她站在地上象个木头人一样，既不动也不语，我还以为她傻了。好大一会儿她才说出话来，还是不想去。我们又作了解释，她才勉强跟我们出来，但走得很慢。到了旧县政府，她见到了李维忠同志。李维忠同志给她讲述了我们党的政策，要她继续好好交待。谈话时间不长，也没有叙旧。谈话已毕，张汉石同志让我们把她送回去，她可高兴了，转身就走。这时，已是半夜时分，由于战争年代，街上没有行人，我们走在街上，显得非常寂静，清冷的西北风吹打在身上觉着很凉。这个女人不知是冷还是急于回家的缘故，走得很快，就连我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也得快步紧跟。

第二天中午，她出现在旧县政府院中，一反昨日的样子，身穿呢大衣，打扮得很精干，显得俊俏多了，与昨日相比，判若两人。她手中拿着写好的一份材料，步伐轻盈，径直走到了李维忠、张汉石同志的房内，交了材料后不一会儿就出来了。她的精神爽快，眉开眼笑，一扫惊恐之状，并且用理直气壮的口气向（下转55页）

《蒙古知行月刊》 创办的经过

殷石麟

一 《蒙古知行月刊》创办的原因

创办刊物的愿望，在我一进入青年时期便产生了，但由于当初各种条件和社会自身的约束而未能如愿。

“九·一八”事变，使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主要矛盾。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北平学生联合会召集北大、清华、师大、北平大学法学院、燕京、辅仁等大学的学生游行示威，并到南京请愿，要求全国抗日一致对外。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我曾参加了这一学生运动，目睹了卖国政府的暴行，激于义愤，又一次萌生了办刊物的念头。经同当时在北平读书的同学寒峰（李成林）克力更、墨志清（云林宝）等同学商量，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便决定以土默特旗旅平学生会的名义办一个不定期刊物。回想当时促成办学生刊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欲改良和发展蒙旗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观愿望

在我的童年时代，便常听到父辈们关于土默特放垦和匪祸的谈论，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社会实践能力的增长，使我对当时蒙古民族的处境和前途产生了无名的担忧，一是因为晚清以来当局者对蒙古人民的控制、压迫日益加深；一是蒙旗统治者内部倾轧斗争和腐败无能日趋明显。这就是我最初产生办刊物想法的主要思想基础。

由于我蒙古民族传统生活习惯和王公制度本身的落后，再加上明、清及民国以来历代统治者从未放松对阴山南北蒙古人的绥靖羁縻政策，使蒙古民族在政治上自主能力和经济上的维持现状能力渐趋孱弱，特别是晚清和民国初北洋军阀时期，采取了肆无忌惮的放垦和人口渗透政策，使蒙古民族利益受到极大侵害。虽然东西蒙都曾暴发过反开垦的抵抗运动，但都被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血腥镇压扑灭了。

另外，由于军阀间的拉锯战，塞北地区成了兵海。绥远地区遍地都驻有军队。继第一任总统马福祥之后，走马灯似的在短短几年中先后换了李鸣钟、商震、汲金纯几个都统。一九二七年春，奉军撤退，不久，傅作义担任了绥远省主席。在这一段时间里，蒙旗人民备遭涂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军队的流动，使晋、陕一带汉人大批迁入，在政治管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同当地蒙古

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矛盾，而绥远当局便利用这些纠纷和矛盾，挑起民族争端，达到“旗县并立，蒙汉分治”，从而进一步控制蒙旗的目的。

东西蒙区地域辽阔，有丰富的地下资源和赖以牧畜的肥沃草原。然而，由于王公贵族的腐朽无能和落后的文化教育，除土默特旗在大青山开发了一些煤矿和少量云母、石棉、铜、铅等矿外，其它蒙旗尽是闭关自守，并不愿接纳先进文化和技术人才。各旗王公互不团结，各自为政，只懂得盘剥旗民，致使许多蒙旗人民贫病交加，挣扎在死亡边缘。

如果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一株没有旺盛生机的病树，那么蒙古民族则是这株大树上最无生气的病枝。对于这一点，当时一些比较开明和有一定见解的蒙古上层人士是明白的，而我们这些蒙旗来北京读书的年轻人则更是评头品足谈论不休，大家都认为有必要用一种统一的意志和思想来改变蒙旗的这种落后面貌，于是大家都想到了办刊物。

（二）在文化复兴和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下

从归绥来到北平，对于我来说是从一个混沌落后的社会状态过渡到一个清醒审慎思维状态的。在北大读书期间，我耳闻目睹了许多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同时受到教师和同学们积极向上的爱国热情的影响，因而，我象当时许多单纯热情的爱国学生一样，萌发了文化复兴、实业救国的思想。

由于我是跃出蒙旗社会的生活实践而赴平读书的，因此蒙旗社会中的愚昧、落后、专制和几乎是空白的民族教育事业，总象一只无形的手，时时扼在我的心头，令人常有窒息之感。于是，一种振兴民族、发展蒙旗教育事业的责任感，便驱使我毫不犹豫地考入北平大学教育系。因为当时许多同学并未找到彻底救治中国的革命道路，故而实业救国的思想也曾使我们许多蒙旗同学一度产生了无名的希冀。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和土默特旗旅平学生会的部分同学便进一步认识到办杂志做宣传的重要性；于是，大家在谈论中便自然地增加了一个如何办学生刊物的议题。

（三）在中华民族垂危的呐喊声中

“九·一八”事变，使中国在一瞬间失掉了东北四省，三千万各族人民在日寇的铁蹄下痛苦挣扎。许多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奋起抗争，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血腥镇压。许多青年学生纷纷逃进关内，沦落北平街头，一时间悲声四起，到处是要求抗战的呐喊。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军长驱直入，东部蒙旗相继失陷，北平亦在日寇覬覦之下。张学良困居顺成王府，一筹莫展，不久便离平南去。同盟军的长城抗战在蒋介石的百般压制下也归于失败。宋哲元，佟麟阁、于学忠、刘汝明的二十九军，和战不决，集兵于冀察一带，似乎有制敌于长城以外的雄心。

为蒙古高度自治而四处奔波的德穆楚克栋鲁普，此时正以百灵庙为据点，积极活动，苦苦寻求来自各种势力的援助和支持。各蒙旗王公虽被蒙政会大旗所征集，却各怀异志，同床异梦。日寇一方面扶植日伪势力，一方面又同国民党当局眉来眼去，而真正的反日群众运动和自发的抵抗力量却受到来自多方面的镇压、挟制，中华民族危如累卵，蒙古民族亦面临着一场不可抗拒的灾难。

我们土默特旗旅平学生会的许多同学都为之焦急，大家均认为办一种宣传抗日图存，鼓吹蒙旗团结御敌的学生刊物势在必行。一九三四年春，我们终于商定了办刊物的计划，并四处联系，积极进行全面的筹备工作。

二、《蒙古知行月刊》的创办经过

一九三四年春，我在归绥与叔父（当时任土默特旗总管的荣祥先生）谈及办刊物之事，叔父认为很有必要，并说愿意帮忙。回到北平后，我与几位同学说起，大家都认为有荣祥先生支持会好办一些，便开始酝酿创办刊物的有关事项，第一个难题便是出版基金。大家都认为绥远当局绝难赞助，而土默特旗又经费支绌，势难久持，于是将希望寄托在百灵庙的德穆楚克栋鲁普身上。当时德王尚未投入日寇怀抱，并举帜一隅积极经营蒙古事业，甚需一种有益于民族文化、实业教育的刊物，所以最易得到他的资助。

是年暑假，我受托由归绥赶赴百灵庙，办理此项事宜。由于这年四月二十三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成立，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和蒙古上层人士如黄绍雄，楚明善，白云梯，吴鹤龄、陈赓扬等接踵而至，百灵庙一时间成了蒙古地区活动轴心，热闹非凡，而我去的时候，德王尚未摆脱这种忙于应付的局面，于是我担忧是否能见到德王。出事意外，我很顺利地见到了德王，他听我说明来意后，笑了，并说青年人就应该做点事情。他似乎并未有应付我这个初次见面的学生之意，向我讲了蒙政会令人忧心的处境，庞杂的机构只领到三万元的开办费，职员不论等级每月只领十五元生活费，最后他笑着领我到外面说：“你等几天吧，我总能给你弄点经费，你们这是办正事。”几天后，在一个公开场合，德王将我的事向各位王公说了，要求大家捐赠，他自己先拿出三百元，于是，大家纷纷解囊，很快就筹集了九百多元。

开学后，我们同西单牌楼的一家印刷厂联系，创刊号因篇目多，用工料多，所以印五百册花工本费一百二十余元。刊印已定，我便开始约稿和收编。寒假期间，我回到归绥，邀请荣祥先生为封面题字，并约荣祥先生写了一篇历史性文稿，同时还邀请经天禄（革成）先生为该刊写了一篇有关蒙旗教育的文章，其余大部有关政治、经济，文教卫生、文艺生活等方面的文章，多出自在北平读书的土默特旗同学之手。至于刊名，是受大教育家陶行知之名的启迪而来，后大家斟酌再三，以为实业

救国应先知而后行，故称作《蒙古知行月刊》虽称月刊，其实是不定期刊物，为十六开版面，以宣传蒙旗团结抗日图存为宗旨，力图发扬蒙旗文化，促进地方事业，联络蒙汉感情，计有插图、专载、评论、国际、公教、文艺、拾零等栏目。该刊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印出创刊号，分别赠送各著名大学、图书馆，部分报刊杂志社，绥远省部分机关，其中大部分赠发蒙政会、土默特旗及其它蒙旗和蒙古知名人士。一九三五年仅出四期，一九三六年三月刊行第五期。同年六月，因我毕业回绥，社址由北平土默特旅平学会迁至归绥。因为当时和我共同承办该刊的几位同学在蒙藏学校继续攻读，我只得请《绥远晚报》社贾汉卿先和《绥远日报》社任漂萍先生一同玉成其事。该年又出三期，总计为八期。一九三七年由于时局骤变，《蒙古知行月刊》也就销声匿迹了。

亲历见闻片断杂忆

张希孟

放翁有诗云：“少壮只知鞍马事，当年那意老耕桑！”可见回忆往事是古今老年人的通病。不过陆游是因为不能实现他的抗金抱负才为诗寄慨的，我却每忆往事，虽无贱耕之心，殊多啮脐之悔呢！

好在也有几桩杂七杂八的亲历见闻，我自己还认为是颇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故把它组成一稿，以表达我响应旗政协文史委员会征文号召的心迹。

一、王富老人二三事

我们善岱村有一位现年八十四岁的老人，他步履矫健，腰板笔直，虽然蓄着一撮小胡须，但看上去谁也不敢认他是超过六十岁的人，他就是王富。

党的地下通讯员

王富老人初通文字，个性耿直，思路敏捷，有胆有识。他的青少年时期，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一九四〇年

(民国廿九年)春，经过善岱人杨还福的引进，他结识了王瑜山、姜文华、杨济春和奎璧同志，当时奎璧住在杨还福院内，设馆课徒，以教私塾为名作领导工作。从此，王富即以伪盐务推销主任的身份作掩护，担任了党的地下通讯员，并利用他在善岱形成的乡绅地位，冒着生命危险，协助奎璧诸同志积极开展工作。

一九三九年农历七月初，新任善岱伪警察署长袁震宇，下马伊始，立即召集所辖七十四村伪保甲长开会，声明约束，当场宣布：“倘有胆敢给大青山八路军供应财物者，一经察觉，格杀勿论，绝不姑宽”。奎璧同志根据这一严重敌情，连夜在书馆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并提出即调手枪队将袁暗杀的初步意见。参加会议的有杨还福、王瑜山、姜文华、杨济春、红旺子和王富。王富建议用擒纵结合的办法，他说：“不如先给他一个严厉警告，争取他能暗地帮助抗日工作，如其顽固不化，再杀不迟”。大家秘密酝酿后，采纳了他的建议。

袁震宇强迫善岱镇为他的履新在七神庙(现邮局路东门市部旧地)唱戏，表示欢庆。七月七日夜晚，正演唱油梨旦的《凤仪亭》，因那时还没有电灯，在台口上吊的是汽灯，照得人们非常刺眼，广大农民群众，一因农务正忙，二因对汉奸痛恨，去看戏的人很少，这就显得戏场冷冷清清。街面上的店铺，更是门掩烛摇，越发萧条。伪警察们游门串户、打牌吸毒，俱乐部(官赌场)里呼吆喝六、免三去四，伪警署门口，只有一个哨兵抱着

枪，蹲在墙角站岗。

但见新到任的伪署长袁震宇，头戴日本帽，身穿协和服，腰挎东洋刀，鼻梁上还架着一付墨色镜，神气十足地走出来，一个卫士手执电筒在前引路。这时，王富给红旺子打了暗号。因为袁震宇的公馆是住在乡绅大户呼贵(字子英)的院子里，杨家小巷是他必经之路，所以红旺子就领着王瑜山、姜文华几位同志，紧步抢先进入小巷的隐蔽处等候。卫士把袁通过戏场送进巷口返身走后，不防从暗处跳出几条好汉，手枪顶在伪署长的胸前，低声喝道：“不许动！我们是八路军，我军已把善岱包围了，你若喊叫就打死你”。“啊！不要开枪，不要打，有事商量！”袁震宇哆嗦着回话。王瑜山用手枪逼着命令他乖乖地走出村外，进了高粱地，袁即跪地求饶，王对他说：“你也是中国人，炎黄子孙，我们不愿杀你，但有个条件，你只要能立功赎罪，暗中支援我们抗日就行，否则……”袁还没等王瑜山把话讲完就插话道：“行！行！我行！我也是中国人，只要贵军有命令，我保证支援抗日。”王瑜山随手递给他钢笔和纸，让他写下字据并押了指模。此时，王富领着呼贵，踉跄赶到高粱地，呼贵出面说情，王富佯装帮腔，将袁震宇保下，王瑜山又警告说：“你以后如果变卦，我们就把你写下的字据交给日本宪兵队，连你的保人也不放过”。

在返回路上，袁震宇不无怀疑地问王富道：“你们是咋知道的？”王说：“我正在戏场看吕布戏貂蝉，听

说署长被绑架，就赶紧去叫呼子英来救你……”袁听了后一再表示谢意。但为时不久，他真的变卦了，并加强了自身的戒备。

王富就找到袁震宇家里，表面上还替他出谋道：“署长在明处，八路在暗处，咋能防住人家不再加害于你？再说我和呼贵都是当地人，有大有小的保下你，署长是东北人，能调走也能回东北，我们这些保人不是跟上你得大害吗？况且接济八路也不算坏事，又不用你出钱给东西，你不说，八路不说，我们这些地方人也不说，日本人怎能知道？人家还拿着你写下的字据，岂能饶了咱们……”袁震宇听完以后，长吁一口气屈服了。

从此以后，凡是我军派下的任务，袁震宇总是千方百计地支援，并多次掩护我工作人员脱离险境，转危为安。

幸免于难

王富的工作量，实际上已经大大地超出了地下通讯员的负担。他对袁震宇的争取，收到了预想不到的效果。例如有一次，日本占领军一百余人，突然包围了善岱镇，直称是“来抓八路的干活”的。当时姜文华、杨济春正在街上走动，王富急忙找袁震宇设法解救，袁当机立断，让姜、杨二人躲藏在自己的公馆。鬼子兵挨门挨户搜查，没有发现。再如日寇根据喇嘛营子张登海这个汉奸的告发，以十辆汽车所载的鬼子兵将善岱镇包围，把善岱村所有的成年男人都箍到七神庙里，按告发

名单点名捕人，呼贵，杨还福、武贵贵、张国兴、邢华、李亮、白海青、李广英等廿七人，被抓到萨拉齐伪县署，除村长李亮已被严刑拷打、煤油辣椒水灌死外，都被解送到张家口，杨还福被迫害致死在囚牢，其他人释回，唯对袁震宇仍羁狱不放。但由于伪警察署巡官曹士英与王富交情甚好。故在集中到七神庙点名前，他发现黑名单上有王富，即密嘱王富藏在警察署的炮楼里才幸免于难，王遂串连地方士绅多人，联名将袁震宇以身家性命保释。袁遂跑到哈拉寨去投了马占山。

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了绥远，王富又以萨拉齐少校护路大队长的身伤作掩护，继续给大青山根据地的八路军提供各种情报，并支持自己的孤子王建德奔赴绥东，参加了革命队伍。

急人之所急

八一年的某一天，有一位中年妇女领着她的姑娘，千里迢迢从保定到了善岱，她向人们说：“我的姐姐是三年自然灾害时嫁到安民村的，但姐夫死了后她又嫁到武川去了，她有一个姑娘叫爱爱，是和善岱村里人结婚的，我们找了半天也没有打听起来！”说着她急得要哭。王富听了以后，他知道武圪旦娶的是安明村的姑娘，就骑着车子到武家，向武妻盘问“在善岱还有谁是娶的安明村的女人？”得知爱爱是孙贵贵的老婆，王富又去找见在加工厂工作的孙贵贵说明情况，孙虽承认妻子的姨姨在保定，但因正在磨面，急切不能离开，王又

代孙去领亲戚。不意那母女二人已向安明路上走去，王富遂即追上去把东西驮在自行车上，领上她们到了孙家。爱爱以激动的心情买上高级纸烟向王致谢，他当然不会接受。

八四年四月，公布村八十四岁的老人张老虎，因在外地工作的孙女给他寄来十元人民币，他扶着手杖，走到善岱邮局取款，没想到正是星期日不上班，张老人气喘痰阻，急得哭了，因他已经精疲力竭，走回去走不动，坐汽车没有钱？这时候王富正站在他的面前，便说：“你到亲戚家住一夜明天取还不行？”张老汉却说：“我在善岱没亲戚”。王富想了一下就说：“那就到我家呆一宿算啦”。张老虎又说：“我还养着两只鸡，门也没锁好，不放心……”。于是王富拿了他的汇票去邮局找董进勤同志，董看了汇票后说：“手续完备，明天一上班即为取款。”王富借了十元钱先付给张老虎，并给张亲自装好在内衣袋里，以防被坏人掏走，还搭了两角钱给买了一张交通汽车票，亲手把张老虎搀扶上车，张老虎激动地说：“老王，你回去吧，咱俩相差不了几岁，你比我硬强多了，谢谢你吧！”

热爱生活

王富老人一贯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所以更热爱生活。他现在虽然是耄耋之年，却无龙钟之态，倒有童稚之心。在八六年察素齐的物资交流大会期间，他吃完早饭就骑上自行车去逛会，看罢晋剧以后再骑车回

善岱，一些年轻小伙子们在后边蹬着车子直追，追上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是“王富老爷爷”。邻村若有什么娱乐活动，他总要去凑热闹，他自己没有任何嗜好，还爱关心别人的生活，所以在村里不论大事小事，多有王富斡旋，笔者的老伴，竟然是他给先借上钱撮合在一起的。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富老人更热爱生活了。

二、纳音太爱祖国

一九五五年秋，我在呼和浩特坐公共汽车，突然有一个身穿呢子衣服的人站在我的面前，他两眼直盯着我不放，我也觉得很面熟，但又不敢问。他却先和我搭了腔：“你不是副团长张希孟吗？”我说：“就是，你是谁？”他一下握紧我的手坐在一起说：“我是纳音太”。二人久别重逢，相谈甚欢，他告诉我他在呼盟当处长，约我无论如何去他那里观光，游览、住些时日，遂匆匆下车而别，再未见到。

寻找报国之路

纳音太是呼伦贝尔盟蒙族人，因家境贫困，二十来岁就跑到伪蒙古军当兵，后升任排长，一九四三年随海福隆起义，投诚到鄂友三部，海被傅作义任为蒙古兵团长，纳音太被提升为少校连长。该连有一百来人，枪马

齐全，都是清一色的东盟人，在海福隆指挥下，游击于武川、固阳、陶林各地，给日伪军以很大打击，成了鄂友三部的主力之一。

纳音太沉默寡言，勇敢善战，个性耿直，有正义感。他很能体恤部下疾苦，故全连士兵无不乐于为他效命。

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初，鄂友三率部曾一度到过准格尔旗。他发现某人的妹妹很可爱，就要求伴宿，某即对他说：“我的家庭不是那样的家庭，再说我也不怕你，不过你若真爱的话，通过正式聘娶手续结婚倒可以”。鄂遂托媒人，交纳彩礼，择吉备筵，遵俗成婚。但同居几天后，鄂因奉命开拔，即将某妹扔掉，某即派兵将其妹送到归绥（现呼市）给鄂友三。鄂友三说：

“糜马用鞭子，糜人用窟子”，即将某妹赠送了纳音太，以示笼络。不久，马占山向傅作义指名要海福隆拨归他节制，傅即征求鄂的意见，鄂友三认为遵命拨给还能落一个情顺义顺，否则，海福隆也会拉走，反倒鸡飞蛋打，但又提出要把纳音太这一连留下，因此，海福隆带了那几个连，跟马占山在大同与八路军作战时举行了火线起义，纳音太因被留下未能参预。他从伪蒙古军投到鄂友三部寻找报国之途，倒陷入了反人民的内战旋涡，不啻从灰坑里跳进了火坑。

清廉自持

一九四六年春，鄂友三部以骑兵挺进第五纵队改编

为绥远省保安师，下属三个团，李存英、邢守忠、郭棠分任第一、二、三团团长，我为第二团中校副团长，纳音太任二团少校机炮连长。有一天，我去该连视察，看见纳的枕巾如同蜂窝一样破烂，可洗得很干净。我暗暗在想，鄂部从抗日打游击到解放战争以来，纪律一直不好，大部分官兵都发了点横财，纳音太是连长，他为什么如此穷困呢？我带着这一问题多次和他聊天，才摸清他本人虽然连纸烟也不抽，但全连战士却都吸毒，所以他把钱都补贴给部下了。他说：“副团长，我们没办法，不敢胡作非为，别人都是十大区鄂师长的老部下，我们跟的历史短，是孤立的，万一有点差错担待不起，所以我约束部下，宁可把自己的薪饷给了他们去抽大烟，也不许他们骚扰百姓。不让他们抽吧，尽是一些患难朋友，唉！骂上他们也不行！”从他的谈话中，我认为他是讲义气、清廉自持、爱护战士的人，思想上产生了同情感。四七年冬，保安师改编为骑兵第十二旅，下辖两个团和一个辎重营，李存英、郭棠分任第一、二团长，张汉璉为辎重营长，我是一团副团长，纳音太编为一团少校连长。说也奇怪，他不管是自己连上有什么问题，总喜欢向我请示，我又不好拒绝，因此就引起了李存英的怀疑，李竟然公开扬言“纳音太是副团长的卫队连长”。

四七年七月中旬，在土木尔台与乌力吉敖其尔的部队激战，李存英率领所部，叱咤当前，奋勇冲杀，将乌部击退，纳音太缴获了辎重五骆驼驮子，他向我请示

“该如何处理”，是我感到纳连太贫困，就对他说：“你们连自己处理算了，不必上交团部啦”。纳很感谢我对他连疾苦关心，硬送了我一个蒙族人使用的银碗作为纪念。但李存英知道以后，真是气冲斗牛、怒火三丈，一再向鄂友三要求调换副团长，否则他不干了。因此，我被调到旅部当附员，所谓附员就是挂名吃饭。我当面骂了鄂友三，事后，旅参谋主任杜海荣暗地对我说：“鄂为人心狠手辣，你不如趁早离开他”。于是我找董其武主席，他任我为保安第十四团上校团长。鄂友三还以临阵脱逃为由让董将我查办，却被董拒绝。

纳音太呢？他仍然担任着李存英团的连长。

枪毙国民党队长

一九四八年冬张家口解放以后，国民党的察哈尔省军政人员及察北各县的地方团队纷纷逃窜，麇集在武川县后大滩一带，此地正是纳音太连的防地。有一位察北某县的队长，因他所穿的一双新礼服呢鞋被房东的小孩拉上了屎，竟然气得鼻孔冒烟，嘴里喷火，使出了残酷暴戾手段，亲自把小孩子的屁服用刀子割了。纳音太听到以后，义愤填膺，怒火难遏，找到那位队长就把他一枪击。事后，鄂友三奉命扣捕纳音太，纳即率领他的连队，向康建民同志的部队投诚，终于找到了报国之门，实现了热爱祖国的愿望。

三、贼寺丑态

三年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共歼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把蒋介石追到台湾孤岛，大陆人民彻底翻身。解放军功德无量，赢得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这是很自然的事，然而“能谈贼寺丑，只有还俗僧”。笔者曾毕业于黄埔十期，历任国民党部队的团级军官多年，因此，耳闻目睹及亲历，颇知其内幕丑恶，仅揭三则，以窥全豹。

三七抽头的队伍

国民党的政权，千疮百孔、腐烂透顶，上边要独裁的蒋介石发布一项政策，下边要割据的各省“藩王”就来一个寓行政策之中的对策，借以发展自己的势力。由于办什么事也要花钱，所以办什么事也要贪污，这反映在他们的部队里，也是如此。

国民党的军队编制，先以步兵为例，每连是一百七十多人，但空额少者十数名，多者达三四十人，如以编制核实兵员，前者算最好的连队，后者就是三七抽头的大连了。这些空额的粮饷，都为师、团、营、连长逐层侵吞以去。倘系骑兵，除人空额外还有马空额，每匹马的待遇等于三个兵的数量；炮兵呢？除人马收入外还有洗擦保养费；工兵虽然没有马，但器材费和爆破费相当可观，当然足以按月大餐；而最能发财致富者莫如交通

兵，他们每年驾驶着汽车到处运货做买卖，大搞无本生意，此种现象在国民党的部队里是公开的秘密，也是司空见惯的。尤其是所谓中央军更甚，这些被蒋介石娇生惯养的嫡系“王牌军”，上下交征利，彼此争发财，谁也不考虑怎么训练部队、怎么爱护士兵和怎么完成作战任务，唯一冥思苦想的都是怎么能多吃空额，而且在查点时不被发现。如果从甲地移防乙地时，头一个碰心的问题就是携带些什么货物，能赚多少钱。因为都在发财上下辛苦，算盘子打得很细，所以官不恤兵，兵不敬官，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互不关心，以致积怨，无组织、无纪律，形同乌合之众。这种队伍纵然手拿原子弹，一旦打起仗来，也只能跪地求饶，缴枪不杀，去完成“运输队”的义务。

淳梁溃败

一九四六年初春，察绥地区依然寒风积雪、冰冻未解。康建民同志的骑一旅，经常出没于察绥晋北一带，严重地打击着国民党的县、乡政权和地方团队。由于在抗日战争年代早已驰名的黄二团（黄厚）是康部的劲旅，国民党的绥远军事当局不敢等闲视之，就派刘万春带领一个有汽车装备的半机械化兵团，配合鄂友三的骑兵保安师三个团，两路进军，分进合击，向凉城新堂一带寻歼康旅。当时我担任鄂部第二团邢守忠的副团长。鄂部兵抵新堂，康旅已转移清水河，鄂部跟踪清水河，康旅已退到平鲁。我们马不停蹄地紧追不放，又从清水

河追到平鲁，又从平鲁追到凉城厂汉营子、水泉楼一带，眼看已经追上了，但人困马乏，不能发起攻势，只好宿营。次日，康旅又转移到旗下营子，于是再追，一直追到斗金山下的官庄子，已是下午三点钟了，并发现康旅正在铡草喂马、吃饭。当时，我们都认为这是追赶，但从康建民同志那方面来说，实际是拖疲。

官庄子北面紧靠斗金山，这一带高地统称淖梁。鄂友三即下令将淖梁制高点全部占领，形成三面包围态势，单等刘万春的汽车部队到来就开始会攻，可没有预计到骑兵能走山路捷径，汽车只能在公路上绕道行驶，故远远落后于鄂师。我们都站在高处张口瞪眼翘足地远眺汽车，不见踪影，瞥然间发现黄二团的白马连和黑马连利用山沟地形，已经冲到我们面前。但见每人背着枪、挥着刀，好似春雷滚地、浔江怒潮，直扑我团阵地，邢守忠不战自慄，我亦内心胆寒，还没有来得及用机枪射阻，阵地倏被突破。邢守忠慌忙上马带头就跑，我团阵地全线崩溃。时因春寒，鄂部官兵还都穿着白茬皮袄，被黄团追逐于斜阳雪地之中，好似砍瓜削菜，从后劈破皮袄、鲜血从翻开的羊毛缝里流出，掩映着蓝天、白云、残阳、寒雪。

由于邢团的崩溃，第一、三团李存英、郭棠两部，兵心动摇，经不起猛烈的攻击，也先后都垮下来乱跑了。鄂友三亲带的吴景桂大队三百余人，被康部四面包围在山坡上、也都手捉马缰准备逃跑。鄂见无法突围，便放声大骂道：“你狗日们都跑吧，爷爷是不走啦！”

于是弃马顽抗，被连攻三次不下。直至夜幕降临，鄂友三才率领三百余人乘机走脱。此时，淖梁一带的野草被弹火燃着，烧成一片火海，照耀着天空。

鄂友三退到根格区，三个团不知下落。次日半晌，第一、三团的残兵败将总算集合起来啦，邢守忠带了四个连逃回武川老家，全团被劈死二十多人，劈伤二十多人。鄂友三闻讯气得三角眼发红，黄头发直竖，大骂邢守忠，并发电报命令留守在乌兰花的副师长王丙儒将邢扣办，派张汉珽代理二团团长。从此，鄂友三心中有数，不敢轻撻康旅兵锋，但嘴上绝不认输，还说：“我一时疏忽，只顾等汽车会攻，没考虑他敢先冲，咱们追了他三十来天，他才打了咱们一回，顶多能算个平仗，谁也显不出胜败”。

岁末风雪兵

一九四六年二月份的某日，正是民国三十五年农历腊月三十日，要过大年了，绥远骑兵保安师第二团团长邢守忠，在上午十时许请假回家走后，我这个中校副团长代理了他的职务，部队驻在武川、陶林交界处的财务营子。当时，我团有四个骑兵连和一个机枪连。这天，东北风呼啸，大雪飞扬，官兵都躲在室内打麻将，推牌九、押楼宝，各依所好，赌兴特浓。我正摸了个八条龙，赢了数十元钱在闹哄哄呢，突然推门进来了师部传令兵：“报告副团长！师长命令马上出发！”我随手将命令接过拆开一看：“共军康建民部由灰腾梁向陶林前

进，命令我师前去堵击，令到出发，不得有误。我当即命令号兵吹响紧急集合号，全团排好了队传达命令后，即令二连韩标连长率队作先头部队，向陶林方向前进。这时候的雪更大了，风更猛了，天更冷了，马蹄不断地逆风前进，人可伏在马鞍桥上躲避扑面的寒风，瞥眼环视，白茫茫天地相连，什么也看不见，瞬息必须闭目，只听得蹄声哒哒、寒风飒飒，此外再无其他声音了。

马不停蹄地跑了四五个钟头，约在下午四点半，离陶林西三十华里的米粮间村南，与康建民部遭遇，双方只打了十几枪，便都自动撤退了。师长鄂友三下令在附近各村宿营。这时风雪已小，我看见前面有一个小村庄，就向鄂请示二团驻在这里，他点头答应了。这个部队一听说宿营可都来劲了，没等我下命令就人欢马跃，一窝蜂似地跑向村里抢占大院子、好房子、好马厩，简直是乱了套了。我的勤务兵王有小是个抢占住房的老手，他骑着马箭一般地奔进了村。我每次宿营都能住上舒适的大户人家就凭的是他。对这些事，我以往是看不惯的，在开会时曾多次向师长团长们提过，但没人理睬。因为我出身军校，当排长是在门炳岳的骑七师，那个部队纪律尚好，行军有前卫，由前卫派出尖兵连，连派出尖兵排，排又派出尖兵班，驻防某地时是由副官带领连司务长先头到驻地分配住房，部队进村后，各连司务长导引分配各排住房，开始安排厨房、挖厕所（因为人多随地大小便有碍卫生，必须要有厕所），打仗时师长、团长分层指挥，条条有序，有组织、有纪律。可

是，现在这个部队由打游击养成了游击习气，无组织无纪律，积重难返，抗战结束后，改编成保安师，便投入了反人民的内战，一天也没有训练过，仍是乌合之众。

这一天正是腊月三十，我们反共反人民不能和家人团聚过春节倒是活该，可米粮间小村却遭殃了，饺子、点心被吃了，莜面、高粱、豌豆被喂马了。我团驻了三天后，村长来找我：“实在是招待不起了。”因为师长驻在陶林城内，所以，我也开进了县城，临走时给村里留下了给养条子。按规定，这个条子能顶公粮，但据我了解，部队在出发期间的人吃马喂都由当地供应了，留守在后方的军需还照样按月领回人马给养，吃不了就卖给粮店，因此，师长、团长、军需们都发了大财。军官们大多数倒卖毒品和枪支弹药，上下都是生财有道者。他们买房置地，骡马成群，太太几个，我可是马大哈，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能，所以一直是穷光旦。现在想起那些发不义之财的人，多已人死财散、老婆嫁汉了，所幸者我还健在，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毙”，然也非也？

（责任编辑 张尔杰）

哲布尊丹巴搞外蒙独立时

土默特人的参与概况

张 尔 杰

(一)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外蒙古第八世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帝俄怂恿下，曾一度宣布独立，自称‘大蒙古皇帝’，年号共戴”（见辞海）。这一举动，当时在内蒙古引起很大的波动，不少人积极参与，进行响应活动。如东盟人达赖公，达拉特旗的白彦阿勒并（白彦公），杭锦旗的管印章京色令巴图等。土默特的公中佐领刚仁阿、世管佐领塔庆额（刚仁阿之弟），图森额（现托县五申村人）和杨家堡人达赖、大召喇嘛额力吉五人闻风而动，偕赴库伦（现乌兰巴托）晋谒哲布尊丹巴，表示拥戴。外蒙方面热情地招待了他们，并派他们为代表，遣返内蒙古，开展拥护独立的活动。他们还约定于民国二年五月，南北进兵，会师内蒙。因此，图森额留住百灵庙，刚仁阿等回到归化城（现呼市），分头策动

土旗部队举事。

土旗的部队是家乡的子弟兵，在光绪二十六年，将军永德成立土默特巡防队一营，二十九年改常备军，三十一年将军贻谷以德式枪装备成为新军。第一营是八旗兵，由李春秀管带，第二营是土默特兵，由发义管带。宣统三年，土默特副都统麟寿以三百二十人成立骑兵营，由福坦管带。这时，土默特才有步一营、骑二营两个营。当时，骑兵下属四个大连，每连八十人组成，后来老一团一直保持四大连。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袁世凯窃据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八月，即派改制后的陆军第二十师师长张绍曾，取代了民军委任的土旗人云亨所担任的绥远城将军职务。此时，外蒙古哲布尊丹巴的军队（以下简称哲军）已有南窥态势，张绍曾为了统一事权，就把他带来的卫队营，和绥远城的满八旗、土旗的陆军营，归绥道的后路、添练、垦务三个巡防队，以及第一师的混成团，合编为两个混成旅，任混成团团长孟效曾为第一混成旅旅长（步一营属该旅第一团刘虎臣团第二营），第二十师的吴吉昌为第二混成旅旅长（骑二营编入李秀春的第一营），组成晋北（防守）中路军司令部，派他的参谋长朱泮藻兼司令，因虑兵力单薄，弃百灵庙不守，把防线收缩在大青山，而派福坦的骑兵营驻守武川境，准备应战。刚仁阿等人已通过麻花板的锦福（即锦五爷，俗称锦秃子），公主府的朋楚克，串连了福坦骑兵营的第一连连长穆子珍、第二连连长额凤亭、第三连连长玉禄、第四

连连长朱宝山等，谎称收复百灵庙，请准福坦率全营离开驻地。行进途中，福坦察觉有诈，勒令全部回军原防，而玉禄的第三连因远驻前沿阵地的岔岔村，故调令未及已先驱百灵庙。

玉禄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出席了百灵庙会议后，即北上库伦去见哲布尊丹巴，被封为赛德（蒙语大臣之意），并颁发印绶，补充俄造大连珠步枪四百支，马刀四百把，配合哲军匆匆回驻百灵庙，待命出动。

张绍曾以玉禄投敌，防务动摇，且恐引起连锁反应，急令二十师王庆林团追击，并迁怒福坦统御无方，又怕他再步玉禄后尘，即调福坦率三个连移驻毕克齐镇，然后撤职管押，而以参领联春代理营长一职，同时把土默特十二参领软禁，以示牵制，另派森额进入大青山去找玉禄，劝说回旗，玉禄单骑会见森额于武川，森额凭借自己的参领身份，强迫玉禄就范，玉禄托言大便，解马驰回本队。

（二）

哲布尊丹巴宣布外蒙独立后，袁世凯因国体初肇，个人地位并不巩固，主要兵力用在预防南方革命势力上，故制定先求内蒙各旗稳定，次谋外蒙问题解决的方针。已投靠了袁世凯并当上山西都督的阎锡山和绥远城将军张绍曾，即据此以为张本，落实各项军政措施。

在张绍曾整军备战的同时，阎锡山请出五台山活佛章嘉大师，借助他的威望向内蒙各王公贵族、僧俗人等进行开导规劝，张绍曾也派他的参谋长朱泮藻率孟效曾团，先后猝临四子王旗和杭锦后旗，以武力把乌盟盟长巴布道尔济、伊盟盟长吉斯阿力坦呼雅克图请到归化城（现呼市），令他们通告十三札萨克旗前来出席了“西盟会议”，在政治上争取赞成共和，决心向内，抵制哲布尊丹巴搞独立，并发表了反对外蒙独立宣言。

在军事上采取以逸待劳、以守为攻的战略，积极设防守备。阎张二人于民国二年二月会銜请准北洋军阀，任张绍曾为晋北（防守）总司令，下设东、中、西三路军司令部，以大同、归化、包头三城分别为司令部所在地。

东路军司令为大同镇守使陈希义兼，以西苏尼特滂江为前沿阵地，派谢若霖团驻守，保卫陶林城；中路军司令由朱泮藻兼，屯兵武川、乌兰不浪，卫戍归化城；西路军司令派山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孔庚兼，匿主力于昆都仑以东，保护包头城，而派第四团赵守钰部的吴体观营，远驻大余太，作为桥头堡。

与此同时，哲布尊丹巴也在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十一月，与沙俄签订了所谓“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规定由帝俄训练军队，供应军火，加快战备进度，相机大举南下，好与中国军队决战。

(三)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六月至八月间，哲军在帝俄炮兵配合下，东起滂江，西迄乌拉特三公旗，发动全线进攻，兵锋凌厉，来势甚猛，哲军总指挥塔穆公严令三军，志在必胜。东路，攻陷西苏尼特王府，滂江失守，谢若霖率溃兵逃向陶林城，冲散了保卫陶林外卫的发义步兵营，随军参事张子江立将谢若霖正法，稳住阵脚，赖新编的第一混成旅长孟效曾死命抵抗，保住了陶林城，张绍曾却怀疑发义不愿力战，旋把他的步兵营调回归化城，驻扎在眼皮底下；中路，朱泮藻亲自指挥宁双安的步兵团和赵松山的炮兵营，在武川城北的后厂汗此老第一线与敌激战，此线被玉禄和卢占魁配合的哲军突破后，又退到前厂汗此老布成第二道防线，坚守不退，顶住劲敌；西路，哲军是马格切尔札布所指挥的第五路军，他们的带队长官为竹特格勒图，在内蒙王爱召喇嘛王德尼玛、吉林人包在山、达旗人白彦公、杭锦旗人曹录孟、东盟人达赖公率部响导下，直扑大余太，守军营长吴体观见势不支，退到黑沙图以避其锋，竹特格勒图部进入大余太，见到剪掉辫子者即格杀勿论，纵火烧部分店铺，并立即驱兵进窥包头，包头城里的富户、巨商已把金银细软装车，准备逃难，赵守钰团长在距包头七十华里的那什干阻击进犯之敌，双方激战，炮火连天，杀声震地，哲军猛将纳力盖尔在一日之内，强攻七

次，七次负伤，始终未能突破赵团防线，战斗形成对峙。

在此严重关头，张绍曾急电袁世凯派兵增援，驻在滦州的第八十混成旅徐廷荣部，星夜疾进，于七月一日赶到武川，支援宁双安团在赵松山炮兵营掩护下主动反攻，至十日下午夺回百灵庙，而百灵庙已为战火焚毁了（现在的百灵庙是喇嘛在战后重建的）。西路在反攻时，旅长谭涌发指挥炮兵一个连，因哲军利用召庙作掩护，伤亡众多，久攻始克，遂令所部见召即焚，见庙即烧，故大余太一带召庙如营盘湾召、苏卜尔盖召、余太召、厥汗波罗盖庙、句心庙、波尔汗庙、马盖图庙都被付之一炬，甚且战火漫延，连达拉特旗和杭锦旗的召庙也有被烧毁的，如王爱召、树林召、板旦召都是。由于召庙变成瓦砾，喇嘛无处食宿，有的跑到外蒙避难，有的躲在家里隐藏，又因孔庚的军队抢掠牲畜，只好逃进乌拉山里，才算度过难关。此时的东路战事，也因吴俊声师的增拨，夺回西苏尼特王府，恢复了滂江阵地。

帝俄鉴于哲军全线失利，不禁气馁，遂嗾使三音恼彦汗部向中国政府提出谈判解决外蒙问题的要求，故在八月间以后，双方没有发生较大的军事对抗。

（四）

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北洋政府，赞同外蒙提出的和谈要求，即任王正廷为中俄交涉督办，选派大员来到绥

远。中俄两国政府代表在恰克图（现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对话，王正廷是外交总长（部长），且因国务总理唐绍仪被袁世凯气走，他又兼任国务总理，是主持中俄交涉的最佳人选。为了工作需要，王聘旅蒙商大盛魁经理段履庄为中俄交涉署委员，参预各种有关会议，出谋划策，多有贡献。这同年十一月间，中俄蒙三方达成协议，帝俄承认中国对外蒙有宗主权，哲布尊丹巴取消汗号，外蒙悬挂中国的红黄兰白黑五色国旗，实行自治。但在和谈期间，却发生了两起悖乎情理的事件，一件是滂江残杀，一件是陆军营缴械。这就逼得玉禄、图森额等人怨气塞胸，欲罢不能，而来到绥远办理中俄交涉的大员们，却授意张绍曾，力主请出玉禄亲属，促使玉禄回旗，段履庄闻讯，慨然请行。

（五）

民国二年秋，当北洋政府代表与帝俄代表开始谈判之际，据说是陆军营派赴库伦联系的述吉太等十二人在返回途中，被北洋军阀的滂江守备队捉获，不分清红皂白，除达挠一人幸免外都被杀害，玉禄等人得知后，无不愤慨。但张绍曾并不住手，他疑陆军营要在自己的院心里点火，就与副都统章炳一密谋，于秋末冬初（确切日期失传）之交，以更换新枪为名，把驻扎在归化城的发义步兵营，及驻在毕克齐镇的联春骑兵营，同时调集到归化城北的小教场（现附属医院一带），武力包围，

全部缴械，而后，官佐每人发给白银五两，士兵每人发给白银一两，作为遣散费，至于以后如何生活就不管了。于是，越发引起玉禄等人的不平。

这些被遣散的官兵，以有功不录，忠而见疑，又没有生产条件和生活出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陆续跑到玉禄那里，造起反来，致使玉禄所部急增到一千余人，出现了枪支奇缺的困难，因此，图森额再赴库伦，为玉禄请求补充武器弹药并汇报内蒙军事情况。这时候，张绍曾对玉禄用兵“剿除”是打不了，派人诱降又哄不回来，双方苦战，得不到解决，而玉禄呢，按照中俄蒙三方协议，凡进入内蒙的部队都须撤回外蒙古去，但他又不愿意把子弟兵带到外蒙，便赌气要自搞“内蒙独立”，可是官兵薪饷，粮秣补给都没有来源，尤且与卢占魁的“独立队”相间杂处，部队纪律无法维持。

张绍曾对玉禄“剿抚”两穷，难安枕席，不得不把无理软禁的十二参领释放，并请出玉禄族兄武尔功、参领阿恒阿、经理段履庄诸人联袂找见玉禄，商讨回旗条件。几次往返斡旋，才取得突破性进展。段履庄曾向玉禄官兵及其家属坚决表示，誓以个人生命和大盛魁全部财产，保证各方安全，同时答应了玉禄提出的不进归化城，常驻包头的条件。由于蒙汉人民和睦相处几百年的历史，已形成了兄弟般的血肉关系，不能绝缘分家，为了维护祖国统一，玉禄不好却情，才放下了“独立”的旗帜，接受了改编，建制为绥远骑兵游击队，任玉禄为司令，下辖三个大队，以有亮、松秀、都隆依次为第

一、二、三队队长，后来又扩编为绥远警备第三路，再改编为补充团，也就是后人称道的老一团。

但因游击队的编制定额仅限于三百人，容纳不下玉禄的全部人马，故又另设保商团以安排多余之众，团的薪饷由归化商会按月关发，而以锡拉毛利召（席力图召）喇嘛银海统率之，从此以后，玉禄所部在绥西境内剿匪安民，保卫家乡，屡建奇功。迄民国十二年，绥远都统马福祥任玉禄为清乡司令。民国十四年，玉禄率部追剿苏雨生、刘喇嘛匪伙，因中奸计，不幸被俘，苏刘匪众，拟拥戴玉禄为他们的共主，并劝说玉禄俯就。在当时，每一军官兴戴金戒指，玉禄义不履匪，吞金自杀于杨二虎圪卜，匪众恨其不从，割头泄愤，此是后话。

（六）

就在玉禄受抚率部进驻包头的时候，被遣散的土旗官兵如安安（安鹏飞）、奎奎（奎抱头）、成成、锦福、连祥、白彦山（榆树打尔架人）等不少人，觉得并没有吐尽胸中的那口“乌气”，他们既不愿意回旗，也不甘心参加保商团，都留在卢占魁的“独立队”里，要与北洋政府继续见个高低，但也苦于人多枪少，徒手不好用武，正当嗟叹之际，图森额找上门来。

前文提到，图森额再赴库伦为玉禄请领武器弹药。他从外蒙经过交涉领得大联珠步枪四五百支，当他长途

跋涉运到百灵庙附近时，玉禄已经就抚移驻包头，致使图森额陷于南下不能回家，北上无法复命的尴尬境地，因为此次到达库伦后，哲军怀疑他是披着拥护独立的外衣，替中国政府搞间谍活动的，所以把他扣押起来，后来证明冤枉了他，才又释出，拨发枪支弹药，让他运交玉禄，因而延误了时间，他只好把武器就地隐藏起来，流浪于蒙古包里寄食。

此时，卢占魁所部正活动于武川、固阳境内，图森额与卢原为旧识，二人见面，各诉所苦，卢因人多枪少，图以有枪没人，于是用“借”的条件，采取“狗窝寄油糕”的办法，把全部武器补充了卢占魁的“独立队”，图森额自然也成了卢部的成员。

卢占魁字耀宸，丰镇隆盛庄人，他自宣统三年追随小状元参加辛亥革命，打了丰镇城以后，因阎锡山已投靠了袁世凯与革命为敌，他几次从死神嘴里挣脱，自拉一服，当了“独立队”的首领，打家劫舍，闯荡于察、绥境内。当哲布尊丹巴宣布独立之初，东盟人达赖公受外蒙内务司官松彦光汉援引，被哲布尊丹巴委为内蒙招抚使，首先归附并被任命为骑兵统领者即为卢占魁，他曾受到哲布尊丹巴的召见，所部曾奉调开到外蒙贝加尔湖整训，并给补充过枪支弹药，外蒙问题平息后，卢占魁在武固境内收容了陆军营被遣散官兵的不愿就抚之众，此次意外地得到图森额“借给”的武器，声势益大，组成了实质上的“民族联军”，自称“塞北都督招讨使飞虎上将军”，攻城破县，与北洋政府为敌。迄民

国五年冬，绥远继任都统蒋雁行收编卢占魁为骑兵旅长，锦福为旅副官处长，图森额担任旅军法处长。因图森额双耳病聋，人称“聋图”，当了处长后，据《绥远通志稿》卷六十二载：“凡伙内有犯奸者，则反接而官之”，此说虽然未必可信，但也说明他的军法是够严峻的，所以又被叫作“龙图判官”。据传，图森额是卢占魁的十大弟兄之一。锦福曾担任过卢占魁与蒋雁行在归化城谈判的代表，后来跟上卢占魁参加了于佑任的陕西靖国军，嗣后又归附了滇军军长叶荃，卢被任为旅长，张德义、锦福、白彦山分任团长。卢占魁率张、白两团随叶荃进入云南后，被顾品珍全部缴械，白彦山等战死，余众为顾军吞并，除卢占魁一二人逃往越南又潜赴上海晋谒孙中山外，两团约四五百蒙汉健儿都成了异域之鬼。锦福奉卢命率全团二百来骑，以图森额为辅弼，归川军师长吕超指挥，进攻重庆不克，又东下万县、奉节，挺进于湖北宜昌。当时鄂西地区是武光新的领地，这些土旗兵将，虽然能征惯战，但前为武军所阻，后有川军第三师钟体通追击，故当打到宜昌附近时，大部战死，锦福被杀。图森额突出重围，人地生疏，辗转流离，于民国十年只身回到五申村。据他的孙子云元世老人对我说：“爷爷回来时，已经是厅院破落、土地散失的光景了，他住在归化城里，以卖卜行医糊口，民国十四年病逝……”。可见被遣散的土旗步骑两个陆军营的官兵，在参与了哲布尊丹巴独立活动以后，除玉禄带回三百人及保商团安排一部外，其余都作了无名的民族战士了。

(七)

再说刚仁阿与额力吉等回到归化城搞活动，被张绍曾的职能机关侦悉后，即派军警到小东街刚仁阿的住所去捉拿。

刚仁阿的小女人娶的是归化城西河沿皮毛店汉族经理阎老红的妹妹，她是小脚妇女，穿着肥裆大裤，裤角口还用小带子裹扎小腿腕子，她因瞥然抬头，发现军警进院，急忙揭开衣柜，把刚仁阿的手枪取出藏在自己的裤裆里，又系好裤带，因此，军警翻箱倒柜进行搜查，也没有找到什么违禁东西，就把刚仁阿逮走了，经过几次审讯，因无证据，不能定罪，羁押在狱。根据一些史料介绍，外蒙事件解决以后，就被释出。但刚仁阿的孙子荣世杰老先生最近对我说：“虽未判刑（刚仁阿），却一直坐监到汲金纯当绥远都统时，才被释放，我的小奶奶常领上我探监送饭”。按汲金纯任绥远都统是民国十七年的事，荣当年八岁，早已记事，当属可信。刚仁阿回家后，闭门不闻窗外事，整天烧香念弥陀，韬晦以终。

至于塔庆额，据传他在刚仁阿被捕后，就被撤销了佐领职务，并在卢占魁接受蒋雁行改编为骑兵旅时，担任了卢部某团团附（副团长），因不愿合流，回到归化城，旋病死在家中云。但近据云文翰老先生函告：“刚仁阿我记不清了，塔庆额是我们的佐领，他常住呼市（归化城），也常回村，在民国十五、六年时，由于整

修公和寺（即把什召）及处理苏木事务，特请他回村，当时村人到火车站迎接，我是亲身参加的一人，记得较为明确，也没有听说过他曾被撤职，这就说明塔佐领起码在民国十四、五年还健在，至于他什么时候辞世，目前已无人能道出了”。说明传说讹误，云老所告，确属信史。

（八）

哲布尊丹巴搞的所谓“蒙古独立”，早已成为历史陈述，经中俄蒙协议后改为外蒙自治，后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式宣布独立则在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七月十一日。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外蒙人民废除了哲布尊丹巴的君主立宪政权，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内蒙古也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于一九四七年实现了自治，而且百业只旺，成为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模范自治区，民国初年的那种民族问题，当然不会重演，笔者概述其事，意在鉴古惜今，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共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至于这篇资料的来源，一是根据我在青壮年时期同学和友人们口碑传闻的回忆所及，二是参考《绥远通志稿》卷六十二，三是最近走访了一些知情者揉合而成的，所以不仅在某些内容上与世说未尽相符，而且舛错失之处谅必多有，敬希知情人不吝补正，以期核实。

（责任编辑 云文翰）

下里巴人之话

—土默川上的歇后语

云瑞口述 全林小注

编者按：中国语言传统，凡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一律斥之为“下里巴人”之作。然而，正是这种巴人的话，才会不胫而走，而且富有生命力。具体到方言民语也不例外。《诗经》中的“风”不就是采自各个所在国里的民歌、民谚的代表作吗？

“雅”、“颂”虽誉为阳春白雪又是登堂之品，但几千年来讴而不息，名驰中外者，《风》者焉。也正是孔丘老先生所以列风为雅颂之首的“道远”之故吧！

不错，粗犷、豪放甚至近乎猥亵确实存在，可是它的特点、美感也正谕意其中。这并非巴人之话的病态，而是语言变迁的结果。且看：①“疥蛤蟆跳进羊圈啦——招毛没毛，屙粪没粪；”②“黄萝卜做凿油子——里顶不住外抗不住。”比喻不仅言简意赅，而且赋有立体感。难道不是吗！

胡萝卜做凿油子①——上抗不住下顶不住（或里顶不住外抗不住）。

①凿油子：即旧式榨油用的楔子。

背锅子上山——前（钱）短。

瞎子摸锅——铁壳。

公鸡抓蛋——放屁。

掏雀儿掏出个秃死怪子①——头脸也变啦。

西瓜皮擦屁股——没完。

溺尿屙在皮褥子上啦——擦洗不起圪啦。

拉上死人游街——溜鬼。

（或：拉上判官游街——溜鬼）

老娘娘擤鼻涕——稳拿。

大肚老婆骑毛驴——靠前不对靠后也不对。

大肚老婆看戏——里外都是人。

毛驴驾辕——蹉不住啦。

蚂蝙蝠儿（即蚂蚁）上了秤杆——走头（投）无路。

耗子钻在风箱里啦——两头受气。

切了头的瞎犛——乱碰。

脚板子底下踩擗杖——自带不稳重。

粪巴牛戴花——臭美。

猪鼻子里栽葱——装象。

山羊钻栅子——露你那毛脸脸。

圪针卜子拴毛驴——哪有你插嘴的地方。

割上圪针喂毛驴——心到无事。

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猫吃尿泡——瞎喜欢（或扑了个空）。

①秃死怪子：猫头鹰。

丁羊的旦——多提(dī)溜的几天。①

讨吃子倒泔水——灰下一不滩。

疥蛤蟆跳在羊圈啦——招毛没毛，屙粪没粪。

大姑娘讨吃——死心眼。

夜壶里洗澡——不楞不开。②

夜壶打了嘴嘴——看你那×坛坛。

豆腐掉在灰里啦——吹(捶)吹(捶)不得，打打不得。

大年下吃烧山药——灰心入肚③。

连鬓胡吃麻糖——撕卷不开。

讨吃子流鼻血——人穷火大。

童男女过河——身子完啦，架子不倒。

小猪子跌在萝卜窖里——猛逮。

猪圈里拉毛驴了——一样样儿那大耳朵。

背上媳妇游舞台——费力不讨好。

棺材里露出头啦——死不要脸。

月子里的娃娃啃冻糕——恨食。

锤板石打耗子——急出眼睛珠子啦。

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

歪嘴儿吹火——斜(邪)气。

玛瑙夜壶——古董圪旦。

哑叭见了他妈——没得说。

①丁羊：即羴羊。

②“不楞”：方言，施展之意，但多寓贬义。

③山药：即土豆。

粪巴牛哭它妈——两眼墨黑。
 粪巴牛骑辣椒——红（魂）不附体。（或：骑上辣椒子上天——红（魂）不附体。）
 蛤蟆跳井——不咚（懂）。
 瞎子磨刀——快啦。
 屁股上“扁”了个死耗子——假装打牲的。①
 豁牙牙啃西瓜——有个道道就行啦。
 脖子上抹猪血——假装挨刀了。
 种荞麦上来菟豆啦——灰得连棱子也没有了。
 披上盖窝转旺火——红火的连扣门子也没了。
 天道神捏窝窝——大手大脚。
 石灰捏猫——白瘦（受）。
 讨吃子上戏楼——一步登高。
 唱黑的装青衣——出台猛啦。
 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炉渣灰打根基——灰基础打下了。
 满嘴牙跌在肚里了——没得说。
 舌头填在人家嘴里啦——由人圪嚼圪哇。
 雀头包饺子——尽嘴。
 狗鸡巴抹猪油——又尖（奸）又滑（猾）。
 一脚跌烂个痿西瓜——红透啦。
 脊背上变裂子——有身缝（份）的人。
 天暴疮上头啦——比疥（或含有“借”的内涵）还

①凡“ ”号内字即拟音方言。

厉害。①

两张纸糊了个驴头——好大的脸面。

小婶子坐在大伯子怀里啦——人不是人，鬼不是鬼。

死了老婆哭妈——没抓啦。

大伯子哭小婶子——什么死人口也张。

乱坟滩发山水——激倒你苦墓卜子。

讨吃子上坟——灰人串堆。

河那边摆手——瞭不见了（或过不来了）。

不打脸子②唱大戏——啥戏也想唱。

毛鬼神坐轿——自带不稳重。

哈巴狗追狼——凭嘴了还是凭腿了？

麻杆杆打狼——两怕。

半夜拾住个纸元宝——看不见成色哇不掂掂份量？

穿上袍子尿尿——擦也不擦。

老汉“挖”奔子——没后劲。③

照上镜子打抖嘴——一个人不认得个人。④

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驼驼的嗓子——耐蹶蹶。

牛吃山药——齁圪旦。

瞎子放毛驴——不松手。

①天暴疮：即梅毒。

②打脸子：即化装。

③“挖”奔子：大跑的意思。

④打抖嘴：打耳光的俗称。

瞎子捉奸——喊了坳凶。
贼娃子打官司——久输没赢。
马衣提豆腐——没得提。
抱上元宝跳井——舍命不舍财。
小姨子坐在姐夫的怀——以心托实。
公鸡带嚼子——抖起来了。
讨吃子穿新鞋——抖起来了。
狼带咚铃——自带没饭吃。
糖人挨比抖①——粘在手上啦。
大豆跌在火盆啦——灰奔。
狼咬辫子——绝了根啦。
狼见了血——不要命啦。
耗子带笼头——假充大牲口。
猫喝烧酒——强不住啦。②

(或：猫喝烧酒——够呛)

货郎子担出他妈啦——货尽啦。
瞎鼓匠过牌楼——另打调哇。
老娘婆搬屁股——外行。③
草筛筛莜面——露空处不在一处。④
起窝窝跌在醋瓮里——又虚又酸。⑤

①比抖：打耳光。

②强不住：即顶不住之意。

③老娘婆：民间的接生员。

④草筛：它的孔眼较大，不适合筛细小之物。

⑤起窝窝：发面丝糕。

疥蛤蟆跌在个炉炕里——灰爬。
蹶起屁股瞭天——反安眼啦。
胡髭上害疮——毛病。
拿上鸡毛当令箭——瞎指挥。
狗戴帽子——装好人。
鸪鸪鸪打断脖子啦——灰头得连啦。①
西瓜皮打掌子——不是那材料。②
碾盘上的耗子——日灵的没窟窟啦。
“波波”其戴笔帽子——双料尖头。
黄河里下豆面——碗大汤宽。
猫道里填擗杖——直出直入。
擗面杖吹火——不通。
数九天喝冷水——冻（动）了心啦。
浓带流在眼里啦——倒流啦。③
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
剃头洗屁股——大错一只背。④
鸪子叫雀儿——越叫越远。
饿老鸱⑤吃鸡毛——填满嗓子就行啦。
公鸡带串铃——看你有多音红。⑥

①鸪鸪鸪：即斑鸪，全身灰色。

②打掌子：钉鞋底。

③浓带：即鼻涕。

④只背：即腰。

⑤饿老鸱：鹰的一种。

⑥串铃：马项上系的铃铛，装饰品。

推车子拾住个驴滚肚——有了裨（盼）啦。
梦梦娶老婆——尽想好事。
蒜皮上秤——押轻不押重。
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
板不倒得了相思病——坐卧不安。①
老牯牛丢盹——谋事了。②
粪巴牛跌在车渠里——看得死呀还玩（完）蛋了。
二号盆子调夜面——愣腾套。③
父子俩吃糕——拿不严。④
鸭子的爪爪——联手手。
挂羊头卖狗肉——以假乱真。
眉毛上挂钥匙——开眼。
眉梁洼儿摆摊子——眼面宽。
尚鞋不拿锥子——针（真）行。
疥蛤蟆跳门限——又蹲启子又伤脸。
蚂蚱的眼睛——干明不亮。
拐子的屁股——斜（邪）门。
大便攥拳头——暗地使劲。
清水里丢顽石——一眼看到底啦。
坐井观天戴个草帽子——眼光短浅。

（下转第169页）

①板不倒：即不倒翁。

②丢盹：打盹。

③二号盆子：即较小的瓷盆；腾套：折腾之意。

④拿不严：即不一定。

土默川农谚百条试释

王 道

这里所选的农谚是地道的土默川农谚，当然个别的是全国性的，如“春打六九头”。农谚中个别字加注土默川读音，如“西虹(jiang)当日雨”。所加解释力求通俗、准确，但因选释者经历、学识有限，不妥之处总是有的，请有识之士指正。选释这些农谚是出于为保留土默川文化的心愿，让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科学逐日发达的今后，长久地保留下去，使后人知道：我们的祖先还有这么些经验之总结留给我们。

一、节令、气象方面的

1、春打六九头

“立春”是在数六九的前一天，即数五九的最后一天；不是数六九的第一天。

2、春雨贵如油

这是说土默川春雨很少，而春雨又是非常可贵的，是耕田、下种十分必要的。

3、春风吹破琉璃瓦

土默川春风多而大，有时会损伤庄稼幼苗，要高度警惕，故有此夸张之比喻。

4、夏至数“三庚”入伏

夏至过后的第三个“庚日”入伏，一伏是十天，末伏在立秋之后。现在我们不用干支记日了，哪一天入伏，可看日历，它必然是夏至后的“三庚”，全国皆然。

5、雷声雨，三后晌。

雷阵雨不只下一天，这也是千百年来之验之谈。

6、铺盖雨，三天，六夜，九后晌，七十二个半前晌。

铺盖雨，即连阴雨，降水量大，持续时间长。这则谚语也是非常通俗、生动的。

7、阴天怕的是亮花花

阴雨天，黑云滚滚，突然变成灰色、白色的云气，预示着将有一股大雨来临，而不是天气放晴的前兆。

8、东虹（jiāng）轰雷西虹雨（又说“西虹当日雨”）。

放了东虹，没有雨，最多不过打一阵雷；放了西虹，总要下雨。放西虹，必然在上午，说明西边天际有降雨云，当日有雨，大小不等。

9、早烧 (Shāo) 天阴晚烧晴

烧，就是火烧云。早烧，早霞。晚烧，晚霞。根据农民的经验，晚霞如被黑云淹没，也是要落雨的，叫“黑云接日当夜雨”。

10、云往西，下大雨；云往东，一场风。

这是阴天看云的经验。阴天，如果云往西飞渡，将把东南方向的降雨云刮来，必然要下雨；如果云往东飘去，很快要天晴了。

11、西南风刮它三、四天，铺盖雨下它五、六天。

土默川如果久旱无雨，农民盼着刮西南风，连刮几天，就有下雨的希望，而且雨还不小。

12、山怕“处”，川怕“露”。

山，指后山，即大青山背后的武川县；川，指土默川。这则谚语是说山后边处暑可能要行霜，前川与后山差一个节令（十五天），白露可能行霜。同时又告诉人们：山后处暑行了霜，前川白露必然行霜。这里的“怕”字用得十分引人注目。

13、寒露百草枯

时至寒露，一切一年生植物都要枯萎。这是准的，绝无例外。

14、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

如果今年八月十五月亮躲在云后，迟迟不出面，

或者根本没有出来，那么明年的正月十五一定要下雪的。这种现象是好兆头，正月十五雪打灯的当年是好年景。

15、瑞雪兆丰年

冬季落了大雪，来年是丰收年，所以叫“瑞雪”。冬天下了大雪，积雪覆盖了大地，土壤中的水份不易蒸发，来年墒情好，可以保证下种；而且能够冻死虫卵，来年一般可以不发生或少发生虫灾。

16、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

这是讲的一个辩证关系，阴阳向各自的相反方向转化。最冷的时候，地球内部的深处已开始孕育一股热气；最热的时候，地球内部的深处已有寒气形成。

17、二月清明遍地青，三月清明不见青。

“二月清明”是说清明节在阴历二月，“三月清明”是说清明节在三月。二月清明，春浅，草木发芽早，要抓紧春耕播种；三月清明，春深，农事倒可以消停一些。

18、三月初一的风，四月初一的雨。

三月初一刮了风（指引人注意的风，比如四级以上的风），根据经验要刮“夏后风”，即立夏以后风多而大，不利庄稼生长。四月初一下了雨，当年多是旱天。老农说：“四月初一洒一阵，旱至来年五月尽。”

19、二月重河冻，米面憋破瓮。

春寒是好年景。如果春天暖得早，一般墒情不好，因为地湿蒸发得快。

20、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

五月是锄地的大忙季节，旱一点不耽误锄地，又不利于杂草生长。六月大田锄完了，禾苗正需要雨水，雨水越多越有利庄稼生长。

21、端阳一阵雨，虫子遍地起。

虫卵在五月上旬的气温中如果见了雨，适宜孵化孳长，而这时禾苗嫩幼，最怕害虫咬，所以这时下雨，多遭虫害。

22、春冻圪梁秋冻洼

农民世代的经验得出认识，春天禾苗出土后遭了霜冻，梁地受害重；秋天的霜冻，洼地受害重。

23、一年打两春，青草贵如金。

一年打两春是指阴历正月打春，腊月又打春说的。打春就是“立春”。这样的年份冷季较长，低温天气较多，草木生长要受到影响，所以用“贵如金”来设喻。

二、种植方面的

24、麦抢清明前十晌

土默川种春小麦，清明节前后下种。清明节前下种

最好，如果墒情、籽种、天气等条件都没有意外，农民都在清明节前种小麦（也包括大麦）。清明后十晌种麦亦可，过了谷雨就不能种了。

25、春忙“谷雨”前后

谷雨是下种的大忙季节，大秋作物都在谷雨前后下种，否则秋后庄稼成熟时要往后推时日。

26、小满前后，点瓜种豆。

小满前后点瓜，立秋前后可下瓜地。要想瓜早上市，就得提前一个节令（半个月）点铺沙瓜，因为过去没有地膜覆盖技术。豆类的生长期比其他大秋作物约短十天，所以也在小满前后下种。

27、“芒”种糜黍急种谷

糜子、黍子的生长期比高粱、谷子短十至十五天，芒种节前后播种。这时，种谷子勉强一些，大日期的谷种（如著名的“毛良谷”）芒种节便不能种了。

28、夏至不种高山黍，强（jiàng，当勉强讲）种十晌小糜黍。

夏至还可以种小日期的糜子和黍子，这些糜黍生长期为六十天，处暑之后即可成熟。一般的糜黍这时便不能种了。

29、麦壮四月雨

四月是小麦拔节生长的关键时刻，这时特别需要雨水。

30、糜锄点点谷锄针，高粱锄时出了垄。

“点点”指糜黍的叶子刚出土，这时便可锄了，因为糜黍不打苗，锄去杂草便可以了。也有人说“糜锄两耳”，小苗子有两个叶子的意思。“谷锄针”的“针”指“针茬子”，即特大针，这是比喻，是说要及早锄，一寸多的苗子就要抓紧时机锄。高粱的苗子长出垄沟时锄也可以。

31、清明不在家，人伏不在地。

这是说蒜的。蒜，清明以前种，头伏起新蒜。这里是说紫皮蒜，白皮蒜立秋前后起。

32、锄头自带三分水

锄地不仅除草，还可松土，土松了便有保湿、耐旱的作用。

33、搜根高粱围土谷

锄高粱苗子周围不怕露风，锄谷子则要用土围住小苗，根部用锄要特别小心。

34、干锄湿耨，赛如浇油。

农民把第一次锄禾苗叫做“锄”，以后第二次、第三次便叫做“耨”。锄小苗要及时，主要目的是去草、松土、定苗，土干无雨时进行最好。湿耨，指下了雨之后去耨地，又可以杀死一茬小草，而且要耨得深，让禾苗舒舒服服地去生长。

35、头伏耨地满罐油，二伏耨地半罐油，三伏耨地没来由。

农民知道：秋后有一伏。每年的末伏总在立秋之后，这时再耨地已没有意义了，庄稼眼看就出穗了，地里有些小草也无妨了，同时禾苗已相当高了，在禾垄中来回操作，反而有害于庄稼生长。这是告诉人们要在头伏、二伏去耨地，不可错过时机。“满罐”、“半罐”是形象的比喻。

36、耕三耙四，锄耨八遍，八米二糠。

这是强调“勤劳”二字。既做好整地各种工作，又做好锄抛去草等田间管理，秋后就能得到好的粮食。“八米二糠”是说粮食熟得饱满，质地好。

37、麦浇黄芽谷浇穗

麦类要早浇，谷类要晚浇。相比较而言，麦类生长期短，水浇迟了影响收成；谷类生长期长，立秋，处暑时浇也不迟。

38、雨涝不忘浇园，天旱不忘锄田。

这则谚语强调浇水和锄地的重要性。对于庄稼的生长，下雨的作用大于浇水，但是该浇还要浇，不可因雨水多而忽视浇水，这叫做有备无患。旱天也要重视锄地，“干锄”虽不及下雨和浇水，但它确实是有作用的。

39、大田不早浇，早浇不发苗。

这是讲浇水要掌握时机。大秋作物是不能过早浇水的。因为，第一浇了水土地就要硬结，而硬结后对小苗生长是不利的，一般说雨水赶不上来，它生长缓慢。第二小苗是一股根，像线似的扎在土中，非常耐旱，风把苗子刮得摆来摆去，这不要紧，刮不断就没关系；若是浇了水（下雨也一样），线根周围马上就长出许多须根，农民叫这现象为“蹬开虎爪”，以后反而不耐旱了，因为须根多了那线根就崩断了。

40、伏天没雨，谷子里没米。

伏天是土默川庄稼生长最关键的时候，禾苗大了，气温高了，草也除掉了，这时正值雨季，如果伏天不下雨，那就严重地影响着庄稼的生长，肯定要减产的。

41、稀谷秀大穗

这是告诉人们锄地留苗稀一些不是什么坏事，一个大穗上的颗粒要比两个小穗还多，如果土质好、有肥力、雨水足，大苗根部甚至还可支出小枝，生出一个小穗。当然留苗的稠稀视地力而定，不能理解为稀总比稠好，留得禾苗稠一些，又都能结出大穗，那不更好！

42、麦秀火燎穗，谷秀拖泥穗。

这则农谚是说：麦类植物秀穗时不需要雨，谷类植物秀穗时则特别需要雨。这是科学的，是经验中体会出来的真理。

43、麦秀火燎穗，烤了豌豆的花。

44、谷秀拖泥穗，淋了糜子的花。

这两则农谚是讲庄稼成长的辩证法，讲众多的作物生长要求是有矛盾。顾此就要失彼，怎么办？农民的经验是以麦谷为主，豆糜次之。他们懂得“抓西瓜”和“抓芝麻”的关系。

45、山药（土豆）开花结圪蛋

山药和禾类不一样，开了花就一定有收成。蔓上开了花，土中便有了新山药蛋。

46、头伏的荞麦中伏的菜

这是指种期，不是指收期。荞麦是坏茬，土默川一般不种它，除非是大旱之年，墒情特别坏，误了种植其他作物的农时，不得已才种它。种菜是一年收几茬，如收一茬菠菜，还可以垄葱、种秋白菜，收了麦子，还可以撒菜。

47、麦熟红花蛋，不收是呆汉。

这也是讲一种时机——收麦的时机，不必等到黄透才收，基本黄了就要抓紧收割。以免遭受意外损失（下雨、刮风、冰雹等灾）。

48、麦熟一晌，杏黄一时。

今天是“花红蛋”（基本黄）的麦子，明天就熟透了，这“一晌”说得极巧妙。杏黄一时是说杏子的收获

期大致相同，持续极短。当然也有个别品种日期大一些，不是没有例外。

49、麦子不受中伏的气

这谚语是说开镰割麦的节令，入了伏就割麦，到中伏就全割倒了。

50、见穗一月熟，见瓜一月熟。

这是很重要的一条经验，不论是粮食作物，还是瓜，都以一月为期，长够一个月便可收获了。当然能再长五到十天就熟得更好了。以西瓜为例，在蔓上长三十天的瓜就全红了，蔓上长四十天的瓜就又红、又沙、又甜。

51、处暑不出头，割了喂老牛。

大秋作物必须在处暑以前出穗，出不了穗收获便无望了。因为土默川秋风前后一定要落霜的，个别年景白霜后就落霜了，如果处暑还不出穗，出穗后长不了一个月，就收不了颗粒，只能收些柴草。

52、春对（当“相差”讲，土默川地方语）一晌，秋对十晌。

下种时相差一天，秋后庄稼成熟的时间就相差很远，农民叫“庄禾不回头”。说“十晌”是夸张手法，不是确指十天。

53、种地不倒挂，真来是利巴（外行）。

54、瓜茬种谷，谷茬点瓜。

这两则农谚说明一定要换茬，不可重茬种植。种重茬地，庄稼是长不好的。其中有些道理。山药茬、瓜茬是好茬，来年草少，种谷子最适宜，谷子苗子留得近（苗与苗之间三到七寸，视地力而定），草少好锄。麦类可以重茬种植。瓜绝不能重茬，据农民讲今年点了瓜的地，二、三十年以里不可再点，重茬点瓜捉不住苗。

55、庄稼登场，先选籽墒（种子）。

56、好种出好苗，赖（不好）种长青草。

这是强调选种的重要性。秋收以后，第一步是选种。不仅选种，还要换种，即引进外地的优良品种。山药的一个品种只能种二、三年，以后便要退化、减产。香瓜（亦称甜瓜，土默川人叫“小瓜子”）越种皮越厚。毛良谷越种日期越大，到全国解放以后，清明后十晌种的毛良谷，只能熟半个穗子（上边半穗），所以尽管是一种高产品种，现在却被淘汰了。

57、秋天不翻，来年草滩。

这是说秋翻地的重要性。秋天翻一次，来年春天再翻一次，比今秋不翻，年春翻一次要强得多。这种“耕三耙四”讲的是同一道理。

58、碾底有墒，糖下有水。

用石碾子碾地可以把大坷垃压碎，又可以保住地的湿度，所以说“碾底有墒”。耕过的地要立即耨一次或

两次，这样能把翻起的土的空隙糖住，不让风吹进去（农民叫“吹塌”），也是保墒的必要措施，所以说“糖下有水”。

59、要问粮堆，先看粪堆。

60、风大地冻，不忘拾粪。

这两则谚语说明积肥的重要性。

61、头等庄稼人凭粪，二等庄稼人凭种，三等庄稼人凭混。

土地质量相当的情况下，粪肥的多少是第一位的，有了粪便有了粮。种，指摇耩下种的技术，这也是重要的一环，尤其是种旱地，下种得探墒。种得浅，种子掉在干土中，发不了芽。种得深，籽芽嫩幼顶不出土。必须将种子掉在干土之下，湿土之上。混，就是指既不愿积肥，又不讲耕作技术，这样的庄稼人，当然是种不好地的。

62、有水无肥一半谷，有肥无水望着哭。

水与肥相比，水更重要；有水又有肥那就更好了。

三、植树、养畜方面的

63、家有百棵树，不愁吃穿住。

这是鼓励人们植树造林，一定意义上讲，有了树就

可以解决生活问题。树叶喂羊；树枝可以做编结原料，剩下的还可烧火代炭；树干则可以换钱。

64、一年拾粪，十年栽树。

积肥当年得利，栽树十年得利。树在那里慢慢地长，并不影响人做其他事，它自然而然地长成了材，就得利了。

65、树成林，不起尘。

这是农民从实际生活中体验出来的，树多了，风沙少了，空气好了，湿度也提高了。

66、五年椽，十年檩。

这是讲植树成材的年限，五年的树苗可做椽子，十年的树苗可做檩子。

67、春栽早，秋栽晚。

这是告诉我们，春天植树要早一些，秋天植树要晚一些。春天最好一解冻就栽树，秋天则在封冻前栽上就行。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早春和晚秋农民不太忙了，可抽时间植树；另一方面树苗本身就贮存着养份，在没有长出新的根系时，消耗自身所贮存的养料，有了新根便能吸收土中的养份，早春晚秋植树成活率是比较高的。

68、沙杨，土柳，石头松。

这是讲什么地适宜栽哪种树。种树不必用上好的

地，沙地栽杨树适当；带有碱性的土栽柳树好；至于松树，沙石地也可以栽。松树在山缝里不也可以生长吗？

69、桃三杏四梨五年，枣当年就还钱。

桃树三年结果，杏树四年结果，梨树五年结果，枣树最有意思，当年就能见收成。当然这里所说的结果是见了果实了，产量并不高，如枣树当年只能结一、二枚小枣。要想产量多，得再过三、二年。另外，桃树怕冻，土默川栽桃树得注意防寒，据经验栽植四、五年的时候，最容易冻死。

70、母羊下母羊，三年五只羊。

这是说养羊很快就能成群。一只母羊，第二年产一只羔，第三年产一只羔，共三只。它产的第一只羔如是母羊，第三年也该产一只羔。所以说“三年五只羊”。

71、养鸡是零钱攒整钱

家庭养鸡不必过多地花费，庄户人说“不打不算”就是这个意思。当鸡产了蛋积存起来就有收入了。所以农民又说“养鸡是按了个钱筐箩”。

72、牛年马月羊一夏

这是说膘情的。牛如果落了膘，一年才能复圆起来。马，草、料、水都赶上去，一个月以后，膘情就好转。羊主要靠吃野草上膘，不论老羊、小羊，一个夏天过去，就肥起来了。农民说“六月六，西葫芦泡羊”。

肉”，到了阴历六月，羊就有了膘了。

73、冬放一条线，夏放一大片。

这是讲放羊技术。羊信用鞭子指挥着羊群，冬天，让羊走成一长条，边走边吃草，把走过的地面的草要基本吃尽。不能让羊乱走而不吃，因为羊是不吃“回头草”的，它践踏过的草是不吃的。夏天，草多了，草长高了，羊群可以散开来，可以让它们自由自在地去吃草。

74、秋雨如刀刮，瘦牛不瘦马。

这是讲土默川农家养牛、养马说的。秋季是牲畜快要拉车出力的时候了，如果下连阴雨，对牛不利，对马无所谓。我们可以看到，下雨天农民正常放马，但牛却不出厩了，因为牛是淋着雨不爱吃草的。

75、马靠夜草，牛靠冬膘。

马（骡也一样）草细，每天夜间的草需勤喂、少添，每次一匹马添二、三斤，要筛尽土，从傍晚到十一、二点得添六、七回，这样才能把草吃尽，剩下草圪节（硬梗）。如果一次添得过多，遛来遛去，不好好地吃，反而要跌膘。牛草粗，一次添草六、七斤，每晚添三、四次即可，把草圪节也要吃去一些，冬季喂好草，无料亦可，待春季再上料就行了。

76、兔子不吃露水草

带露水的草喂给兔子，要泻腹。喂露水草是养兔的

大忌。

77、二斤伏草一斤料

伏天打下的草晾干贮存，叫青草。青草最好，牲畜吃了上膘。打青草忌雨淋，雨淋过的草牲畜不爱吃，养份也遭到了破坏，即不能顶“料”了。

78、草根顶土料

春季草芽刚出土时，挖出草根，是很好的饲料，比喂干草、青草都好，故云“草根顶上料”。

79、先看一张皮，后看四只蹄。

这是相马法（也包括其他牲畜）。“一张皮”指毛色，农民看马把毛色放在第一位，因为毛色纯遗传性稳定，如枣红色、纯黑色、黑铁青（亦称菊花青）都是好毛色。看毛色主要看个“纯”，脑门上有白点的，腰中有白线的，四条小腿白色的，都不是上好毛色。其次，看“蹄”，四蹄端正，行走灵便，就是好马，无论骑乘、拉车，四蹄都是十分重要的。

80、青马不看口，海骝不看走。

青马是黑白毛相间的马，不是黑一片白一片（这叫豹花马）。对青马，从毛色便可看出年龄，不必看口龄。青马七岁以后白色毛增多，九岁以后，颈部出现褐色斑点，随着年龄的增大，斑点越来越大。海骝马（红黑色）都是胎带“走”，都会走对侧步，俗称“走马”，这种马宜于骑乘。

81、正猪腊狗四月的马，五月的牛犊不用打。

这是讲出生的月份。正月的猪，当年可以宰杀，喂食少，出肉多。腊月的狗耐寒、英武，体格健壮。老百姓说这种狗“可恶”（即厉害）赛狼，灵巧过之。四月的马、五月的牛，出生后半年断奶，正值冷天，草料赶上去生长迅速，又不误来年使用老马、老牛。

82、短腿鸡，大头狗。

短腿鸡爱生蛋，大头狗厉害。

83、猫三，狗四，猪五，羊六，兔子一月一窝。

这是讲育胎期。母猫怀孕期两个月左右“猫三”，指预产期在配种后的第三个月。据科学计算，母狗怀孕期为九周，说“狗四不太准确。母猪怀孕期为110天至121天，说“猪五”不准确，说“三三三”好，意思是三个月三个星期再加三天。母羊怀孕期为140天至155天，平均150天。说“羊六”可以解释为配种后第六个月产羔。母兔怀孕期为30天，说一月一窝是能通的。

按照兽医科学，各种家畜的怀孕期是这样的：

兔一，猫二，狗三；

猪四，羊六；

牛九，马十一，驴一年，骆驼十三个月。

84、七扫中渠八扫边，九岁十岁蚂蚱眼。

这是看马的口齿的歌诀。看马齿（主要是下切齿）要弄清什么叫“齐口”。一岁马上下生乳门齿各二，二

岁生乳门齿各四，三岁生乳门齿各六。四岁生上下永久齿各二，五岁生上下永久齿各四，六岁生上下永久各六。上下各生出六枚永久齿的马是六岁口，叫做“齐齿口”。“渠”，指的是马在吃草时在牙面上磨下的黑窝。七岁时门齿的齿面开始磨，有了长形黑窝，这叫“七扫中渠”。八岁时开始磨损两边的隅齿，这叫“八扫边”。九岁十岁门齿齿面出现圆形，这叫“蚂蚱眼”。十岁以后成“面子口”，即所有的齿面成椭圆形，“面子口”可保持十年左右，因此“面子口”的马不好确定其岁数，说十二岁行，说十八岁也行。

85、七齐，八豁，九摇，十不动。

这是看牛口齿的歌诀。牛没有上牙，是看下牙的。七岁的牛下齿是齐齐的，八岁的牛下齿有高有低，九岁的牛下齿稍微有些摇动，十岁又不动了。那么十岁以后的齐而不动与七岁的齐而不动有何区别呢？看颜色，发黄色的是老口，雪白的是小口。

四、其他

86、三年学个买卖人，一辈子学不会个庄禾人。

过去在商号学经商叫“住地方”，三年不挣钱，只管吃穿，也不给探亲假。三年以后出徒了，开始挣钱，叫“顶生意”。经过三年的锻炼，就熟悉本行业的业务了。种田务农不能说“会”、“不会”，因为那个时

候科学不发达，种地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如天气的、节令的、水肥的、技术的等），只能活到老学到老，谁也不敢说自己就是种地的“把式”（老师傅）。

87、庄禾人三件宝：莜面、山药、大皮袄。

莜面是过去农民的上等饭，土默川产得不多，每年向后山购买或“打换”（以经济作物如上叶、辣椒、麻皮等去换莜麦）。山药是土默川特产之一，个头大，淀粉多，易于贮存，吃法多（可煮、可蒸、可炒、可烩）。皮袄是过冬必备的御寒衣，板耐，毛长，非常适合农民穿。

88、吃不穷，喝不穿，计划不到一世穷。

农民也十分注重计划，他们勤俭为本，绝不浪费，甚至连稀饭里的山药块都是按人数数（ShùShù）的，他们“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封建制度、势力的压榨下求个温饱是很不容易的。

89、人活脸，树活皮，墙头活的一把圪渣泥。

人要讲人品，讲信誉。树要保护好树皮。没有泥皮的墙就快要倒坍了。这个比拟也是很质朴、很深刻的。

90、冻不死的葱，干不死的蒜。

葱不怕冻而怕干，蒜不怕干而怕冻。这是真理。

91、瓜一亩，菜一分。

这则谚语有两层意思：一是五口之家的农产种一亩

瓜、一分菜五口之家就吃不了啦，二是五口之家点二亩以上的瓜、种二分以上的菜，便可出卖收利。

92、**天鹅地鹑，金眼黄鼠。**

这些都是美味佳肴，其价值超过猪、羊、牛肉，但是不易得到，所以农民又说：“天鹅地鹑逮不住，金眼黄鼠不多的点肉。”

93、**数九天没雪，数伏天没雨。**

农民根据千百年的经验，发现冬天下了大雪，来年夏天雨水充足。

94、**春雪填满沟，麦子定不收。**

春雪大，推迟耕田、下种的日期，对麦类下种不利。另外，春雪不如冬雪，它易化、易蒸发，不及浇水后的土地墒情好。

95、**弹打一条线，天旱一大片。**

“弹”指冰雹。雹灾为害面积小，其走向多为西北东南一条狭窄地带。天旱是大面积的，为害大，往往是几个村、几个乡遭灾。

96、**粗罗和(hár)，细罗糕，窝窝不罗正好好。**

这是讲粮食加工的罗子有四种：隔皮罗，用来隔粮食的皮壳(如荞麦皮)；圈(juān)罗，即细罗，用来罗白面；二细罗，用来罗莜面；小罗，用罗米面、玉米面。和，是发过的米面在鼓面镢子上烙的，所以可以罗得粗些。

糕是黍子面用水拌起来蒸的，罗得细一些好。窝头是一种粗食品，罗得粗一些好，特别是不发面的窝头，面细了更不好。

97、知母、贝母、广冬花，千年的咳嗽一把抓。

伤风咳嗽不必请医生，卖些知母、贝母、冬花，煎来喝下就解决问题。

98、处暑撒烟

种烟叶，必须在处暑节撒回叶子，因为一过处暑下冰雹是经常会有现象，即使是极小的冰雹，也会把烟叶子打烂，影响产量和质量。

99、埧沟无牛立地死

这是强调牛对耕田的重要性，它拉车脚力不快，但耕田却胜过马、骡。古人云“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诚然。

100、九月的孤子十月的狼，十一腊月打青羊。

这是讲打猎的谚语。每年夏季牲畜要换毛的，按农民的经验，过了白露，各种野兽的新毛就换齐了，就该抓紧时机猎获。狐狸的毛细嫩光滑，到了冬天就磨损了。青羊是一种稀有野生动物，其皮不太美观，但耐寒、耐磨，极昂贵。据说它的耐磨度为绵羊皮的十倍，如绵羊皮可穿五年，那么青羊皮便可穿五十年。青羊善爬绝壁，冬季捕获最好。狼也在冬季猎获为好。

从历史档案看土默特煤矿 业的开发与矿权之斗争

石志余

土默特旗有着悠久的历史，从1532年迄今四百五十余年中，随着明、清王朝以及各省地与土默特之间的相互联系，公文、函件日益频繁。从1638年（清崇德三年）开始形成文档，到1949年的三百一十一年，历史档案日积月累，极为丰富。虽经历次遭劫，由于保管者尽职珍藏，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现在，这些丰富、珍贵的历史档案，都保存在土默特左旗档案馆内。档案以清代文档居多（1731—1795年），包括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八个时期的历史档案，也保存着国民党时期的档案。这些档案，大体划分为绥远将军、副都统、归绥道台、总管公署（日伪时期称土默特公署）四个全宗。

土默特左旗档案馆现存土默特明、清两朝历史档案18,253卷（件），其中，有满文档案10,300卷（件），蒙文档案1123卷（件）；另有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档案

5,013卷(件)。全馆的各类档案总计约七万卷(件)。无论是历史档案还是全部档案的总数,土默特左旗档案馆的馆藏量,在全自治区各旗、县中,是首屈一指的。

笔者撰写本文,仅就土默特煤矿业的开发史及矿权争夺的斗争诸问题,对挖掘、利用土默特历史档案这个宝藏,作个尝试。

土默特境内的煤(炭)矿,蕴藏丰富,质地优良。土默特境内的煤(炭)矿的所有权及开发、管理以及矿租、煤税的征收权,“向归土默特所有,”在晚清期间,成为土默特“生计命脉之一”。

清王朝中叶以后,由于清廷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加强,迫使地方权限日益收缩。本来,在皇太极降服土默特部的时候,已经假借一些“投降奴才”之口,弄出一个“寸地一民不为己有”的借口,到清末以后,由于主、客观诸多原因,将土默特逐渐置于“半殖民地国家的殖民地”的地位(李大钊语)。从清代到民国初期北洋军阀的统治者,无不向土默特经济利益迭次伸入黑手,疯狂掠夺,表现在煤矿一项上,情况尤为突出。

二百多年以来,土默特各界人民,经历了数不清回合的斗事。斗事过程中,时胜时负,总的说来,还是将这一“生计命脉”的主权,一直保存到解放前夕。土默特煤(炭)矿的主权、管理、开采和煤(炭)租、税的管理、征收、使用等方面的经历过程,同土默特的牧场、土地一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中国民族史上的社会科学问题。本文仅就笔者所阅档案,对土默特煤矿业的

开发与矿权争夺之斗争情况，提供资料，并加以说明。

一、有关煤炭矿藏资源的记载

土默特境内煤（炭）矿藏，分布于境北的大青山沿山地带，以及清水河南、北各山。据近代档案记载：1925年（民国十四年）前后，国民党中央政府曾派遣地质学家王竹泉等人，几次进行勘查、找矿。勘探记录是：“境西北的各个煤田，属二叠纪下侏罗纪烟煤。煤田的长宽一般是三、二十里，厚度一到六公尺不等。五当沟煤矿从露头到底层共七层，其中有三层各厚六尺。各煤田的储量，均在二千万吨以上；童盛茂煤田储量最丰，约在三千七百八十多万吨左右。察素齐以北大青山一带，产无烟煤、有烟煤及肥煤三种，概属下侏罗纪煤。煤层三、二层不等，各层厚度约二、三尺，其中，柳树湾的下层深达四、五尺。在这些煤田中，较大者面积达三十二平方公里。清水河一带煤田均有上、下两层，分别为19.5公尺到6.5公尺，其中黑矾沟、井儿沟、刘胡梁沟煤田的储量为十八亿吨左右，焦油实出率高达8%到9%，发热量高达六千五百大卡公斤”。这些资料反映了五、六十年以前勘查情况，虽然勘查程度未必精确，但是，作为当时已经勘探的煤矿点及煤储量，以及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土默特境内各煤田的关注，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以上资料摘自各地方志书）

在市郊坝口子以东及和林格尔、可可以力更等地，

均有煤田。然而，档案中未见记载。

二、煤矿所有权的变迁及争夺的记载

土默特境内的煤（炭），在阿勒坦汗统治时期，还没有开采的记录。可以推断：煤矿和牧场一样，在分封制度下，是归各王子、台吉所有。清代初期，清廷将牧地（包括牧地内的矿藏资源）分拨给各佐属蒙众，这在土默特满、汉文档案和有关资料里都有记载。到了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在绥远省设立实业筹备处，策划将土默特煤矿收归“国有”，土默特旗上下官员多次向大总统、国务院提出抗议，一致声言“土默特境内煤矿，向归土默特所有”。向归土默特所有，是指牧地及煤矿为土默特部所公有。为了说明土默特部公有的情况，再摘录有关煤矿所有权的资料如下：

1、从清初的记载看，土默特境内的煤矿，归土默特蒙族人民所有。

《绥远通志稿》载：“顺治三年，广宁兵备道万有孚，因勾结大同姜瓖反清，潜入大青山产煤处万家沟，向蒙古租地开采煤炭”。

“向蒙古租地”一语，虽未讲清是蒙古的哪一级官员，但足以说明，当时矿山的所有权是属于“蒙古”的。

2、从煤矿封禁后奏请复开的档案记载看，雍正年间，土默特境内的煤矿，仍为土默特所有。雍正初年，

清廷施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广东等地督抚，为顺应主子意图，并且为了避免“地方生事”，纷纷提出禁闭矿山、驱散矿工的奏折。雍正虽欲“一养穷民，二增国课”，下诏命各督抚“酌情办理”，但终因地方大员怕事，朝中元老思想顽固，怕开矿破坏了“风水”，再加上有康熙禁矿的遗训，封建官僚们大多对矿山持力主封禁的态度。经过朝中再三酌议，终于在雍正二年初，清廷下令将各省矿山一律封禁。土默特境内历年开挖的一百多座煤（炭）窑，当然也不例外，统统给封闭了。时隔不久，土默特都统以“蒙民烧柴困难”为理由，奏请复开“少数煤窑”，获得批准。在清廷批复的文件中，提到土默所开之煤窑，“分给两旗管理”，并且有“由土默特派出官员管理”的规定。由此可以证明，土默特境内各煤矿的主权，还在土默特部的手里。

《土默特满文档（以下简称〔满档〕）煤矿类·868号》一文说：“为请旨事：据归化城都统塔勒玛山等咨文内称……查得雍正二年九月，部院咨文内称：‘尔等为欲烧用地方所出煤炭事，奉旨应照彼等所请准挖……彼二旗可均分挖煤之地。或由会挖之蒙古挖之，或招民挖之，可随彼等之便。唯此项煤窑断不可被汉人霸占。若被汉人霸占，收取高价，反致扰害蒙民’”。

其中“彼旗可均分挖煤之地”一语，含义是不清的，并没有说清是指“复开之少数煤窑”，还是指全旗

境内的煤矿。因而导致以后对煤窑所有权的若干争执和斗争。

3、从发照的记载看，乾隆年代以后，土默特境内的煤矿主权，日渐被清廷攫夺过去。发照，是以证照凭书来保障开采者的开采权，是确定开采权的重要法律依据。但在土默特来说，发照的过程成了土默特煤矿的所有权从土默特部所有变为清廷王朝所有的演变过程。

发照的原委是这样的：当土默特请准开窑之初，新城的兴建工程已经开始。由于建城所需的石灰、砖、瓦等建筑材料，要靠煤炭来烧制；加上建城中增加了许多军队、工匠、商民人等，生活用煤的需求也急剧地增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一面是归化城都统为了适应“移民日多”的需要，奏请后，经过清廷批准，增开了十六座煤窑；另一面是建城官员未经任何手续，派人开了许多煤炭窑口，用以烧石灰、砖瓦；还有一些出口谋生的汉民，乘机私自滥开煤炭窑口，以致引起土默特“奉旨管理”上的不便和混乱。经过争执，清王朝乃命土默特查核管理，并诏命由土默特发照。

发照的权限，起初是在土默特旗，以后逐渐归归化城都统、绥远将军，最后，发照权集中到了工部。

综观《满档·煤矿类》各号档案记载，在乾隆三年到八年的六年中，凡涉及到煤矿的开采、发照、收租等事宜，概由土默特两翼翼长主持，两翼旗有关参、佐领，骁骑校、护军校、先锋校等参与审核研究。如乾隆三年五月的档案记载，在审查私开煤窑的一次会议中，

参加人员有：翼长班达拉西、察方、三等台吉佐领伊米的，佐领祖哈瑞、阿拉甫谭、吐巴、干珠尔、万树克、春加甫、达西拜赞，以及骁骑校达西等四人，护军校老占加甫等二人（以上均系译音）。乾隆八年二月的档案，记载着一次审核管窑参领申报的煤窑收支帐目会议，出席人员有：翼长阿拉甫谭、佐领祖哈瑞、春加甫等六人，护军校、骁骑校老占加甫、察方、独兰加甫等人。

乾隆八年后，情况有所改变，有时仍是土默特官员审批（不另举例），有时都统、副都统列席参加，如乾隆十四年十月的档案记载，察方村蒙民阿利亚以“我们土默特蒙古历来有开挖煤窑之习惯”为由，请求在小阿利麻图开窑一座，在审议这个请求时，参加审核人员除翼长、佐领等人外，副都统阿莫及协领巴、班等二人，也参加了会议。另外在乾隆九年审议民人王吉等人，在毕克齐诺尔苏沟挖煤窑一事时，参加人员则是副都统伯、吴、张、色等四人和总领班、恩等二人。为什么乾隆八年以后，审核土默特煤矿有关事宜的会议，增加了上一级的官员，有待于研究。笔者分析，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同汉族官员管理权限有关，更主要的原因是，说明清王朝为逐渐剥夺土默特经济权利所使用的手段。《满档·煤矿类》乾隆十八年的档案材料里，讲到研究发照事宜，已经是翼长签字，副都统乌“飭令”发给。乾隆三十一年档案，记载关于开窑事宜，已有将军绥远城飭令办理字样；乾隆三十五年前后的档案记

载，煤矿开采不仅要有绥远将军奏章，而且开矿数字、收款数字，要有“由京筒放”的都统、副都统参与审核研究。其后的档案进一步说到，领照事宜由工部直接签发。这就证实了，清廷剥夺土默特部煤炭的权益，是一步步加紧进行的。

4、从派员巡视、管理煤矿的档案记载看，土默特境内的煤矿主权，逐渐被清廷攫夺了去。

派员巡查管理煤矿，也算是清廷赐给土默特的煤矿权限之一。这种“派员管理”制度，坚持了很久。最初的档案记载，见之于乾隆三年的《满档·煤矿类·868号》。档案里说，归化城都统因建城过程中，新迁入的驻军及民众成倍增加，在观山新开了十六座煤窑。“我两旗派出达木巴、诺尔博等六十二人看管”，并有“我部立即派官”等字样。在其后的《满档·煤矿类》各号档案中，有关开窑、领照、征收煤税等事宜的记载，多次说到“管窑参领、窑领及分管各处煤窑的佐领、骁骑校、护军校”。如：

《满档·煤矿类·968号》提到：“户司阿拉甫坦（潭）报告：乾隆十八年八月十四日，据管窑佐领巴特玛、骁骑校巴达尔乎等报称：十八年七月份所管九十七座煤窑内……”

《满档·煤矿类·1031号》称：“总管煤窑事务参领、兵司参领德木伯楞呈称：所管阿里木图、清水河等四地之四窑领乌铃札布、杜鲁木车齐、罗纳西德、纳苏图等呈报：乾隆三

十五年九月份经查，车、馱共收二十八万三千九百五十钱……”

从1031号满档来分析，四窑领是四地煤矿的直接管理者，原管佐领。但有的档案里提到的情况，却不是原管佐领，而是派遣的官吏。比如：有的管窑小头目，是骁骑校或护军校，这显然不是各地原管佐领了。

另外，《满档·煤矿类》各号文件里，还有许多有关汉人请蒙人加名领照开窑的记载。这同习惯上的所有权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后文再叙。

从上述开窑采煤的管理及管窑官员的设置等看，好象是清王朝给了土默特一些管理权限，但是，从雍、乾年代开始，清王朝在国内形势基本安定后，逐渐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对土默特境内矿山主权，先是仿“改土归流”办法，用禁闭手段夺去了所有权，随后，由于政治、军事上的主客观原因，清廷尽管多次“恩赐”土默特一些矿山管理、领照以及收费、收租的权利，但是，清廷始终没有把土默特境内的煤矿主权完全交给过土默特旗。这正如清廷给了土默特旗境内煤矿的发照权，从乾隆八年以后，这个权逐渐由土默特两旗翼长转到了由京筒放的都统手里，随后又转到了绥远城将军手里，最后到了清末就收到了工部。只能由清廷的中央机构——工部来发照。矿租、煤税，表面上一直是由土默特旗征收的，但收入、支出必须逐年逐月分报绥远城将军及户部、理藩院等核销，其支出项目，必须符合清廷的规定。土默特旗并没有自主权，实际只是一个代收代支的

过手衙门而已。

清朝中期以后，政治日益腐败没落，经济情况也日趋绌缺崩溃。加上土默特蒙民兵差两役日渐苛重，经济处境窘困，一些原由蒙民包开和自开的煤窑，有的因水淹坍塌、无力恢复，有的封闭，有的转让，有的白白扔掉。所谓“主权”，到了光绪年代，已完全归于清廷工部发照；所谓“蒙民历来就有开挖煤窑的习惯”的开采权，也逐渐被蒙、汉官绅富商趁领照之机占去，形成两极分化状态。其中蒙民领照方面，据《土默特历史文献汉文档（以下简称《汉档》民矿类·总字十五号》记载：公元1915年（民国四年），土默特十二参领向北洋军阀农商部、蒙藏院等处呈控绥远省实业筹备处，擅自废弃土默特蒙族“矿商”原领清代矿照。从文件内容看，清末时承领工部执照被实业筹备处废弃的，只有佐领都楞、音德贺、苏通阿、塔布其等数人。其中，音德贺拥有的煤矿最多，他一人就领了七道山沟的清代部照。笔者访问过几名八十多岁的老人，他们说，当年音德贺一年四季派人沿山收要包煤窑的租税，大青山的煤矿，简直成了他一家的产业。但是，音德贺等蒙人，有这么多煤矿产业，又领到部照，政权一变，部照作废，煤矿易主，土默特蒙人对煤矿的主权哪里有一点保证？！

三、煤矿开采情况的记载

土默特地区的煤（炭）矿开采历史，迄今还没见到

最早的确切记载。从呼和浩特市郊区二十家子汉代古墓遗址的出土文物看，汉代时就有炉膛遗迹和鼓风管、坩锅和大量炉渣等炼铁、制器遗物。炼铁是否利用了本地的煤炭，尚待史学界考证。著名的万部华严寺塔，塔上有铜、铁的装饰物。这些铜、铁装饰物，是本地产品还是由内地运入的产品，也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释疑。《史记》、《元史》及《北虏风俗》等史书，均有漠南北能铸造武器、锅釜、箭镞的记载，但又有“伐木熔铁”的说法，使人不敢贸然断定冶炼铁器的燃料是当地煤炭。即使十六世纪中叶，阿拉坦汗已“治窑一座”，并大兴土木，兴建了大板申、呼和浩特城等等许多宏伟建筑物，建筑物上都有很多金属装饰，而且还有“暗市交易、输入废铁”的记载，有精良、齐全的金属武器作佐证。然而，翻遍这时期的史书、方志，都找不到有关开采煤矿的记载。因而，不敢断定阿勒坦汗时是否已经开始用当地煤炭炼铁制器。况且，还有王崇古“北虏不会熔锅作器”及明代诗人于谦“炕头置炭（木炭）烧黄鼠”的说法，更使后人研究经济史、志，产生了对当时煤矿是否开采的疑问。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亦说1579年），阿勒坦汗在呼和浩特建盖大召，也装璜了许多精制金属器物，其中召内的大银佛及院中的大香炉等，已有人断定为当地制造，看其精致程度，亦不象“伐木熔铁”所造之物，但也只能作为用窑冶炼的研究线索之一，并不能作为用当地煤炭冶炼的根据。比较确切的资料，有以下三则：

1、《绥远通志稿》：顺治三年，广宁兵备道万有孚因勾结大同姜瓖反清，潜入大青山产煤处万家沟，向蒙古租地采煤”。

2、《满档·煤矿类》899、900、909等号文件所载乾隆十四年左右，蒙民申请挖窑采煤时，多有“蒙古历来就有挖窑采煤习惯”的语言。

3、据史书记载：“雍正初禁闭土默特之煤窑，约有百余座左右”。

上列引文中，提到的“顺治三年，万有孚潜入大青山产煤处”及“历来就有挖窑采煤习惯”等，可以推断：土默特地区的煤矿开采，最迟应当在公元1646（顺治三年）年以前。

康、雍年代的禁矿已如前述。公元1724年（雍正二年），土默特煤矿重新开采。《满档·煤矿类868号》一文记载了重新开采煤矿的过程。文内提到：

“雍正二年九月，（接）归化城都统塔勒玛山、丹津等上奏：‘自封闭煤窑以来，因城周围（无）可拣之粪，（亦无）可砍之树，致使蒙民买柴烧用，木价大涨。翁衮等山所出之煤，若准我旗居民开挖烧用，则大有裨益’。”

这个请求上去之后，清廷的批示是“应照彼等所请准挖”。

土默特二旗根据清廷所准，“照议施行”。该文末段的记载是：

“两旗（当即）派出巴尔米特等二十人挖窑，并议定售价每百斤二十钱”。“到雍正三年四月，巴尔米特十五人共挖窑五座，另外邵构等五人于努尔素村附近挖窑一座，共六座”。另据当时户部咨文载：“邵构之窑由邵构自售，由巡察努尔素村窑之官兼巡”。

雍正末年，议建新城。乾隆二年，在归化地东北动工兴建。建城时，建城的官员并不严格执行清王朝开窑原则，却是借口“烧石灰、烧砖瓦”之需，自行派员开窑挖煤。这时，有不少到口外谋生的内地汉民，也趁机私开许多窑口，以致造成滥挖煤矿的现象。土默特“奉旨”派员管理煤窑，变成徒具虚名。这些情况，《满档·煤矿类》868、869等号文献，累有所载。

据查，比较早期的档案，还是能够遵照清廷旨意办事的。例如：

乾隆三年，归化城都统札复同知衙门一文说：“现因归化城地方修建新城，需烧石灰、砖等，除先前所报之六窑外，又挖二十余座，拟于建城竣工时另报”。

该文又说：“查得因建城驻军，来到之人比先前成倍增加，烧用甚缺。除先前所报之六窑外，拟再挖煤窑，使煤源充足，则所驻满兵及我土默特蒙古及外来民众，皆得廉价烧煤”。

从所引的两段文字看，前一段是说，在兴建新城时，开采煤矿，是供应烧石灰烧砖用，由建城官员伙同

同知衙门办理。后一段是说，归化城都统（当时是丹津）为满足新增加的各族军民燃料需用，奏请朝廷准予开挖。这时的煤矿开采，还是能够按清廷法制有组织进行的。乾隆三年新挖煤窑十六座，连同旧有煤窑，合计二十二座。煤窑的分布情况是：哈玛尔等地有煤窑五座，珠勒图儿有煤窑二座，阿利玛图有煤窑六座，大毕车奇有煤窑七座，翁衮岭北六岭沟有煤窑二座，鄂博图有煤窑二座。

在开这十六座窑的时候，土默特二旗曾“派出达木巴·诺尔博等六十二人看管，并已呈报于户部。”

从档案资料看，此后不久，由于借口兴建新城烧砖烧灰需用，新开的煤窑越来越多，出现了随便乱开、极端混乱的局面。在兴建新城之初，同知衙门提出，经由都统转呈清廷的奏折，是“需开二十余窑”。《满档·煤矿类·870号》文载，乾隆四年正月，归化城都统札付同知衙门令堵的私窑有八处。《满档·煤矿类·872号》文记载，乾隆四年二月，土默特翼长派员查看私窑，竟查出二十道山沟的私窑一百零九座，其“大部分煤窑已出煤。《满档·煤矿类·872号》文件的附件说：

私开煤窑地点有苏尔哲沟（共八人开采，已出煤，并有运出痕迹）、托斯寨北鄂博山、毕儿嘎逊照山、翁衮岭北六岭沟、大毕车齐北山、纳勒苏太沟、喀拉乌尔克图沟、朱吉尔山沟、小阿里玛图、大阿里玛图、哈玛尔北山阿杜亥沟、大都里奇沟、东博罗和北山乌勒尼恩

苏太沟、托斯和北山阿斯哈沟、乌达沟、布尔噶素太沟、巴克图沟、和通沟、北乌达沟及清水河朝胡郎沟等二十多处。其私开窑者，有来自张家口、大同、万全县、榆林县、泰和县、榆次县、赵城县、太原县、肃州、忻州、太谷、孝义、岩齐县、崞县、沁源县、祁县、保定、山东等地”。

从这个附件材料分析，开私窑者，有的是受兴建新城官员之命，为烧石灰、烧砖而开挖的，但未向土默特办理任何手续。如乾隆四年二月，土默特翼长等审理私挖煤窑案时，刘魁等人的供词是：“承包公家之打土坯、烧砖、烧石灰，遂在新城北山等地挖窑”……并声称：“已由前任同知承允给我发证”。有的则是趁建新城混乱挖窑采煤之机，私开煤窑售煤。如上述翼长等审理私开煤窑案件时，民人张善、岳四折等八、九人的供词是：“小的均系贫民，依自力开窑谋生。去年出告示闭窑，所示告示因风吹雨打没了，今后我等各自找谋生之路”。

从上述引文中提到的苏尔哲沟八人私开煤矿、已出煤，“并有运出煤之痕迹”及“依自力开窑谋生”等情况判断，很有可能在兴建新城之前，甚至在雍正初年封禁之前，土默特煤矿的开采就已处在“禁者自禁，开者自开”的状态，只是官家未发现或发现后共同作弊掩盖而已。

公元1740年（乾隆五年）十二月，山西巡抚咨文归

化城都统：“仿照前所开二十二座窑例，再开所余八十座煤窑”。

开窑产煤，解决当地人民的燃料问题，使当地各族军民人等再不用因“无可拣之粪、无可砍之树”而发愁，固然是好事。然而，当时清廷在不同的年代，以及清廷与地方之间、地方官僚之间，对煤矿是开采还是禁止，是发展还是停滞在某个水平上？政见是有分歧的，政令也是矛盾的。

当雍正初年禁矿后，经归化城都统再三为民请命，才陆续批准由两旗开窑二十二座，清廷一再下旨，飭“都统与副都统亲自详尽查看，委派委员管理，断不可被民人占去贸易，且需保无设讼之事”。这说明，清廷的旨意是，土默特煤矿开采规模，要限制在二十二座窑上，而且所产煤炭不能作为商品，“断不可……贸易”。当兴建新城时，建城钦派官员并没有遵守清廷这一旨意而是随便指人开窑，扩大采煤业的规模。这时，清廷不但允许“建城竣工时另报，而且还下旨从山西派遣兵备道允诺发证。实际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规模是限制不了的，既然开采煤窑是解决人民的燃料问题，怎能禁得住采煤者以煤卖钱易货“谋生”呢？因此，对土默特煤矿有管理权的绥远城将军及归化城都统、土默特左右翼二旗翼长官僚，同对土默特煤矿有发证、批准开采权的山西巡抚、遵旨从山西派遣到归化城的兵备道另一方地方官僚间，在“遵旨”“循例”行事中，各行其事，互相矛盾，政令相违。比较典型的例子是：

乾隆五年以后到乾隆末年，是土默特境内煤炭窑猛增的时代。其特点是窑小而多，大部分煤窑生产不稳定，煤炭窑的利用率一般只有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开采方法虽无专门记载，但从各矿坍塌、水灾、火情的多次发生，以及采煤人数、出煤斤数等记载来看，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小煤窑的生产设施极简陋、生产条件极恶劣。

承包开采的人有蒙、有汉，也有蒙汉合包者。蒙人开矿者有的自挖，有的招汉民开挖。包窑者多数为披甲，也有骁骑校、护军校、佐领、参领，甚至还有翼长。汉民包窑者，有的自开，也有请蒙人领照由汉民开挖者。这方面情况，在满文档中记载较为全面系统。现就该档中有关开窑情况择其变化较大者及情况较特殊者，摘录如下：

乾隆五年六月份，共有煤窑二十二座，出煤者十九座，月售煤炭约二至五万余斤，开窑者均系蒙古，其中有护军校开窑者一人。

乾隆七年十二月，共有煤窑四十六座，出煤（炭）者三十八座，月售煤（炭）一万至三万余斤，开窑者均系蒙古，其中有佐领春加甫开窑者一人。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共有煤窑七十四座，其中起火二座，出水二座，迁盘一座，路坏二座，坍塌二十三座，售煤炭者四十四座，共售煤炭二百六十四万五千四百五十斤（平均每窑

月售煤炭六万余斤)。开窑者均系蒙古，窑领善加甫仍开五座窑。

乾隆十四年十月，察方村阿利牙请准在小阿利玛图开窑一座，准开。(注：在其呈文中，有“我们蒙古人向来就有开挖煤窑习惯”一语。)

按：十四年左右，在开窑的呈请中，此类言语很多。

乾隆十四年十月，共有煤窑八十六座，售煤炭者四十四座，月售煤炭七万斤弱。

乾隆十五年十二月，西班佐领下善加甫拟靠招募内地工人，申请在清水河芦玛沟地方开窑一座。如三个月不出煤愿交还执照。

乾隆十八年八月，共有煤窑九十七座，坍塌者五十三座，余四十四座平均售煤三万五千斤。

同年，三等台吉、参领伊米德家人巴玉琨，呈请在清水河菩萨湾开窑一座。

同年，伊玛地佐领下阿勒善呈文：“原与内地民人乔红商定合开煤窑一座，由乔红出劳力，收入平均分。近两年乔红每年只给五百钱，违约不平均分钱，故而提出控告”。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共有煤窑一百一十座，坍塌、毁坏、待修煤窑九十三座，余四十八座平均每窑售煤五万斤左右。

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共有煤窑一百四十一处，坍塌九十四处，售煤者四十七处，平均每处月售五万余斤。

乾隆三十一年，绥远城将军饬各厅严查煤窑数，萨拉齐厅呈报说：“各厅所属煤窑，均系土默特蒙古之业。原先该蒙古等自都统衙门领票招民开挖，与地方无关。现蒙古等忽开忽闭，其中奸恶之民人偷挖或借票私开，均难逆料”。将军复饬各厅呈报蒙古开窑者之花名册，以便统一发照。

乾隆三十五年九月，共有煤窑一百三十五座。售煤者一百一十座。（文中所列挖窑地址有大、小阿里玛图、南沟、苏哲沟、喀拉巴尔盖、小德乌里奇、大德乌里奇、巴克托沟、阿都庆、喀拉乌额、奴尔素沟、水泉子沟、霍沙图沟、乌兰布多卡子、敖博图沟、兴隆沟、六梁子等地。）开窑者均系蒙古。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共有煤窑一百二十六座，其中未售煤七十四处，售煤八十八处。（各处售煤开始按新规定以车、驮、船计数，不能统计斤数。）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共有煤窑一百五十一处，未售煤五十七处，售煤九十五处。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共有煤窑一百六十一处，未售煤九十一处，售煤七十处。

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共有煤窑一百九十一

处，未售煤一百零五处，售煤八十六处。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共有煤窑二百三十三处，不售煤一百四十一处，售煤九十二处。

乾隆六十年二月，共有煤窑二百二十九处，不售煤一百四十七处，售煤八十二处。

从上述记载，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清乾隆年代以来，煤窑开采总趋势是向前发展的，而且发展速度很快；二是煤窑的产量不稳定，许多煤窑不售煤，无利可图。此外，需要补充说明几点：

1、据《满档·煤矿类》各号文件记载，乾隆中年前后滥开乱停煤窑现象非常严重，土默特管窑官员及翼长、副都统等，曾经采取过一些措施，加以制止。先是命不出煤之包窑人办理封闭手续，后又提出先报试开，“待出煤后再办发照手续”的办法（试开期限定为三个月）。对照档案中呈请因不出煤封闭的窑数，与月报中所报不售煤窑数相差太远。显而易见，是有时挖时停及虚报不出煤窑数的情况存在。比如《满档·煤矿类·952号》一文说：

乾隆十七年户司（都统属下，土默特旗专管户口、财粮等事的官署，其主管人由翼长、参领中推选）原呈所管煤窑九十五个，其中只五十三个交税，又有十个窑于七、八、九三个月未交税，余三十二窑中蒙古等十七窑已询明数年来虚有其名”。

2、从《满档》936等各号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到，

包窑者起初是以蒙族为主，也有汉族，后来，汉族包窑者的人数急增，有超过蒙古族包窑者人数之势。

《满档·煤矿类·906号》提到，民人刘星汉等二十余人，从乾隆七年四月由同知府呈报，申请挖窑二十二座，到乾隆十四年仍未开挖。

《满档·煤矿类·936号》是乾隆十六年二月，管窑参领班第等呈报出煤、未出煤、停挖煤窑情况的呈文。文内售煤者既有蒙族人，也有民人李正、白元等二十六人。在这个呈文中，民人包窑者，占班第所管煤窑包窑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3、《满档·煤矿类·952号》更记录了民人包窑者后人继承包窑关系的情况。这号档案提到：

“民人张宗在大斗里挖窑一个，张宗去世后停挖，隔八年查出，张宗之侄张容让与李大成、王田泽等重开。王田泽死后，照票丢失，请求补发照票”。

分析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

(1) 蒙人开窑之“徒有虚名”，或因当差紧急，舍窑从军；或因招“内地民工”、与“民人合开”等，中途因意见不合，停挖煤窑，隔一段时间，“重整兵马”，再度开挖。

(2) 某些民人之开窑或与蒙人合作开窑，如租种土地一样，也有“跑青”、“雁行”等现象。有的挖不

出煤即偷跑回家；有的“叨上一嘴”也返回原籍。在清王朝重税剥夺下，内地贫穷汉人被迫出此下策，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能够理解的。如前述乾隆四年张善、岳四折等的“供词”，便是例证之一。

进入嘉庆年代之后，有关煤矿的满、汉文档案较少，（其中有些满文档案誊抄本还未译出）现有的资料，只有煤税的收入而少开窑生产的情况。

辛亥革命前后，土默特地区在所谓“推行新政”的情况下，工商各业更加开放。当时，清王朝及民国的北洋军阀，都借口“筹款赔教”、“措筹军餉”，横征暴敛。这时，统治者无视土默特对境内煤矿的主权，滥发开窑执照，暴征照费、煤税。其结果：一方面，因照费、煤税陡增，加重包窑者负担，怨言载道；另一方面，由于境内煤矿彻底开禁，短期内形成了发展高潮。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适应时代发展的资本主义因素。比如，光绪末年，商人邢玉玺等串通土默特某些参、佐领，以巨额投资为诱饵，谋取清朝历代因“风水”之说严禁开采的五当召等地煤矿开采权之举，漠南、冀昌公司采用合股投资办法，不断兼并小煤窑。土默特境内的开矿规模，逐渐由原来的三、五人集资开采，变为大规模开采，相应地，各矿矿工人数猛增。据公元1918年（民国七年）土默特左旗档案馆262号载：“土默特境内除各沟三、五人开采之小煤窑不计外，较大煤矿（包括公司）尚有一百一十七个，（总计工人一千零六十多人）。其中最大的石拐沟喇嘛坝的漠南公司，有

工人四百多名，年出炭约七千五百多万斤。其它如小斗林沁东沟的广义窑，有工人一百五十名，年出炭二千五百多万斤。大西沟的黄土渠、羊厂沟的永字窑、孔子窑，也都雇工在九十名左右，年产煤约四百万斤左右。即使较小的煤窑，每名工人也日背十多背，折五百多斤。”这号档案的附表，还列举了用炭末烧“兰炭”（焦炭）的场子，计有十三处。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土默特境内采煤业情况，与二十年代不相上下。据《绥远通志稿》不完全的统计：此时土默特境内共有大、小煤（炭）窑约一百一十五个（处）。笔者查阅土默特满、汉文档案，并向知情者调查得知，当时土默特境内各煤矿，大都处于时挖时停的状态。除资金、技术等方面经营上的原因外，军阀混战、官兵勒索、土匪刁抢、时局不稳，也是造成停产的主要原因。土默特总管公署为了保卫各煤矿的安全生产和本旗的租税征收，特地成立了“马卫队”（应叫矿巡队），往来梭巡于各窑之间，但是没起到多大作用。到日伪统治时期，日伪军、警、宪、特遍地侵扰，杀人放火；山上山下，人心惶惶，境内各煤（炭）窑纷纷倒闭，煤炭生产，日渐衰落。据日伪时期成书之《萨拉齐县志》载：“公元1940年（成纪七三五年）时，全县有炭窑一十九处，工人二百三十多人。”窑数仅占1918年窑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采煤工人数只有1918年的百分之二十，所产的煤炭，绝大部分被日寇运往日本或调为军用，剩下的一点，有职有势的中国人，还能得到一

些“配给”的炭面，一般贫民根本买不到煤，只能是挨冻。

民国以来，在土默特境内先后设立过两个煤炭公司。

《绥远通志稿》载：“石拐沟，产烟煤。民国以后，士绅屠积义和包头镇守使孔庚及士绅张公权等人，相继成立漠南、冀昌两大煤炭公司。民国二十年左右，冀昌公司被漠南公司仗势挤垮，漠南公司遂成为土默特西境煤矿界上独一无二的资本主义势力。”

据查，“漠南煤炭公司”并未新开矿，而是利用“八个原有窑口”，由公司拿出部分垫款，作为办窑本。当时“八个窑口每年可采煤二千余万斤，分大、小块炭在本地和包、萨等地分价售出。售出之钱窑口得百分之九十，公司抽百分之十。所以，所谓“公司”者，只不过是一个靠地位、钱财、门路领得军阀一纸执照，并给窑口少量投资“贷款”作周转金用，然后净得收入百分之十的封建把头而已。

四、有关煤税租税的记载

土默特境内矿产，清代初期，曾经沿袭旧制，分拨给土默特各佐作为户口，收吃山租。详情前文已叙述。雍正初年，用禁闭办法，夺去了各佐蒙众收吃山租的封建税收的权利。这是土默特煤矿开发史上的一件大事。

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这件大事，也具有矛盾的两重性。一方面，摧毁了原有各佐分散的封建收租办法，应该说是好事，另一方面，从禁闭以后，清廷无视历史遗留的土默特地方权力，在中央集权制的思想指导下，意欲完全夺走土默特的一切权益，从而引起二百多年土默特境内的煤税斗争。在对待土默特煤矿税权问题上，清王朝从雍、乾年代开始，一直顽固地采取了表里不一、阴阳两面的态度。

公元1724年，当土默特归化城都统在封闭煤窑后，因土默特蒙众燃料困难，提出准许开窑的请求，同时提出了“收税”的请求。清王朝的批复是：“应照彼等所请准挖，若收税则非好事。”这是清王朝剥夺土默特地方收取煤税权，见之于档案的初次记载。

土默特并没有完全“遵旨”办理，而是根据土默特“官万俸、兵无饷”的实际情况，除按清廷批转的“售价折定为每百斤煤二十钱”外，另外酌加了二十文左右的“租钱”。这方面情况，《满档·煤矿类》各号材料中，多有记载。如：

《满档·煤矿类·875号》载：“据护军校兼煤窑头散札布，煤窑头巴雅斯呼郎、席勒噶达瓦、诺尔布、绰衣札布、敦多布等呈称：

‘自乾隆五年六月初一起至三十日止，巴雅斯呼郎、绰衣札布所开之五窑内，二窑未售煤，三窑售煤十七万八千斤，收钱七千一百二十文。……以上十九窑共售煤五十六万二千斤，

共收钱二十二千四百八十文。’”

《满档·煤矿类·882号》载：“乾隆八年二月初九日，管窑参领吴巴西报称：‘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一至二十七日止，西里干达克所开之五窑，一窑已毁，余四窑出售煤三十三万五百斤，收入一万三千二百二十钱；老珍塔西五窑，共售煤十四万三千五百斤，收入五千七百四十钱……’”。

《满档·煤矿类·1003》载：“……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份核实，共计煤窑一百五十七座，其中除待修四十一座外，余一百一十六座煤窑，共售煤二百三十八万一千五百斤，收入九万五千二百六十钱。”

从以上各号档案材料看，从乾隆五年至三十一年，有关煤款收入，不论是单项或合计，每百斤的单价均为四十文左右。比清廷批转的“售价折定为每百斤煤二十钱”要多出二十文左右。各号档案没有明确提到煤税、煤租，但是，可以断定：除原折定每百斤煤售价二十文外，其余二十文左右是土默特地方附加的“租”、“税”。如果说，这是土默特旗在争取税权斗争中的一个“胜利”的话，那么，清王朝是被迫默认为的。因为，实际售煤价比清廷规定的价，高出了一倍，增加部分作为地方附加的租税，并非偷偷摸摸地搞的，而是变成公开、合法的行动，并且白纸黑字，累见于档案。此外，土默特旗还制订出《抽取煤税章程》，作为土默特财政

半自主的开端。

《满档·煤矿类·875号》记载了翼长齐旺的呈文：“……以上十九窑共售煤五十六万二千斤，共收钱二十二千四百八十六，照数送来。……其中除以三成支给煤窑头散札布等六十二人外，其余七成入库。”

《满档·煤矿类·883号》也记载：“乾隆八年元月，共收入三万三千九百九十钱，十分之三给管窑人员一百零二人，余十分之七已收国库……”（注①）

乾隆三十年后，清王朝对土默特旗煤税的收支，逐渐加以干预，一面改革了煤税的征收办法，一面又限定了煤税的支出范围。关于支出范围的限定，容后再述。这里先将历次“钦定”的土默特煤税征收办法，记述如下：

1、《土默特抽取煤税章程》载：“每车一辆，收足钱四十文；骆驼每驮，收足钱十五文；马、驴每驮，收足钱十文。”（注②）

注①：《满档·煤矿类·883号》里所提已收“国库”，疑为“旗库”的笔误。因为《汉档》的很多材料记载，都是提“已入旗库”，并且有逐年上报档案表可证。因此，笔者认为“国库”两字，可能是翻译时译错了，将“旗库”误译为“国库”。

注②：《土默特抽取煤税章程》制定年代不详，据《满档》资料推算，当在乾隆三十五年左右。

2、《汉档·煤矿类·409号》载：“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三月，由副都统衙门兵、户两司奏定，将煤税大幅度增加。其规定是由三月一日起，每车一辆收制钱五十六文；每驼一只，收制钱二十文；每马、骡一头，收制钱十八文；每驴一头，收制钱十文。喇嘛湾等处水面地方以船运炭者，亦按载炭一千斤之数，再加炭税制钱二十文。”

3、《汉档·煤矿类·》载：“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正月，经奏明开始试办五当各沟抽收煤炭二成密厘（即每售一分，由密主纳密厘二厘）并奏请设密厘局。”

4、《汉档·民矿类·021号》记载了：鉴于本旗旧习的山主抽头，新包商垄断、无证私开等弊病丛生，经过和将军、都统商酌，决定革除上述一切陋习，由本衙门（副都统衙门）派员提收，由密厘总局统一收交。作为补助新政、兴学之用。

5、《汉档·民矿类》及《调防录》都提到：宣统年间，曾自办过煤窑口。做法是：每月拟定某煤炭窑口一处，由官家包卖，所得钱除将例额归公外，所余的款项，以四分之二归财务股按节余款存储，四分之一作为各参领津贴（指不兼公职者），余四分之一作为旗务处当差官员津贴”。

6、《汉档·民矿类》还提到：辛亥革命之初，各沟局、卡仍沿清制，计租二成，税一成。各地租税平均为大车每辆一百四十文；驼每只六十二文；骡每头四十八文；驴每头二十九文。1922年后仍改为窑主交租，车户交税”。

7、民国十一年（1922年）后，曾试行投标包税办法，并拟有包税办法二十条，招包各沟煤炭租税及台阁牧河炭租税。《汉档·民矿类》的许多件档案材料里，累累提及：“这种招标办法，亦有种种陋弊，有的包而不交，有的长期欠交。致使土默特当时唯一依赖的大宗收入得不到保证。

8、公元1914至1918年（民国三至七年），旗公署亦曾拟定各沟征收额数，并几度改订煤税征收额数。由于种种原因，实施中都遇到了较大的困难。据一些老“税收员”谈，当时实际情况是“税额虽有，因时因人而收，有时则成了“讨价还价”式的共同商议的收税办法。有的收税员曾经因“讨税”而挨打或“卖了命”。

土默特煤税的主要情况，除了上述沿革外，还表现在煤税的收、支方面。其中，煤税的收支情况，概要如下。

雍正二年，清廷批准土默特恢复少量煤窑。乾隆三年，归化城都统呈报：煤窑已派人挖成，并奉派专人管

理。煤矿开始有了盈余。乾隆四年八月，由土默特左翼副都统请求，“从二十二个煤窑收入中，抽出四百贯钱，十分之三分给看守煤窑官兵；十分之七奖给尽职勤劳的官兵。”直到乾隆八年，分配办法一直是这样执行的。这期间，只有个别年份的档案里没提到“余钱入库”字样。其后，清王朝下文：“归化城煤矿收入渐多，若全部奖给勤劳奋勉的官兵，殊为太多，应节余一部分，作为整修兵器之用”。并且在修改《理藩则例》时，也把这项内容加了进去。执行“节余一部分，作为整修兵器之用”旨意的时间，满、汉档的记载不同，悬殊较大。

《汉档·煤矿类》一文的记载是：“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十一月，归化城副都统咨文说：‘……其余四十四座卖煤二百六十四万五千四百五十斤，收钱十万零五千八百一十八文，七成入库七万四千零七十三文。’按照《理藩则例》规定：……所征钱文内十分之三作为管理煤窑之官兵盘费外，其余支给远方出差之官兵盘费二百串；每年年终赏给奋勉官兵五百串，作为三等奖赏；其余易银储存归化城副都统衙门，以备修理军器之用”。

满档在乾隆十一年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而是直到乾隆三十六年四月，绥远将军将理藩院于乾隆三十四年正月的咨文抄送归化城副都统，才提到这方面的记载。

绥远将军抄送给归化城都统的理藩院咨文

说：“查得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初十日，由将军富良奏称：‘嗣后，以煤窑所得钱内，动支其三分赏给管理煤窑之人员，其余七分中，将其二十万文钱赏给为公务效力之官兵用，其余钱文兑换银子，凑足千两即交付同知库，以归入正项钱粮。’”

这个文档与《汉档》乾隆三十三年一文中的富良奏折是相同的。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户部批复富良奏折时，其支出部分是：

“……奖赏效力官兵钱五百千文；赏给远差官兵盘费二百千文，尚剩存库钱十二万一千六百文，遵照原奏，易银交纳”。

这里，除了时期记叙上，满汉档有较大出入外，还有个入库地点不同的问题。按《理藩则例》规定是“余钱易银，储存副都统衙署”。而富良奏折是“易银交付同知库”。考诸各项文献，凡提及“余银交纳”的，有一段时间，是交付同知衙门的。

档案中提到的明令赏给效力官兵的五百千文，在实际执行中，大部分是赏给了上层官员，而且官越大，得赏钱越多。例如：乾隆三十五年的奖赏，头等参领二员，每员得9,985文；列为头等的骁骑校，护军校，每人是5,930文；列为三等的佐领，每员是3,905文，护骑校、护军校每员是1,300文；列为头等的帮兵，每名1,608文，列为三等的帮兵才给800文。

其支出二百千文的远差官兵盘费，并不是为发展土

默特煤矿所需的出差费用，简直成了对土默特煤矿的不合理摊派。例如《汉档》中记载，光绪元年三年支出的远差官兵盘费中，有派出巡查地界的官兵，有迎接乌里雅苏太参赞大臣、派赴护送科布多人员，有为乌里雅苏太解送兵饷、为乌里雅苏台迎接已故官员灵柩的官兵；还有派赴太原购火药、巡查西海“贼匪”、随将军赴五当召、护送赴多伦淖尔讽经喇嘛、呈送奏销册、会同五厅查禁蒙民私种罂粟、领取文件、随将军赴西公旗、派往达拉特查看贼尸、派往茂明安侦探贼情等等的官差支出。

所有这些都与土默特旗毫无相干的出差，都是受清廷中央、山西巡抚、绥远将军等直接指挥而派出的，而出差费用却要土默特旗从煤矿收入里来负担。

道光以后，土默特煤税的支出，又有新规定。《汉档》记载：道光十二年十一月，经都统、将军批准，“每月由煤税内提出八百千文，作为军器修补费用。”这是将《理藩则例》“其余易银存储归化城副都统衙门，以备修理军器之用”的规定，更具体、更合法化了。而且，不仅是“修理”军器，还发展到“购买”、“制作”军器、火药。光绪十年后，土默特地区也传入了义和团运动，境内有许多蒙汉人民曾直接或间接参加或协助了义和团“杀洋人、抗洋租、收回洋人掠去土地”等活动，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凶恶气焰。为了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光绪十三年二月，由兵部饬归化副都统，用土默特积存的军器修补费，制造鸟枪三百

四十杆，修好原有鸟枪一百杆，制造帐房五十三顶。共用去5,312,674文，按当时1,897文换银一两折算，合银2,589两。

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间，一方面是政局日益混乱，煤税收入日渐减少，另一方面是清廷已日临危机，顾不得对边远地界的控制，加之施行“新政”需要，开支激增。原来规定的煤税支出制度，差不多完全打乱。据《土默特财政志》主笔者综合的两张表格看，截止光绪三十四年底，补修军器项还存1,082,995文，煤税项却只存¹40,871文。

五、煤矿租税征收权的斗争情况

为了叙述土默特旗为土默特境内某些权益，与清廷的矛盾与斗争，这里不妨简要回顾一些历史背景。

公元1632年（天聪六年），后金爱新觉罗·皇太极率兵五、六万追逐察哈尔之林丹汗。五月甲子，进驻归化城，土默特部博硕克图之子俄木布（亦作恩布）及掌握实权的头目古禄格、杭高、托博克等“集众降”。公元1635年（天聪九年），皇太极命大将军岳脱驻守归化城。当年，岳脱分土默特壮丁三千三百七十多名为十队，每队以官二主之一——见《王氏东华录》等书。

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三月，清兵入关。四月，在北京建立以满族贵族为首，联合汉、蒙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中央政权。这个中央政权在征服、控制内地的

同时，也积极经营了早已投降的边疆地区，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土默特部在政治上说是属于被征服后的内属旗，从军事上说是清王朝继续征服漠南北各地区的军事前沿阵地。为此，清王朝对土默特部的统治极为重视。在清廷看来，要经营边疆，必先经营土默特。

土默特部从十六世纪以来，在阿勒坦汗力图恢复“故业”的思想指导下，不仅本地区经济生活日趋繁荣昌盛，而且在政治地位上也处于漠南各地的中心与战略要地，“控滦沈而屯湟鄯”，举足轻重；在军事上亦曾围“禁城”以逼和议，征卫拉晓约和平的地步。对于这样一个部族，而且早已是后金的拥护者，清王朝本应以“同盟者”对待，最起码也应当用‘羁縻’办法，使其日渐心服‘归附’。但是，清廷为了加强对土默特部的控制，在政治上任意压迫，在经济上肆意剥夺，特别表现在土地、矿产及煤税的征收上，尤其突出。下面，仅就矿山主权及矿山租税征收，加以叙述。

一、雍正初年之禁封：本来，土默特的矿山所有权，是由清初编“佐”时，和牧场一样一齐分封给各佐共有的。顺、康之后，一面是牧畜、森林日益减少，群众燃料渐缺；一面是内地民人日渐流入，不单增加了大量燃料的需求，同时也带来了采矿的技术（如前述万有孚之向蒙民租山采煤）。这样，在大青山、清水河一带的开矿采煤，势必不断发展。据有史考证，到康熙末年已达一百多座。这样，不单各佐可得到部分山租（当然也向都统衙门和两翼呈交一部分），同时，当地一般蒙

汉各族群众，也解决了燃料难采的困难。雍正初年，清廷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政权，在全国各地封禁矿山，这不仅侵犯了群众利益，同时也损害了由清王朝“赐封”的小封建主既得利益，同样，土默特旗的官员和各族人民群众的利益，也都受到了损害。因此，封禁不久，归化城都统即向清廷再三请求开禁采煤，这是第一个回合。

二、雍正二年，“诏”命开禁以后，一面是清王朝亲命对土默特所开之六窑（后为二十二窑）派员加强管理，“不准民人侵占”，一面却又是清王朝钦派的兴建新城大臣，肆意违反上述管理办法，借口烧石灰、烧砖所需，任意招揽民人开窑采煤。乾隆五年，山西巡抚给归化城都统行文，饬“按前二十二座煤窑例，再开其余八十座煤窑”。一时“官开”、私开煤窑混乱不清，并且亦曾一度引起道、厅官员向土默特争夺煤窑管理和发照等权。官司一直打到朝廷，经朝廷批复，仍归土默特管理，但民族之间争相开窑（如蒙古以“我们蒙人原来就有挖窑采煤习惯”为理由，争开煤窑，汉民则到处私开窑等），地方之间互不配合的形势已经由此而形成。这是第二个回合。

三、在山租和煤税方面，归化城都统在向朝廷奏请开禁采煤的同时，亦曾提出征收煤税以维持旗务的要求。清王朝开始以“收税则非好事”为理由，加以阻挠。随后，土默特虽然在收取“钦定”售价的同时，坚持了每百斤加征二十文左右的“租税”，但清王朝始则

默不加阻，继而在《理藩则例》公开承认，但又明令“年终报部”，最后一再直接插手规定煤税的收支项目，控制煤税开支权限，拉开了土默特地方与清廷之间煤炭租税斗争的序幕，这是第三个回合。

四、雍正元年，土默特地区设厅，乾隆六月，土默特地区设道。表面上是“管理客民”，实质上是剥夺土默特政治、经济权利的延伸发展。表现在土默特地区煤矿管理及开采的批准权上，尤其明显。如《满档·煤矿类·880号》记载，土默特翼长阿拉甫潭根据归化城副通判呈文，经会同佐领等研究后，于乾隆八年二月初一日，请都统府飭副通判偕管密参领老颜下去检查，察看了私开煤窑情况。

副通判的呈文里说：“…，现在归化城副通判所管范围的煤窑，有的报我府（副通判府）批准后开窑，有的报同知衙门批准后开窑，有的报都统衙门批准后开窑，就是这样参差不齐，杂乱无章。其间，有些坏民若开一窑口，又擅自封闭，另开一窑。若是管密之官查询时，他就只说一窑，实则尚有偷开煤窑两个。这样，在开窑期间，不断出现纠纷，互打官司。……他们本应报当地官府（按：指通判衙门）批准后开，可是他们却报不管煤窑事的城市衙门……现在，在山里新开的七十多个煤窑中，多半均为直接报城市衙门后开的。我身为副通判，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检查，发现只有十三个煤窑是

经过通判衙门批准开采的。所有新开煤窑的煤税，全都由都统府收税，当地官员无权收税。因此，请同知衙门把所有要求开窑者的姓名、年月、开窑地址、煤窑数量均报都统衙门，并要求抄发各通判……嗣后，若尚有开窑之民，须报当地官府，由当地官府造册报同知衙门，由同知衙门转呈都统府”。

这位副通判，虽不谙政策，倒也心直口快，一篇文章道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并且揭露了各官府争夺煤利和煤窑混乱的情况。

《满档·煤矿奖·881号》记载：“乾隆六年九月，都统衙门会同山西巡抚奏准续开九十八座煤窑时，民人袁文云、王颜、兰彤等人持都统府的照票赴清水河河叉沟、古路居、陈撒湾沟、干房梁子等地开窑时，清水河通判德叶恩竟阻拦不准开采，并派出衙役将工人刘奇等抓去。

以上两段所引档案文字，一段是通判要求煤窑、煤税的管理权，一段是拒绝都统府的开窑执照。档案里提到的一些情况，显然与由清廷“诏示”“土默特派出官员管理”的原则不符，也是对土默特煤窑、煤税管理权限的侵占。一地多官，互争权利，这也是造成混乱的原因之一。随后，经土默特一些翼长等的斗争，发照权暂时被土默特翼长和都统、副都统夺回。这是第四个回合。

五、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在改绥远城建威将军为绥远城将军后，紧接着是裁去归化城都统，移土默特原管的“牲畜过档银两”交杀虎口，并奏放大青山十五沟官地。在煤矿方面的表现是从乾隆二十七年开始，凡审查土默特煤窑发照、收税等的会议，均有将军或协领出席参加，其呈送有关文件也有了“呈报绥远将军”字样（《满档各文均有记载》）。这是加强绥远将军的行政权，和山西巡抚共同插手监视或直接干预土默特一切行政权利的表现。《满档·煤矿类·1175》一文，就记载着嘉庆五年，绥远城将军饬归化城副都统，催交本年十月、十一月煤税银两的咨文。这是第五个回合。

六、乾嘉以后，争执了几十年的发照权利，已逐渐由翼长归到都统，又由都统归到了将军之手，最后统一归到了清廷工部发照。对于煤税的收支，也由清廷作了规定，逐渐由清廷直接干预、控制与摆布。道光年间，更明确规定从所征煤税中提出八百千文，专供补修军器之用。已写入《理藩则例》的土默特征收煤税权利的规定，被任意撕毁，土默特的地方财政所得到的实际上只不过是分给管窑官员的三成留存，和赏给“勤奋”官兵的五百千文而已。到这时，土默特的地方政权，是既斗不过绥远将军，更斗不过清廷，唯有俯首听命了。

七、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腐朽的清朝政府惨遭失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清廷对帝国主义，表现得奴才十足，对人民却是进一步肆意掠夺。《汉档·清财类·0345》号载：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以后，

为了给侵略者赔款，归绥道恩铭遵旨提出“就地筹款八条”，筹款的重点除了蒙地、蒙盐及斗秤厘捐、租约印花捐、土货厘捐等项外，也从大大增加煤税来搜刮土默特的财富。该号档案提到：从前，“大凡民人一经花费工本采见煤炭，必有人出而讹索争控，一经涉讼，率皆为封禁窑口为了事”。这种状态要改变，今后“不论座落牧场、官山，招集妥商，勘定窑场开采”，以期达到“上裕国课，下资赔款”的目的。就是说为了保证煤税的收入，不准封禁窑口，而要招商开采。并且提醒绥远将军“除副都统衙门向例征收煤税外，将军衙门应酌提成若干，作为办公津贴”。土默特的煤矿，是封禁停产，还是招商开采，得根据清廷赔款筹集银两的需要来决定。过去是一个衙门收煤税，现在由两个衙门来收税，加重税收，完全是清廷说了算，土默特部哪有一点地方权利可言，在这场争夺煤税权利的斗争中，土默特部是完完全全地败北了。

八、辛亥革命前后，一些矿商借口开办实业，与土默特某些上层人物勾结，推翻历史上沿袭下的惯例，招民工开挖乾隆、道光多次有“旨”保护风水的五当召矿地，曾引起很大矛盾，设讼、械斗二、三年。在其它地区，也有类似情况。辛亥革命后，一些北洋军阀打着孙中山在斗争初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趁火打劫，兴风作浪。他们策划着要取消土默特旗建制，对于土默特旗在历史上形成的对境内矿藏拥有矿产权，根本不予理采，怂恿一些矿商经向实业单位重新

领照开矿。引起了土默特总管衙门以及有关权益的参佐领们的惊恐，甚至与煤矿利害有关的下级官吏和土默特小知识分子们，也惊恐万分，积极起来参加“保年，权”斗争。虽未引起大的武装械斗，却也连续设讼十多官司一直打到当时的大总统处。

这次较大的斗争情况，《土默特历史文档》里有如下的记载：

1、《汉档·总字第三号》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十二参领再呈总管（当时土默特总管是由北洋军阀委任的）一文说：

实业筹备处（绥远省属）对于本旗所属大青山一带矿产所定的办法，不谙斯地情形，并未会商本旗，蒙请咨部立案，殊于本旗固有权利损失殆尽。全旗命脉所关，万难承认。”

“案查该处呈文内云：‘当时本区尚无主办机关，暂准总管就近核办’云云。查本旗于民国四年间因各省设有矿务监督署，凡系矿务，统归该处办理。旋因取消矿务监督署，各省矿业改归财政厅管理，是以本旗恐失固有权利，依照矿业条例，呈请注册。当蒙允准特定办法。在未经核定以前，暂准注册，仍委总管就近办理”。

2、《汉档·总字第二号》民国九年十二月各参领再呈一文中，除照前叙述沿革外，又补充说：

“查本旗境内煤炭矿区，于清光绪三十四

年间，曾由农工商部领有执照，复于民国四年间，遵照注册条例呈请注册，当经农工商部以本旗矿产有特别情形，特许另定办法。于未经核定以前，暂准注册。

工商部又称：‘该旗矿产，向来系直属中央办理，仍委任土默特总管就近核办’。

“凡本旗境内大青山一带矿区矿产之一切征租、发照、处分权，历由本旗办理，本旗固为主管机关。其所收租税，作为本旗兴学及政、军各费，实本旗之命脉。若统归该处循例办理，不啻取消了本旗之生产，戕害旗蒙之生命。詎知矿业收入有关全旗命脉，生产尽失，旗务何以存在。筹思再四，万难承认”。

3、《汉档·总字第四号》载：民国九年，全旗参、佐领及各科科员呈请大总统、国务院、蒙藏院会、农商部电。全文是：

“北京 大总统、国务院、蒙藏院、农商部钧鉴：现绥远实业筹备处呈请都统转请蒙藏院、农商部核议与土默特划分矿产权限一案，参领等查阅训令，其中有失主权且与农商部特许成案及待遇条件诸多抵触。本旗矿业，关系全旗命脉，人民生计，若依照该处现呈办法实行，旗产殆尽，旗务立亡，数万穷蒙何以谋生。筹思再四，万难承认。除将否认情形请总管转呈（绥远省）都统咨部核办外，谨特先行

电恳，请将前案暂从缓议，以维旗产，而重法案施行。

归化城土默特参领贺色春、都格尔扎布、诺蒙格尔勒、达恒泰、森额、卜端玑、苏联春、若宪、阿里雅、图孟额齐尔、倭什珂、吉忠额、福录及全体佐领、骁骑校；

总务科科员德克吉珂、巴彦文、德克精布、瑞联、胡图哩、松寿、伊哩布、阿绅额、吉尔格勒、殷德贺；军事科科员色格布、庆春、舒敏泰、满笃祐、福寿、托克托布、兆纳苏图、瑞善、崇厚、文宝；财政科科员苏鲁岱、额音泰、常龄、富林、锡敏泰、端恒、麟阁、德善；教育科科员国安、朱隆阿、札勤芬、恩锡荣、纳木凯、锡拉奉阿、丰绅、万才、武正额等谨叩”。

4、《汉档·总字第八号》民国十一年一月，土默特十二参领再呈蒙藏院一文说：

“查民国九年冬，因绥远实业筹备处滥用职权，侵夺矿产等情，当经敝旗推选都、贺二参领代表全旗赴京请愿。旋蒙钧院依据优待蒙旗条例，咨请农商部将矿业划归本旗办理，以符前大总统特许自收自支之成案。并蒙工商部俯允另定专章，以利推行，仰见于维持矿业之中，仍寓体恤蒙艰之意。敝旗矿业，非维与内地情况不同，亦且与他旗情形迥异。乌伊十三

旗皆僻处边陲，事既简单，俗亦朴陋。唯土默特旗地处衡繁，开化最早，一切军、政、教育等事，居绥区重要部分，而常年经费悉恃矿业收入。倘或农商部拟定暂行章程经闾议通过执行，种种办法与敝旗历年习惯不合，削脚适履，遵守不可，违反不能，殊非国家优待蒙民之例，且不利于土地财产之宗旨。参领等以为与其变更于事后，何如慎重于事先。敝旗总管会同实业厅长查照矿业条例，并参酌地方情形，妥拟单行章程，一俟拟就，即行会呈绥远都统咨请农商部查核立案。为此，联名恳祈钧院转咨农商部，关于矿产简章，暂行免交闾议。

谨呈

蒙藏院总裁 贡

土默特旗十二参领叩”

从以上引述的档案材料看，北洋军阀当局当时设立了绥远实业筹备处，已经提出了分掉土默特旗矿产权的计划，正在呈报批准中。土默特参领等官员，闻讯后感到煤税是地方财政的命脉，若让绥远实业筹备处拿去，危及土默特地方政权的生存，所以再三再四向上呈文申诉、抗议。为的是，阻止农商部拟定之暂行章程通过执行。否则“遵守不可，违反不能”，就难办了。尽管，从土默特旗方面来说，是单方面的言语，并且其所持理由亦并不全面，但是也可看出其争执的原委。这些电

文，呈请上报后，国务院、蒙藏院、农商部有何批复，未找见任何档案材料。根据《绥远通志稿》都格尔札布传记记载，都格尔等赴京请愿后，颇起作用。当时，北洋军阀连年混战，大总统、国务院及绥远都统等的人事，也是连年更迭，从当权者角度看，要考虑的大事太多，哪里还管得上土默特煤矿“琐事”？所以，土默特煤矿（主要是煤炭租税）主权，得以苟延保持下来。

关于土默特煤矿的开发和斗争情况，还有许多值得记述的资料，限于篇幅，本文仅择要叙述如上。由于笔者水平所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另外，本文所选用的《土默特满文档》，译者均系外地年轻人员。在引用时，已觉察到有些公文用语及人名、地名等，不太合乎原意，或不合本地习惯译音，但也只好依译本为定。

（责任编辑 胡志英）

（上接103页）

一口吃了个李子——谁不知道谁的底子。（表示彼此非常了解）

老牛尿关道——哩哩啦啦。（比喻说话罗嗦）

耗子啃玻璃——吃镜（劲）。

（表示事态严重）

荞麦皮打浆糊——不沾。

（比喻离题太远或与人的关系不怎么样）。

土默特蒙古户口地 的由来与变迁

彭 勇

土默特地处祖国北疆，地域辽阔，气候宜人，其地域广四百零三里，袤三百七十里（清定界址）。土默特平原水草肥美，宜于畜牧；良田沃土，宜于农稼。自从明朝嘉靖年间阿勒坦汗驻蹕丰州滩以后，土默特蒙古人一直过着以游牧为主、间以农稼的生活。

清朝统一中国后，零星战争仍未停止。清统治者为了役使土默特兵丁为其出征打仗，把土默特编定披甲兵五千名，约在康熙年间，“每兵一名，给地五顷”（《蒙垦续供》）。对蒙古官吏，也按等级分给了比兵丁多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土地，名之曰“官弁递增”。这些官吏按怎样的等级进行“递增”，目前尚无资料可证，不过从民国时放垦的土地资料中可以得知一二，镇国公（清时为辅国公）的户口地有一千余顷（其地在山后苏木，绝大部分是以后占有的，山前有些早已卖掉），丹津（康熙末为归化城都统）的户口地有二百八十多顷。

清政府给土默特兵丁分配土地的初衷，是为了造成役使土默特兵丁以地代饷的物质基础，由都统、副都统统辖之，土默特蒙古官兵必须自备当差，官无俸、兵无饷，而扎萨克旗则有一定的自主权。土默特蒙古按清政府规定“三丁披一甲，凡遇出征遣二留一”（《理藩院则例》）。由于土默特官兵须经常当兵当差，因而对所分土地“兵亦不自耕，仍招垦收租，以租自养”（《蒙垦续供》）。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五、六十年以后，到乾隆初年，由于封建地租剥削的刺激，各级蒙族封建主及汉族地商兼并土地的欲望越来越大，他们除了不断侵占公共使用的土地（如公共游牧地）之外，也不断伸手掠夺分配给蒙古兵丁的户口地，一些蒙族官吏还利用蒙丁死亡无嗣收回地权的机会，把绝户地也据为已有。从而就形成了“有力者则任意侵占，衣食充盈，无力者则丝毫不得，饥寒交迫”（乾隆七年十月十五日喀尔吉善等奏折中语）的两极分化的局面。同时，由于租典关系的出现，那些商业高利贷者（即所谓地商、揽户）利用蒙丁出租出典土地时“四至不明、亩数不清”的漏洞，大量侵吞蒙丁的户口地。因此，在乾隆八年前，许多蒙古兵丁的土地早已不足五顷。有的已经把全部土地典租出去，而又无力赎回，有的甚至已完全失去了土地、成为赤贫。

土默特蒙古兵丁由于失去土地而造成的贫困是对清朝统治者的一个很大的威胁，连马匹装备都弄不起，基于这个原因，清政府在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下令

对土默特的土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通过这次整理，清查出土默特两翼共有农田、牧场和典出地亩七万五千零四十八顷，其中典出地有四千顷；土默特蒙古人口共有四万三千五百五十九人，无地的已有二千八百一十二人，土地很少或不够一顷的有二万四千二百六十人（土地很少的指每口平均有地三十二亩以下之蒙古，共二千一百五十六口；每口平均有地三十二亩以上、不足一顷的有二万二千一百零五口），土地较多的有一万六千四百八十七人（《清高宗实录》卷一九八·乾隆八年八月辛亥条）。

这次的调查结果充分反映出土默特蒙古的贫富分化和土地集中的趋势已很显著。针对这种情况，清政府对土默特蒙古的土地按人口进行了一次再分配（即户口地的再分配）。

清政府当时规定：每口土地以一顷为率，作为常业。无地的和少于一顷的，从占地多的蒙户中计亩撤出，拨足一顷。典租给汉人的，典价在一百两以下，典期五年以上的，允许再种一年，不够五年的，准其耕种期满。典价在二百两以上的，只准再种三年，到期一律收回。

同时还严格规定：户口地不许典租和出卖，如发生典卖，清政府可把户口地收回重新分配，予取予夺，操之清庭；蒙丁无嗣“绝户”或“正法”者，户口地随即收为国有。（以上规定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九八·乾隆八年八月辛亥条）。

从这次重新按户口分配土地后，户口地的名称便沿用了下来。不过，这次土地的再分配，由于当时也未进行认真的丈量，因而每口实际划留的土地并不是整一顷，而是一顷上下。原来土地多的，保留的土地一般均多于一顷，原来无地和地少的，拨给的地一般就不足一顷。

自乾隆八年重新分配户口地之后，一方面由于土默特蒙古向来以游牧为主、不善耕作，另一方面也由于土默特蒙古男丁须经常当兵当差，家里留下妇孺又不谙农事，对所分土地还是以出租为主，不顾清政府禁令，继续出典和出卖。此时的土地买卖大多在“倒兑”的名义下进行，还专门在卖地契约上写上“卖租不卖地”的字样。其实，在当时社会里，地租的占有恰好是土地占有的标志，卖掉了收租权，实际上等于卖掉土地，这只是一在禁卖土地下所玩的把戏罢了。

在清代，土默特蒙古的土地除典卖外，其租地形式还有以下三种：即活约、活租和永租。

活约地是定有出租年限，到期回收者。其典型地约如下：

立租地约人宋天德，今租到朋松召架色喇嘛名下开坎草地一段，东至茶坊庙，西至坟园，南至大路，北至路姓地畔，四至分明。言定地租钱每年一千文。自五十四年秋后交还。不许短欠，亦不许长支短探，亦不许长迭。恐后无凭，立约永远存照用。

乾隆五十四年六月立

捞 望

稍独包 中见

(见旗档)

活租地是出租年限不定，土地原主还给租地人押地钱（即押金）后即可回赎土地。其典型地约如下：

立出租地约人六家保什户，今有（因）差事今积（紧急），情愿出租典与曹明名下耕种承业村北白地一块，系南北畛，东至哈力色，南至郝永宽，西至金富，北至金富，四至分明，现使过押地价六八钱一十三千文整，日后许钱到回赎，钱不到种地不计年限，每年秋后出租钱一百五十文，日后有人争夺有六家保什户一面承当。恐口无凭，立约为证。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廿日立

蒙古六六 十

中见人郑永发 十

崔 俊 十

(见旗档)

永租地则永远耕种，许租户退地，但不许土地原主主动收回。这类地其实是变相的卖地，蒙古人以后每年只收地谱（亦称小租）。其典型地约如下：

立租地约人兰秉福，今租到单进喇嘛生地四块，计地七十亩整。言定每亩地租银三分，

每年共租银二两一钱整。种地不计年限，许种不许夺。租银以老八十合钱。恐人失信，立租约为用。

乾隆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韩灼 十

哈力善 十

赵世英 十

(见旗档)

土默特地区的土地租典与边内地区的租典相比，有其不同的特点，长期以来，逐渐形成了一套民间习惯法，其主要者如下：

蒙古人认租不认地 汉人租种蒙地，每年出钱若干，俗呼为地谱。但是由于蒙古原主累世相传，后代渐渐连自己的地的位置都搞不清楚了，只是按年凭帐吃租，并不问其地有无变迁及移转何人，故有蒙古人吃租“认租不认地”的说法。

地谱 即地盘钱，蒙古之户口地向例不准出卖，其辗转典租，无论移转何人，均须向蒙古过租，否则蒙古原主不知其地属何人，原租地人仍必须负担纳租义务，此义务非过约后不能消灭。

永佃权 汉人向蒙古永租土地后，即取得了永佃权，以后转典转卖，可随意处分，蒙古原主不得干预。

推地过约 原租地人将地转移第三者，名曰推地，在双方缔结契约后，仍须向蒙古原主声明过约，并另立过租约两张，由租地人与吃租蒙古各持其一，为转移地谱之

一种手续。其过租费每亩银二分或三分不等，归蒙古享有。

赎地时期 如蒙古原主或转租人须按约回赎土地，但时间必须在春天的惊蛰以前或秋天的收割之后（即阴历三、九两月），倘逾此两期，青苗在地，不准抽赎。

尽卖不尽典 如蒙古原主将典出之地复又典与他人，原典户可以阻止；若蒙古原主将典出之地出卖与他人，则典户仅能索要典价，不能阻止出卖，唯典户有意购买时，可以有先买权。

赎地加工本 租种蒙古未开垦之荒地，种地人如花费了一定的资本（如筑堤修堰及引水灌溉等费），因而在立约时往往书明日后回赎，必于典价之外，另加工本若干字样，不付给工本费即可不予回赎。

由于土地租典关系的极度发展，到清咸丰年间（1851—1861），土默特蒙古的户口地已“多半典卖”（《归化识略》）。到清末时，土默特蒙古失去土地的现象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甚至“有祖父祖典与汉民，约有年限，至其子孙不知收产”的情况（《绥远奏议》贻谷在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语）。

本来土默特蒙古的户口地到清末时所剩已为数不多，但在“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谷来到土默特地区后，又制定了《清查土默特地亩试办章程》二十一条（见《钦差垦务大臣全宗》第260卷），对土默特蒙古回赎土地作了种种限制。对永租地，则决定取消蒙古的回赎权，以加价确定汉人的管业权；对活约地，在约据上没

有明确保留回赎权利的，或虽有明确保留回赎权，但至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不满契约期限的，规定一律听汉人交纳加价，定其管业权；对活租地，拟由局出示晓谕，限令两月内取赎，在此期限内不回赎，则听民人交纳加价，以确定其管业权。贻谷的这种“限制蒙人的回赎权，以确定民人管业权”的整理土地方针，使土默特蒙古又一次失去了大量的户口地亩。

由于土默特官民的一致反对和“贻案”（即贻谷被归化城副都统文哲辉奏劾“败坏边局，蒙民怨恨”被查办一案）的发生，使土默特地区的土地整理工作中途停顿而未能竣事。但在进入民国以后，军阀政府又接续贻谷未完成的土地整理工作，从民国三年（1914）十二月二十九日开始，又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地亩清理工作，并将贻谷所订的二十一条《清查土默特地亩试办章程》增益修改为《修正清理土默特地亩章程》（即二十四条，和贻谷原二十一条章程的基本方针是一致的）。按此章程，对土默特地区的土地无论荒地、熟地一律彻底清丈，并换发新的土地照票（民国四年岁次乙卯，故民间俗称“乙卯大照”）。

这次的土地整理工作，其基本政策仍是“剥夺蒙民的土地所有权，巩固种地民人的土地管业权”，按章程规定，“应准该旗蒙人于本年阴历八月底以前备价回赎”，由于回赎期限短暂（从章程公布到八月底只有两个月时间），而且只在县政府公布，蒙民不去县因之也不知道，直至民国十四五年，因赎地兴讼长达数年之

久，终于败诉。土默特蒙古无法回赎土地，又一次大量地失去了借以维生的户口地。因而乙卯年换照，给土默特蒙古人带来的灾难是空前未有的，所以一些土默特老年蒙古，至今仍记之于心，诉之于口。

经过清末和民国的两次大规模土地整理，土默特蒙古户口地的所有权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蒙古自种地和可赎的活租地外，其它各种租典地亩一律听任民人交价领照管业。因此在民国中后期，土默特地区的土地所有制基本成为如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土默特蒙古的自种户口地。此地属土默特蒙古所有，领有自种照票（因纸为红色，故亦称红照、红片），不向政府交纳土地租赋。

第二种是民领地。此地属政府所有，民户向政府交纳地价后领有照票，可永远管业，但每年须向政府交纳租赋。此类中包括土默特蒙古在清理地亩时赎、买回的户口地和交纳地价后又领回的土地，与汉民管业的土地一样，须每年向政府交纳租赋。

由于土默特蒙古的自种户口地愈来愈少，生活便日益贫困，有的则生计全无、备受冻馁。为了生存，有的土默特蒙古便铤而走险，起来与垦务局进行斗争，其规模较大者有清末的吴坝村的反清丈斗争和民国乙卯年老海牛领导的毕克齐反清丈斗争。呼市孤魂滩事件以及在民国中期，土默特参佐领和旅京学生为了争取土默特蒙古户口地的回赎权利，曾向有关部门一再呈告，官司直

（下转第188页）

土默特地区戏曲

崔殿月

土默特地区蒙古族戏曲源远流长，逐渐演变。据《译语》载：“或以胡笳，或以弹琵琶，或说彼中兴废，或顿足起舞，或抗音高歌以为乐。女好踏歌，每月夜，群聚握手顿足，操胡音为乐。”迨清代，蒙古歌曲同样被内廷所重视。“内廷每遇庆节，乐舞参用蒙古乐曲。情词谐婉，泠泠动人。”（《南省公余录·卷七》）。但是，随着土默特日益汉化和日益与其他蒙古各部相隔离，前引明、清人所述的歌舞特色已经难得一见，所有民间流布的歌曲逐渐与汉民所唱者一样，并因此而形成新的风俗。土默特地区流行的剧种主要有三：（1）山西北路梆子、（2）小唱班（今称“二人台”）、（3）本地地区的秧歌。

在乡村，请梆子剧社演唱，主要在农业生产间歇的日子里，多半是为了谢神，如谢关帝、龙王、奶奶等。或者为了庆祝好收成、或一项建筑的落成。一般是演三天，大都在各庙观的门前有固定的戏台。唱戏三日也是庙会三日，交易的三日。土默特人不仅热衷于看戏，而

且也很熟悉所演剧目。剧中的生死离合，悲欢怨怒，往往感人至深而引起人们的共鸣。唯其中涉及民族之间的情事者，如《金沙滩》、《牧羊圈》、《四郎探母》，《八大椎》、《洪羊洞》等等，会引起不同的议论。除了戏场看戏之外，也有请“唱戏的”到自家去清唱。清廷曾经有专门的敕令，禁止蒙古人看戏及唱戏。《宣宗实录·道光八年十一月》载：巴彦巴图尔系土默特……之人，乃敢私雇边内戏班，在家演唱，并将蒙古子弟引诱演习，可恶之至。巴彦巴图尔……交该署部都统亲提审讯，按律定拟具奏。”

小唱班是民间业余流动演唱单位，除五、六个伴奏员外，只有两个演员，班小灵活，一年三季（冬天除外）流动乡间。他们所演戏目，大都为民间情事，很受欢迎（也不免杂有猥亵唱作，并因此而惹出事故）。每到一地，丝弦一奏，立即就能打开场子向如堵的观众演唱。土默特人中也能演唱。据已故二人台专家苗文琦所著《蒙族有无戏剧传统》（1957年1月29日）一文载：

“每在夏夜、冬闲之间，他们便带着几件简单乐器，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自拉自唱，这种形式就叫做“小曲儿坐腔”。当他们嫁娶喜事的时候，亲戚、朋友欢聚一堂，会拉的就拉，能唱的就唱，直到深更半夜方才尽兴而散。所唱的内容都是蒙古民歌，如《三百六十只黄羊》、《四公主》等，汉族群众称这种坐腔为“蒙古曲儿”。光绪初年，包头、托县等地财主、商贾大设宝局，他们每天以一百钱，将唱“蒙古曲儿”的业余艺人

雇来卖唱。首先参加的有秦亮、阿立正（蒙古族），继之蒙古族艺人老双羊也参加了。

老双羊即荣双羊，土默特蒙古族，祖籍土默特旗孤雁圪里更，后迁居协盛永村，被老艺人奉之为二人台的“开山祖师”。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年），二人台主要创始人老双羊将“打坐腔”变成了化妆演唱。将旦角的花衣换成彩衣，将绢子改为贴鬓、包头，箬帚换成手绢，秧歌步子改为台步……

“二人台”剧目中反映蒙古人民生活的有《阿拉奔花》，是叙述一个蒙古族青年和汉族妇女恋爱的故事。全剧对白蒙汉语并用。《打后套》是反映农民反抗地主的故事，而领导这次反抗活动的结义兄弟有蒙古族二少爷塔木架。《种洋烟》、《海梨花》剧目中也有蒙语表达蒙古族生活的歌词；《牧牛》一剧，过去曾穿着蒙古族服装以蒙语对话演出过，且有蒙文剧本。

“二人台”的音乐中有好多是吸收了蒙古族的，如牌子曲中的《八音杭盖》、《四公主》、《三百六十只黄羊》、《扎油圪包》、《古拉奔包劳》等，这些牌子曲过去都有词曲，其中像《四公主》、《三百六十只黄羊》就以蒙语演唱过，后因语言关系，汉族艺人只学会了曲调而没有学会词。

老双羊创建的“二人台”，不但在蒙古族的宴会上演唱，也在汉族的喜庆聚会上演唱。最初，只摆一张放扬琴的高桌，后面再放一条板凳，为奏乐者的坐位。其服装道具也极简略，旦角穿一身红袄绿裤的古式女衣，

头上盘一个假发络的“圪堵子”，面扑白粉，两脸蛋搽红，口点红唇，手拿一块花巾（手帕）或玩一把折扇。男丑角头戴一顶破毡帽，身穿一件旧上衣（一般农民穿的白色或兰色布上衣），腰束一条兰布腰带，鼻梁凹抹一块白，鼻下假胡朝上栽，手持霸王鞭。乐器也由胡胡、梅（笛子）两件加了扬琴和四块瓦。

老双羊除了把蒙语掺进汉语中演唱外，有时还把纯蒙语的蒙古歌掺杂进汉语中表演歌唱。如《四公主》、《森吉德玛》的蒙语歌曲。在“二人台”表演的道白中，有时也用蒙语编入串话。在《亲家翁相会》的表演中，其串话是：

玛奈（1）到了塔奈家（2），
黄油酪蛋奶子茶。
正赶上塔奈念经巴雅尔啦（3）！
玛奈的幸运多好啊！
中午席上放“五叉”（4），
玛奈安在首位上。
塔奈敬酒我紧唱，
你看玛奈多喜乐！
塔奈到了玛奈家，

注：（1）“玛奈”：蒙语，“我”的意思。

（2）“塔奈”：蒙语，“您”的意思。

（3）“巴雅尔啦”：蒙语，“喜庆”的意思。

（4）“五叉”：为蒙古族最崇高的宴席食品，又称“羊背子”。

正赶上玛奈不在家。
进门碰上锁圪达，
对不起呀，失礼啦！

瞎眼的脑亥（5）咬塔奈，
塔奈抽出大烟袋，
狠狠地揍了它的“讨劳盖”（6）。
让您受惊怨玛奈。

《亲家翁相会》的故事情节为：在土默川的平原上，有蒙汉两家结成了儿女亲家，因为语言互相不通，亲家们很少来往。这次亲家翁相遇，汉族亲家翁向蒙族亲家翁道出未招待好的道歉话。

老双羊在演唱《走西口》一剧时，用蒙汉语混合道白的串话有：

进了土默川，
不愁吃与穿。
乌拉高（7），岗勒湾（8），
海海漫漫的米粮川。
牛羊肥，生活宽，逃难人见了心喜欢。

一走走到山湖湾，

-
- 注：（5）“脑亥”：蒙语，“狗”。
（6）“讨劳盖”：蒙语，“头”。
（7）“乌拉”是山。
（8）“岗勒”是河川。

碰见两个鞑老板（9），
他们说话我不懂，
只好比划问平安。
有水请你给一碗，
我要解渴把路赶。
塔奈“勿圪（10）“米德贵”。（11）
忽尔登雅步（12）指向西。
手指口渴嗓子干，
她却给了一碗酸酪蛋。（13）

土默特人对这些反映当地风俗民情的戏曲极为喜欢，很多曲牌及词调，也能演唱，唱时也间有蒙古族用语。有一种被叫作“爬山歌”（或“爬山调”）的歌曲，土默特人也同样放声高唱，内容大多是反映男女爱情的，而词则由二句组成。前句比，后句兴，是《诗经》比兴格的简化。唱则在山野、禾田、途中、半辕上与马背上。不论白天和夜间，有兴即唱，情之所钟，词遂编成。青年妇女不出门则在闺房悄声唱，或与女伴对唱，或独自哼哼，以此遣发。下附《阿拉奔花》（节选）

（9）“鞑老板”是蒙古族大娘。

（10）“勿圪”是话。“塔奈勿圪”是你的话。

（11）“米德贵”：不知道。

（12）“忽尔登雅步”：快走的意思。

（13）“酸酪蛋”：为蒙古族制成的乳制品——干

酪。

阿拉奔花 （节选）

口述：计子玉 笔录：苗文琦

校注：杨润成、卢章、巴图淖、贺 炳、都君一

人 物：乌银齐（蒙古族青年、丑）

海梨花（汉族姑娘、旦）

〔丑上。〕

丑：（蒙语唱）

雷声闪电风又大，

大雨不住淋淋下，

路上水大我咋呀？

哎，阿拉奔齐花，

找一个房子避避雨哇。

（蒙白）啊呀！好大的雨！（发现房子）噢！这儿有个房，可不知道家里有人没人？管他有人没人，我先上前叫门。

（喊）开门！开门！

〔旦上。〕

旦：（唱）

清早起，要早起，

烟囱（音洞）里冒烟冲天起。

二爹娘生下我美貌女，
爱我的人儿实实多哩。
海梨花，乌拉银齐花，
忽听得门外有人来叫咱。

（白）谁叫门嘞？

丑：（蒙白）我是个蒙古人，外头下得雨大，
你开开门，我回你家避避雨哇！

〔旦开门。丑进，抖衣服上的水。〕

丑：（蒙白）啊呀！好大的雨！好大的雨！把
我的衣裳都湿啦。姑娘，你好哇？

旦：我不懂你说的甚？

丑：（汉白）你不懂的咱们拿汉话说哇。
我是问你好哇。

旦：好！好！这么大的雨你是从哪来的？

丑：（蒙白）我是从马场来的。

.....
.....

丑：（蒙语唱）

荞麦开花顶顶白，
你妈妈咋生你来来？
红不是红来白不是白，
哎，阿拉奔齐花，
脸蛋蛋好象果子花开。

旦：（唱）

蛮子女人穿红鞋，

蒙古女人穿马靴。(1)
穿上马靴踏地稳,
戴上链垂(2)怪袭人。
海梨花, 乌拉银齐花,
汉人不如你们蒙古人。

.....
.....

丑: (蒙语唱)

鼓打三更月照亮,
我回去书子给你捎。
蓝绫子手帕昭君套,
哎, 阿拉奔齐花,
各样的东西都捎到。
〔二人依依不舍分别。丑下。〕

旦: (唱)

大榆树上喜鹊扒,
唧唧喳喳怪叫噪。
叫声喜鹊别叫噪,
你叫得妹妹心难活。
海梨花, 哥哥呀,
你把妹妹想死呀!
黑马草场在村西,

注: (1) “马靴——蒙古女人穿的绣花短腰小靴。

(2) “链垂”——蒙古女人的头戴装饰。是下垂在
耳边绣有花纹的发辫套子。

思想起乌银齐泪凄凄。
想你想得云无雨，
知命的君子埋怨谁！
海梨花，哥哥呀，
你把妹妹活想煞！（下）

（剧终）

附记：

（一）剧名“阿拉奔花”原是蒙古曲调名，本义为十朵花，因系蒙汉语演唱，又名“风搅雪”。这是二人台中保留上来的蒙汉语演唱之唯一剧目，现在很少有人能全部演唱了。

（二）剧本中蒙语唱词和道白，都是按蒙语原意译成汉语。

（责任编辑 孙才）

（上接178页）

打到南京国民党政府。还有很多有志青年，认识到只有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改变土默特蒙古的贫困命运，他们有的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有的就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斗争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从此，土默特蒙古才迎来了自身民族的解放，土地问题才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责任编辑 云文瀚）

逸闻三则

官 步 生

满泰生平中的二、三事

满泰字子舒，生平传绩已发表了多篇，笔者不重复，单记述满泰生平中的二、三事。

一九三〇年，他任阎锡山的乌伊两盟十三旗的边防司令，兼任土旗总管。但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气，对汉族人民亲如手足、爱似同胞，至今还在人们中间流传。

一九三〇年四月，他赴京办事，居在沈外馆（这个外馆，实际上是蒙古族常来往的驿站），深夜间，有一个妇人生孩子，当时来不及找接生员，惊动了所有住在此馆的客人，大家束手无策。妇人浆泡已破，眼看要生，满泰向她说：“你不必怕，如果不嫌我是男子的话，我就当接保员吧！”她含羞地说：“可以！”子舒洗了手，剪了指甲，为她接了产，这位妇人安全无恙。主人感动万分，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蒙宝保”。

满泰祖籍是萨县鄂尔格逊乡人（现归包头郊区），有一次回家探亲，离村二里多地就下马步行，卫兵带得不多，只有三人同行。进了村，逢见老者就作揖问好，对个别老者还给叩头请安，不管见了谁，总是面带笑容。乡亲们都说：“咱们的满泰回来了！”他回家后稍停片刻就进行访贫问苦。我爷爷是光绪十三年秀才，因家境贫寒，以教书为生，满泰听说他病了，亲自登门，留下五元钱让我爷爷治病。他说：“咱蒙汉自古是同胞啊！”凡受过予舒接济的人不计其数，到现在老年人还说起当年流传的话：“蒙汉人民一家亲，满泰就是证实人。”

一九二六年，满泰任三十师师长、包头镇守使时，除了办公外，还要利用休息时间走街串巷、了解民情。有一次，一位老年人找亲戚找不到住处，正在大文明巷徘徊时遇到了他。他问明来历后，亲自护送，一直到深夜，才在财神庙街找到老汉亲侄子的住处。后来，这件事传遍了五原，当地人中间还流传着一首民谣：“满泰满泰好师长，一辈一辈也不忘！”

翌年四月的一天，他带了二十多名的官员，出去视察农村的旱情，到了沙尔沁村，正赶上观音庙过会唱戏，热闹非常。沙尔沁村乡公所听说满司令要来，不仅给他搭起了看台，还给他准备下了许多酒菜，恭候他的驾临。戏班里也得到通知，准备迎接司令。那时有个规矩，迎接显要人物时，不管戏演到哪一场也得停止，乐

队还得吹奏欢迎的曲牌。可是，直到散戏也没见满司令的影子。原来满泰怕扰乱了戏场的秩序，早已混到人群中看戏去了。戏散后，他们一行随着人流到了庄稼地，视察苗情去了。当离开这里时，才派了一名勤务兵给乡公所送了一张纸条：“酒菜谢绝，请你们送给戏班吧！他们比我们辛苦。”我常听戏剧界的前辈讲述此事。

今日，我撰写此文，一来追忆满泰将军，二来想启迪后代，让后代在满子舒的生平中学到点有益的东西，为振兴中华而起步。

艺苑谱上的蒙族戏班简述

光绪末年，晋剧在土默川上非常盛兴，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剧种之一。蒙族戏剧演员，最早出现在土默特旗，这是源头，而后盛名绥包。

李月庆（乳名壮壮）是土左旗铁帽乡人，蒙族，自幼爱好戏剧。他初学大秧歌，后来改成晋剧，经过刻苦磨练、虚心好学，戏剧程式通达，加之嗓音清脆，先专工旦角，后改老旦，他演的《火焰驹》中李彦贵之母，至今还在老年人中流传，被称为一“绝”。

李月庆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民国初在原籍创办起“壮壮娃娃”班，收学生十六名。第一批很有名气的演员有：云龙黑（阎云龙）、蝉蝉生（李有德，蒙族）阎四圪旦、如意老旦、韩有福等。到了民国二十年以后，班子壮大，扬名于绥包一带，发展到了四十多名演职人

员，行当俱全，真乃人强马壮，各民族演员团聚一起，亲如手足，在戏剧史上也谱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人们经常说“蝉蝉生等一等，老人看了也精神……”当时在前包一带还流传着：“蒙古演员好本领，千人万人都赞成！……”等民谣。

他们的班纪严明，立有条律，演员不得违反。一不准偷，二不准调戏学女，三不准误场，四不准怠工……同行们称为八大条款的班子。他们以《访白袍》、《九件衣》、《明公断》、《鸡架山》、《宗保国》、《火焰驹》等六十多出剧目而驰名。

解放初期，这些演员被分配到内蒙各地剧团工作。也有到了张家口一带的，象李有德在河北张专一带也很有威望，佳话常传；有的成了剧团的党支部书记，当了团长，如巴盟晋剧团的韩有福同志（现已退休），为河套的戏剧事业贡献出一生；有的演员民族气节高尚，在日伪时期，不给登台演戏，宁愿一死为人请命，人们称为“忠烈演员”，这就是著名的净角云龙黑，他因受伪警察的毒打，跳火车一死，青史流名。

到现在受“壮壮娃娃班”的影响，土左旗差不多的乡村都有专业或业余戏剧工作者，这些人不下千名，在艺苑谱上写下了壮观的一页。我写此稿，是为了启迪后代、纪念前辈（壮壮老前辈，曾在卓资县剧团给予我鼓励和培养，今借此良机，撰写粗文略表寸心），并为发展祖国建设事业、创建两个文明而贡献力量。

（下转241页）

土默川烟毒史话

张 尔 杰

一、前言

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戊戌变法之后，古老的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摆脱瓜分的灾难，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又相继掀起了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才获得了全民族的解放。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标志之一的烟毒，也随之而被肃清。如果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一九五〇年即把鸦片禁绝来计算，整整奋斗了一百一十年才把帝国主义用鸦片毒害中国人、而又给中国扣了“东亚病夫”的那顶帽子摘掉！

包括七县二市在内的土默川地区，是鸦片危害的重灾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前，“绥远全省烟土年产量大约四百八十余万两，消耗资金约为一千四百四十余万元，男女烟民竟达七十万人左右，占全省人口的五分之二。”（《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9辑201页）

经过日伪政府的八年蹂躏，迄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全省烟民猛增为一百余万人，已超过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因此，为教育后人，经查核史籍，结合“三亲”，写出这篇《土默川烟毒史话》。奈因水平太低，力不从心，权当抛砖引玉，请予补正吧！至于年轻的朋友们看过后，如果还愿深知其详的话，请就近问一问上一辈老人们，——假如他们还健在的话。

二、传播

鸦片属罂粟科植物，学名罂粟，又叫阿芙蓉，原产欧洲，舶来中国，故称“洋烟”或大烟土”。因它含有多种生物碱，除咖啡外还有可拜因等，所以在医学上能起镇静止痛作用，可以治疗某些疾病。但久吸即可成瘾，为害无穷！

鸦片，清初被列入药物商品允许进口，对于贩卖者征收一定的税额，可以公开销售，但有限度。在一七六七年以前，每年进口不超过二百箱，嗣后，由于它不再被人们当作药物，而是作为一种吸食的嗜好来享用，所以逐年增加。延及一八三八年，私运量已达三万九千箱，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引用英人马尔丁的话：“鸦片贩卖者却腐化了、降低了、和毁灭了不幸福人的精神生活，而且还毒杀了他们的身体，鸦片贩卖者时时刻刻向贪欲无厌的吃人神供献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服毒自杀的华人，就彼此竞争，向吃人神的祭台上贡

献牺牲品”。因此，使有识之士的中国人如林则徐，也出于维护封建皇权的目的，惊呼“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年之后，非但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练之兵”（见林则徐上道光奏折）。

据老一辈人说，洋烟传到土默川是在道光年间（1821至1850年），因从广州而来，俗称“广土”，《二人台》剧目中的《种洋烟》，开头一句就唱“道光爷登基十三年，外国人传进中国留下个种洋烟”这一句可资佐证。起初每两价值白银三两，鸦片战争期间，由于来源暂时不畅，每两须银六两左右，故除王公贵族、官吏、巨商中的少数人而外，一般人不敢问津。一九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在“洋务派”所谓“师夷之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导下，引进洋烟种籽自己种植，妄图抵制“外夷”进口烟土，致使烟毒扩散，传播全国，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财主，以及优伶、妇女、僧尼、道士多在吸食。他们日以继夜，吞云吐雾，尸居余是，衣履不整，迄一八五六年，在归化城郊区，就有人利用黑河水灌溉种植，一八七四年已扩散到各乡镇。在察素齐始作俑者为李庆旦、渠生贵、李大德胜、李二德胜、卢成福等人。当时的归化城市面，早已是车马辐辏，“小部梨园同上国”的繁华景象，所以赌场林立，妓女充斥，吸毒者与日俱增。到光绪年间（1875至1908年），洋烟馆已遍设街头巷尾，烟馆门前挑一园形篱笆幌子，上贴“清水净烟”四字，室内准备整套烟具，专供烟客使用。夜幕降临后，挂出红绿灯笼，招徕一些蓬

头垢面的流浪“烟鬼”过瘾，俗称他们为“洋罨”。由于鸦片价值昂贵，烟馆经营者把烟膏挑成片烟、棍烟或圪塔烟，用苇腔里的苇皮或蜡纸包裹，零星出售，且多以面筋、羊蹄、猪皮等熬成膏子，掺假营利，但“洋罨”们是能够品尝出来的，苦于瘾得着急，明知吃亏，也不能不买。

辛亥革命，变成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忽禁忽弛，等于弛而不禁，尤且各省军阀都封建割据，政令自专，形成彼禁此放的局面，所以洋烟的种植、传播与吸食男女越来越多，唯因当时社会习尚勤俭，人心古朴，一些吸毒的官吏、绅商、财主，虽然不似“洋罨”那样窘迫，也被人们瞧他不起，鄙视为品格不端的人。以“儒将”自居的马福祥于民国十年当上绥远都统，约在民国十三、四年之交，奉命成立了所谓“绥远禁烟善后局”，他采取“罚款”手段，以善禁烟之后，不啻允许农民公开广种洋烟，借以聚敛发财，致使土默川地区的山、川、沟、洼之地的农民都竞相种植，吸毒的人也成倍增长。次年，烟价由每两七元下降为一元五、六角，烟毒笼罩土默川大地，不仅洋烟馆较前更多，烟土店也广布市衢，到民国二十四年，连察素齐、毕克齐、善岱镇也设立起专门收购烟土的机构。民国二十六年，日寇占领土默川后，实行毒化政策，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伪“蒙疆”政府颁发文告，诱导乡民大种洋烟，并分设“土业组合”，控制洋烟收购，开始用鸦片制造海洛英的半成品料面，进一步毒害蒙汉群众，使染有嗜好的男

女老少超过一百万人，光伪厚和市（日伪把归绥市改称厚和，即现呼市）一城的洋烟馆子就有百十来家。包头城里的“财神庙、丁香巷、平康里、东门、南门、圪料街、中市街、车市街共有烟馆三十一家之多”（见《东河文史》第二辑）。在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日寇强迫呼市并入伪“权运署”的烟土店为七十一家，从业人员数计一千四百余人。从此以后，洋烟不单是为了吸食和出售营利，也变成了代用货币，城市中的商号往来，农村中的买房置地，娶媳聘女，都要以大烟板子作价，甚至一些机关转帐，税务收支，以及行贿送礼走后门，也多是“大烟板子”。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至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胜利这一阶段，国民党政权已经腐烂透顶，虽然也大喊大叫禁烟禁毒，但鸦片的危害，烟毒的肆虐，在土默川依然如故！

三、种 植

鸦片是特种作物，土、肥、水的要求相当讲究，每年要比其他作物付出更多的辛勤劳动，才能获得丰收，沙地与硬红泥地不行，必须选择土质松紧适度的上水黑土地最为适宜，没有水源的地要打撑杆井汲水溉灌。后来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改进，在下湿的旱地里播种，只要天雨均匀也能丰收。其中以上水的山地产烟质量最佳，所谓是“口头有口头，香头有香头，劲头有劲头”的色、香、味俱全的上等货，因此，山地烟名冠“土业

界”。

它的种植方法是在今秋把明春播种的洋烟地翻耕、碾压以后，灌一遍水，次年开春施家畜肥耙磨平整，约于清明节前后趁冻皮子地，以每亩五、六合的烟籽播种，约七、八日出土全苗，长到分开十字时，用小薹锄除草间苗，每隔一至三寸留一苗，然后浇水追肥一次，再候长到二到三寸高时，仍用小薹锄除草定苗，每隔八寸到一尺留一株，再浇灌一次，倘有缺苗断株就便移植补齐。如果水利条件充足，隔些日仍可再浇一次，就完成了种植工序。至于旱地种洋烟，虽然只能依靠天雨，但耕耙碾磨、除草间苗等一系列营生，更须精耕细作，甚至要争取多薹一遍，据说是薹锄子上自带三分雨水呢！

鸦片还是一个大家族，它同宗而分支的种类很多。按成熟时间长短，可分为小花烟、二白花、大花烟、稍美皮（因叶片似饭馆里卖的稍美）；按花色品种，可分为猪血红、火焰红、红衣套孝衫，九莲灯；按烟蛋形状，可分为孤锤烟、支口烟（一株分支两枝以上）。如果土、肥、水都能跟上的洋烟，可以长到三、四尺高，而且非常齐楚。小花烟日期短，从下种到成熟约六十天，都结孤锤，大花烟日期长，约八十天成熟，都有支株，每株结一烟蛋。它是随着绿叶的长全，在顶头上生出颈干，干头含苞，俗称“花圪堵”，有些“洋罈”等不及开花结蛋，就先割苞取奶吸食，叫作“骗蛋苞子”，这是要影响将来产量的。如果割的刀深，伤及花

蕊，便使产量锐减，所以一般人都不愿“骗蛋苞子”，专等苞绽开花，海海漫漫的土默川一望无际，成了花的海洋，花的世界，花香扑鼻，花气芬芳，十分迷人，可惜它却是花好汁毒，有胜于洪水猛兽的危害！花期三日，落英缤纷，剩下的果实，俗称“洋烟蛋蛋”，再长几天后，蛋蛋颜色呈灰色，就可正式开刀收浆了。日本占领时期，流传着“黑城、甲赖、点勒索，除过洋烟没庄户”的顺口溜，其实呢，整个土默川地区都是这种情形。

四、收 浆

收割洋烟的工具共三种，一是割刀，二是奶桶子，三是烟铲子。割刀又有单刃及双刃的，单刃成鱼弯形，双刃成马蹄形，都是青铜或熟铁质，双刃刀为同一大小的两片，在中间垫纸约二毫米厚，外以棉线缠绕紧固，以便右手食指捏用；奶桶子以铜皮或白铁皮为尚（黑铁皮易为奶浆腐蚀，故不喜用），桶呈长圆柱形，高约四寸半（市尺），粗约一寸半，桶外焊一小环，以供左手中指套戴，桶口开一约二分深的半圆豁，以备右手食指往桶里刮浆，桶可盛浆约一两上下；烟铲大小不拘，专供抠干痂使用。

收割奶浆是很细致而技术性特强的营生，都以两人为一对，按烟垄进行，前一人用左手食指上下捏住烟蛋，右手食指捏刀从右向左绕蛋捏刀而割，轻拿轻

放。技术高超的割烟能手，刀过处，白色烟浆从刀缝中濡濡钻出，奶珠大小均匀，逐渐汇成一条粗线，后一人左手中指戴着奶桶子，也以食拇指上下轻捏烟蛋，右手食指从右向左沾抿奶线，顺手刮进奶桶子里，如此操作，一颗一颗的每天收割一次。但刀子过轻时奶浆不出，刀子过重的割透蛋壳，不仅无浆，还会伤坏烟苗。而沾抿奶浆的人如果手轻了沾不起，手重了糊了蛋面，并须将奶桶子经常保持平稳，否则刮入奶桶子里奶浆，就象点坏了一锅豆腐，变成清汤淡水的东西，都会影响产量的。因此，二人必须技术娴熟，配合默契，割者游刃有余，抿者信手沾来，才能点滴不丢。

财主大户种的鸦片多，需要雇工收割，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傅作义先生主政绥远时，土默川大种洋烟，日工工资由二角递增至五角（票价与现洋一兑一），还雇不到人，每人日给熟吃烟一钱，翌晨在太阳没有出来以前，集体去昨日收浆的烟地里，利用潮气，按垄用烟铲再抠从刀缝中渗出的干痂，谁抠归谁，所以连家里的闺女媳妇们，也抢着去抠干痂，俗称“拾毛”，作为自己的私人储备，叫“攒体体”，一俟旭日初升，都回家吃饭、磨刀后，再开始进地收割奶浆。

土、肥、水不缺的上好洋烟，每亩可收烟奶八十来两，旱地烟产量不高，每亩能出五、六十两，前三刀割下的奶子叫“顶花奶子”，每一百两可晒硬生烟八十两，有的洋烟一株可割十二、三刀子，有的仅能割七、八刀子，但在最后几刀子因只能割出些淡白水，所以不

能褪浆而放浆，专等翌晨抠干痂，这却要上交柜上的。在收割过程中“怕风、嫌雨忌阴天”，因风大摇奶、下雨洗浆、阴天少奶的缘故，所以种烟人总是盼望天时配合得好。

奶子初呈乳状，经过太阳曝晒，逐渐变为黑色固体，叫“硬生烟”，每两最多可熬出熟膏子烟八钱，这才是当年人们抽的所谓“洋烟”。熬的时候要选择甜水（带碱性水不行），把生洋烟和水放在铜器（铁器不行）里煮沸许时，将烟水倾倒在洋烟淋子上，一般用箬篱，上铺黄表纸两层，纸上放一层净白布，把箬篱架在另一器皿上，使烟水慢慢淋下，烟渣隔在布上，然后再把烟渣如法煮沸过滤一次，叫作“二淋”于是合头二淋烟水统归到铜器里慢火煎熬，使之熬成稀稠适度的膏子，叫“清水净烟”。

奶浆曝晒为生洋烟，在土默川当时还没有大搪瓷盘上市，都买土产白麻纸用桐油刷过二三遍的油纸，把奶子倒在上面利用阳光处理，并由专人负责搅拌，往往一日可成，然后合折成包。日伪时期，他的“土业组合”索性用锅煨火炒干，成为“大烟板子”此种处理办法随即推广民间，但为一般小户产量所不屑用。

至于烟蛋将烟出尽后，即把枯干拨倒晒干，破壳取籽，每斗烟籽约二十四、五斤，约可出油八斤（旧十六两秤），如向油房换油，能换洋烟籽油五至六斤。到此，结束了一年的鸦片种植。

五、烟市

“穷半年，富半年，单等五月割洋烟，割完洋烟收麦子，抽抽洋烟吃吃面”。然而，所谓“富半年”云者，仅仅是“烟鬼”们妄自菲薄的自慰说法而已。实际是除了财主、绅商、官吏而外，他们顶多能红火四、五个月。不过从洋烟开刀到割不出奶子这一被叫着“烟市”的期间，不仅都是吃饱、喝足有烟抽的人，而且市场繁荣，景象万千，举凡踢拳卖艺的，吹弹歌唱的，叫卖糕点杂货的，以及三教九流之徒，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轮番出现在烟地畔头或住宅大院，各献所长，赚取洋烟，叫作“赶烟市”。由于小班儿（二人台）是下里巴人，最为群众所欢迎，琴声、歌声伴随着后生们的叫好声，鼓舞着收浆人们的干劲，加快了劳动进度，唱一出《听房》、《吃醋》或《扇子计》，能挣两数八钱奶子。会唱山西梆子（晋剧）的人也凑合起来，组成临时的戏班子到较大的乡镇去义演，他们也是“赶烟市”放官赌打闹洋烟的，因此村村热闹，户户红火，连吝啬的人家也尽量改善生活，几乎都忘记了还有明天，所以倒楣者也大有人在。一些从口里出来“赶烟市”的人，或本地的个别“马大哈”，贩上麻花、焙子和衣料，转弯着烟地去推销，都出售得很快，但因不认识奶子的真假，常被嚼碎了的干货所欺骗，以致一气之下，就有自

杀的，连老本也搭进了烟市！

察素齐潘秀仁的父亲老潘三，“子贵父尊”，成为在察素齐他说了算的人，民国二十四年烟市时，毕克齐人贵宝子拜老潘三为义父，他凑合了一伙“破鼓、塌板、烂铜器，一踢飞脚露鸡鸡”的戏班子在察素齐义演，由于服装、演技、乐器伴奏都不行，连跑龙套的也尽是一些豁牙露齿五六十岁的“洋罽”老汉，所以群众就愤怒地说：“宁看死人咽气，不看贵宝子的烂戏”，有人就向老潘三反映了，他回答道：“唱得不好？罚他再唱三天！”不意三天过后，老潘三主动征求观众意见：“这三天唱得怎样？”别人只好说“这三天还可以！”他便指示道：“能改就好，留他再唱三天！”——成为一时笑话，流传至今。

可见，所谓烟市，既是“骗市”，又是地头蛇施展绅权的“闹市”，反正奶浆里能掺假，说哄了谁也算。大致是百两掺十两假的。叫一九货，百两掺二十两假的叫二八货，这种生烟每两当然熬不出八钱膏子，且对于有经验的行家里手却是瞒哄不了的。

烟市期间，私人烟贩，也纷纷出现在各村，落脚于村中大户，以一两二钱折一两，坐地收购，钱货兑现。

六、 罚款”

自民国六年（1917年）春，在土默川广种洋烟，迄一九四九年的三十二年中，除日本强盗占领的八年里是

“敢作敢当”，公开诱导农民大种洋烟抽税而外，所有其他统治绥远的主宰者，都还没有这种胆量，都是利用“寓禁于征”的手段，名禁实不禁地聚敛烟税的，虚幌这一枪为的是自圆其说：“我定的法令不准种洋烟，但你不听话，不守法，你种我就惩，谓之‘烟亩罚款’。好似名称一改，就“德政惠民”，并非种掩耳盗铃了！”

“烟亩罚款”的进程序是：每年夏季在鸦片含苞待放或烟花将开时，省政府指派禁烟委员分别到各旗县，在旗县官吏陪同下进行检查摸底工作，决定“罚款”总数，然后由旗县一级组成丈烟委员会，各委员分组分片下组后，会同区、乡长和区乡兵丁，随带丈地绳尺，深入各村，由保甲长指引到每块地丈量烟苗亩数。此时，短日期的小花烟已经开刀，由于这是一项能捞外快的肥差事，贪官污吏和地方上的没落文人，都愿钻营效劳地去当一任委员，但甫经卸职，即被人们鄙视为损过阴、却过德的滑吏，多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不想和他深交了。

全部丈烟人员，由委员、区长、乡长、县保安队、区乡兵丁共三十来人组成，浩浩荡荡逐村逐地丈量，一村之内的大户人家吃住方便，成为丈烟人员的临时招待所，杀猪宰羊，杯盘狼籍，奉若神明。一些烟农为了讨好委员人等，袖送几两新收烟膏，婉转陈说，请求品尝“吃烟”，希望手下留情。待他们酒足饭饱，喝足，烟瘾过罢后，即在保长响导下由近及远，逐块拉绳丈量，对

于他们认为不满意的烟农，利用拉绳松紧，八分可丈成一亩，反之一亩可丈成八分。清丈结束时，如果又能以洋烟贿通有关人员说情，还可以将一亩折成八、九分，然后共同合议烟亩等级评定，根据长势好坏，烟苗齐缺，土地肥瘠，水地旱地等差别，评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烟每亩“罚款”约六元（票值与现洋一兑一），中等烟每亩约罚五元，下等烟每亩约罚二元，且可压等降级，如一等算成二等，然后按价折交洋烟。顶花奶子每亩约值一元二、三角，即由区乡跟人催收（旗为苏木派人催收），统一上交旗，县政府汇转省级机关。唯此项“罚款”只限于种植者，所以吸食、携带、出售、贩运都属违禁，倘被告发查获，烟土没收，人要治罪——因为我的禁烟法令是尊严的（详见后文十一）。但对于放火的州官并不发生约束力，特别是握有制定法律权力的人，更是驾凌于法律之上的。

七、黑市

在旧社会，有了禁令就必然导致黑市。洋烟自晚清未叶流入土默川，一直以半公开的黑市在种植、吸食和贸易，除日伪时期，无不如此。光绪年间，大同府韩姓首先来归化城，在西河沿（扎达海河沿）开设西玉成烟馆，人称西柜，后又在臆膊湾开设西玉成，叫作东柜，东柜营业尤为发达。光绪末年，韩家为富不仁，已操纵了归化城的大烟市场，除将西玉成都扩展为烟土店外，

又以韩立厚名义，在归化城先后开设了西成店与双盛西货庄、增盛昌皮庄，在包头开设了义隆昌粮店，在萨拉齐开设了德和玉钱庄。民国元年，座落在旧城宁武巷的增盛昌皮庄，因库存洋烟失密，被地方民团勾结绿林好汉，一次就抢走二千多两。民国五年，绥远都统衙门的职能机关，查获西玉成烟土五千余两悉数没收，并遭到法办。此时，土默川洋烟出现过每两十元至十六元的高峰，而新疆、甘肃、宁夏各省所产的烟土，由驼户与皮毛商夹带在绒毛或干果里秘密运来，委托包头、归化城的较大皮毛店如集生祥、谦和昌等商号黑市代销，一些贪财不顾生的亡命之徒，也自备武器，骑着骡马，携带洋烟，轻装出动，白天隐藏，夜晚疾驰，绕道旷野深山之路，私运到归化城、包头出售。民国六年，烟土在归化城黑市猖獗，流毒泛滥。如家住小北街的范某（轶名），以摆设小摊为业，他从某绒毛店购进几篓杏干准备零售，不期篓内夹有不少大烟，“人不得外财不富”，之后便被人尊称为“杏干老财”；新城的叫卖商小蛤蟆，他也从干杂货篓子里得到很多鸦片，发家致富；还有一些较大的“土客”（大量贩毒者），买通沿途恶霸、地痞、土匪人等，一路分段护送到归、包城内者。特别是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其人，他从民国四年被袁世凯调进绥远镇压卢占魁的“独立队”，后来升任绥远都统，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夏离职这段时间里，因他所带的五、六千“西军”骑兵，除副食外没有薪饷规定，庞大的军粮供应和军费开支，都由地方负担，还

公开让部下护送甘宁“土客”，把洋烟运进归化城再转送平津出售，借以牟取暴利，当然是他自己也在贩卖或向部下分肥，不过既以“儒将”自居，也顾虑名声不好，就用“寓禁于征”的手段欺人自欺，故在南茶坊先设立了“稽核所”，凡是西来骆驼一律检查，每两烟土上税二角，各县都设分卡，给检查人员广开贪污受贿之门，洋烟成了“违禁公罚”的商品和可公可私的贸易。因此，在民国十年，归化城的福义泉洋烟馆扩展为烟土店，迨后又有天生泉、复和泉等土店开张，街头巷尾的洋烟馆子多达三十余家，但因它是不正当商业，归绥商会拒不接纳，后来便自行组成“土业公会”，由贺秉温担任理事长。

民国十四年初，绥远“禁烟善后局”奉令成立，以检验贴印花为征税标记，凡不经登记未贴印花者为私货，一经查获，概予没收，并按数量多寡酌课罚金，迄民国十八年，土默川大旱，卖妻鬻子，饿殍载道，但烟土行业却更发达，光在归绥城新开张的土店就有茂盛隆、和盛祥、兴泰厚、源记、福义泉、晋华玉等十余家，稽税机关又改称“稽查处”，康庚任总办。

就在半公开黑市盛行的时候，继之而起的是公开的“官市”，民国二十一年，晋绥绥靖主任阎锡山，在归绥开设了垦业商行，专作鸦片生意，派李秉懿、陈伦五为正副经理，用太原铁工厂生产的晋造枪炮，与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换洋烟，同时又在托县城里开设了晋益祥，任杜家昌、翟耀庭为正副经理，垄断绥南各

县烟土。民国二十四年，阎氏又在归绥增设业记公司，仍以经营毒品为业，由郝荣甫、赵子静任正副经理。并任李居义为绥远“禁烟稽查处”总办，张钦、李惠卿为会办，省主席傅作义，在黑沙兔及百灵庙设卡征收西土（新、甘、宁几省所产烟土）过境税，凡登记者即由保商团护送到归绥，经过贴花完税手续，方准向各土店分配，以供零整批发，如若继续东运，仍由“稽查处”负责护送。此时，以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为首的蒙政会，对这项高额税收，更是馋涎欲滴，一再向傅交涉，未能染指少许。是年夏季，德中和土店经理贺秉温竞选为归绥商会会长，烟土业随之盛极一时，也给他以后充当伪“厚和市”市长，创造了条件。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绥远“禁烟稽查处”改名“禁烟督察处”，进一步实行“禁烟”。由薪祥垣任总办。据统计，自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夏，绥远省所收的洋烟，以百分之八十的抽头，上交山西省的烟土总数共是五百七十余万两，其余的百分之二十，留作绥远省政府使用，但都是既想财发万金，又觉伤天害理，缺乏日本强盗的那种“勇气”，所以总要冠以“禁烟”二字，在“禁烟”幌子下做文章，让人播种、吸食、贩运、抽税，妄图欺世盗名。故自马福祥而下，“稽核”也，“善后”也，“罚款”也“稽查处”而又变成“督察处”也，万变不离其宗，只要能发财就行。所以“黑市”与“官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勾结，又竞争，盘根错节，相辅相成，越禁越放，越放越把“黑

市”公开化了！

八、走私

日寇占领时期，利用土默川已有种洋烟的恶习，进一步张贴文告，诱导农民大种鸦片，成立“清查权运署”，专司烟政工作，此外，任何人不得私自贩运或进行倒卖活动。

由于日本侵略者对鸦片的严格控制和垄断掠夺，在土默川出现了离奇古怪的走私活动，其人员及方法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种：

（一）以贩毒为职业的“土客”。这类人资财雄厚，派头阔绰，是以巨商大贾的姿态出现在交游场所的。他们既能敲开伪警察署、宪兵队、伪军政长官的大门，也会广交伪警、特务及三教九流之徒，可谓神通广大，渠道纵横，运用自如。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先从农村廉价收购洋烟，集中到包头、萨拉齐和厚和（现呼市），甚至制成料面坯子（海洛类半成品），再以重金买通铁路职工，如列车、检车、机务、警务各段的乘务员，还有列车长、车电员、司机、司炉、乘警等人，将毒品携带到指定地点交专人交接。此外，还收买餐车上的服务员，因餐车里可以隐藏的地方多，而且运量大，装取便利，存放安全，所以“土客”多力争结交该车服务人员为其转运走私。假如一旦被某机关或有权势的人把货扣留，“土客”即根据对方的地位、权力和所好，

因人、因时、因地的经过具体分析，开展金钱及人际关系的攻势，求得释人归货的结果，待事情平息后，倘认为对方在今后仍可作为自己走私运毒的支柱时，则趁机拉拢结盟换帖，或认作干亲，筑好将来的铺桥修路工作。所以他们就总结出—条“不怕扣货留人，就怕四辈不闻”（指酒、色、财、情）的经验。因此，在土默川出现了不少暴发户，人称“烟土大王”。如萨县的吕文、李二子、南海家、耳计子、张在等人，托县的祁泽弟、兰义、康子明、李桂芝等人，归绥的四狗毛，都以倒弄大烟起家，成为一时富豪，名震遐迩。

（二）缸门队与“水门队”。这些人是游手好闲兼有嗜好的男女“洋罨”，迫于烟瘾难熬，受人勾引雇用的，其组织者叫队长，队员没有定额编制，男的用缸门、女的用生殖器官藏纳毒品，进行运输，此种走私活动，在土默川曾经盛行一时。其填入方法叫“上货”，“上货”前先将腹内积物排净，“上货”后从包头到北平（北京）不饮不食，特别饥饿难忍时，聊以所带熟鸡蛋少吃一颗充腹。男人“上货”时，先用热水毛巾将缸门反复敷润，然后把预备好的棒状毒品蘸油填入，每人可填二至三棒，每棒重约二至四两（用称中药的戥子称）。妇女“上货”时，不烦热敷蘸油手续，但只能填入长短适度的一棒，每棒重约四两多。棒是先把硬生烟搓成稍短而粗的长圆柱形，用桐油浸过的白麻纸包裹后，从棒头两端各套上一个避孕套压复封闭，以白线缠绕加强其挺直力，再从两端各套上一个避孕套压复封

闭，如果毒品系料面坯子，把料面包裹好也是这般操作方法。到达北平后，按队长指示的旅馆，进厕所里便出或掏出，叫“下货”。即刻钱货兑现！但“下货”以后，缸门与“水门”久久空痛，尤且连日饥渴困顿，胜似大病一场！

可怜这些男女“洋罈”队员，尽管“上货”方法慎重小心，“上货”后受苦受难，但在火车上也有被察觉，箍到车厕里勒令屙尿出来的，本人会叫日寇的宪兵队抓去灌煤油辣椒水，甚至打残致死！特别是由于在火车上长途摇摆、颠簸、拥挤，使生理现象失常，收缩机能不灵，有的人就自然脱出，被日寇缉捕而去，也有的人因避孕套破裂，毒泄致死者，此种惨状，以张家口至康庄间最为常见。“人命如麻”，古今恨事，“洋罈”性命贱如毛！

（三）其它方法走私者。这些人是由于民国十八年在土默川遭特大灾荒，卖儿卖女时，从口里出来娶上老婆，返回山西、河北、山东原籍过日子，灾年过后，他们出来认亲罢，回老家时就捎带几两大烟的，有人就以岳父家为落脚点收购洋烟的，也有些大哥哥或小舅子跟上姐夫或妹夫到口里探望姐妹，顺便暗带些鸦片的，有的甚至把新棉花用洋烟水煮透，晒干后絮进袄裤里，穿回口里再煮出来熬成膏子；或将鞋底、厚部洋装书、木头扁担掏空，以及把棺材两层制作等等，都是内藏洋烟，外表吻合粘补，与原样酷肖，进行走私活动的。一般的说，由农村把毒品带到包、萨、归城内

交货的，谓之“短盘”，坐火车运到平津交货的，称作“长途”，所得运费自然大有区别，反正贪财忘命，各出心裁，万一失败，人财两空！

（四）伪军走私情况。李守信的伪“蒙古军”，王英的伪“绥西联军”，白凤翔的伪“东亚同盟军”，其本人及所属官员，都是种植、吸食贩毒走私的凶黠能手，在为虎作伥的同时，都利用职权倒弄大烟。王英在一九四一年，把驻地中滩聚敛的洋烟装运包头再转运天津，被守门的日军卡住，经副官交涉挨了训斥，王英见烟土马上将被夺走，便跳出汽车高声叫嚷：“我当汉奸就是为了倒贩洋烟，不叫倒贩我就不当了！这是儿玉顾问（伪绥西联军顾问）特许的！”驻包日军可能是考虑到再培养王英这样的走狗也不容易，所以用电话通知放行了，王英没有白撒赖。另据《李守信自述》说：“我的师团连长们在火车上运毒，都是手拿着护照（出差证明），一手持着叫起机头的手枪，铁路警察不敢盘查，日本宪兵也在火车上碰见他们不敢得罪，……至于我的经济来源，是依靠从绥远往平津走私烟土，……在平津两地大搞黄金交易，……我初来绥远时贩运烟土，是和绥远的（烟）土商贺秉温和东北的大土商张玉轩搭股的”（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九辑）。“归绥在一九三七年冬，因打仗和军远，集存有好几十万两烟土无法运往平津，烟行面临着倒闭的危机，于是贺秉温抚贺玉章向李守信求情，想望李跟金井章二（伪蒙疆政府的最高顾问）疏通一下，李就慨然允诺，金井章二也给了

李一个很大的面子，准许土行挂专车向平津发货”（见《土默特文史资料》第一辑）。可见这些伪军改头目的走私贩毒能量何等惊人！

九、烟 具

大烟是区别于旱烟、水烟的，“抽大烟”须有一套烟具，根据吸食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大致可分为上、中、下三等，大官、名绅、巨商的烟具十分豪华，有只能燃植物油的景泰兰十件闷灯一套（包括玻璃灯罩），长三十至四十公分的玉制或檀香木、乌木制烟枪一支；细泥精烧而成六方或八方形的烟斗一个（在方面开一小孔按烟泡），它烧有与烟枪一端相吻合的圆口使能连接吸用；长约十五、六公分，细约二毫米呈锥形的铁制烟杆二支（烧烟泡用）；铜质镊子一把（镊灯花用）；长约十公分，状似挖耳勺的铁制挖子一柄（挖烟斗内烟灰渣用）；银或铜质小盅一个（盛挖出来的烟灰渣用）；硬木或铜质小锤一件（在盅内煞烟灰渣为细沫用）；玉或铜片带柄裹烟板一片（代替手指捏烟泡用）；玉制或细陶瓷储清水净烟膏子钵一个（备烧烟泡时用烟杆从中挑出）；小毛刷一把（打扫灯盘子用）；玉质、檀香木制成或搪瓷与铜制烟盘一个（内放上述所有各件）；烟盘外边放一小饮壶（似今之小醋壶），以备随时饮用，还有各种高级纸烟等——俗话说“闺女打烟，媳妇问讯，地下跑跬的是二不流子后生”，只有这一类

上等吸毒者才有资格。其次，土豪劣绅，财主恶霸，小官毛吏和中产人家的烟具也相当讲究，不过较之上述远逊多矣，虽然也用十件闷灯，不一定是景泰兰的，烟枪也只是黑圪林桶孔或竹管子，长不过三十公分，有的喜在烟枪的接咀一端镶个玉咀子，且为了尽量挖尽烟灰渣能多抽几茬，就不使烟斗而用猴儿头（陶瓷制品，形如核桃大），不备裹烟板、小毛刷和储烟缸，只有铁烟杆、铁挖子、铜或瓷烟盅，小煞灰锤及小铜盒子（储备烟膏用）各一，也都放在烟盘子里即可足用，而烟盘子多属铜盘，也有没盘子的，旱烟袋或羊腿棒水烟袋常备，也有备纸烟的，小饮水壶有备有不备的，俗话说“肉面不缺少，洋烟水早操”的吸毒者，大多是这样派头的人。再次为三等吸食者，其烟灯仅用一能点植物油的瓷灯盏，套上自制的白纸灯罩子，放在炕上，俗称“灯瓜瓜”，烟枪只能用臭黄蘗或牛角煮软矫正，然后削制为枪使用，除了必要的简陋抽烟工具外，别无其它，“爬山调调”里唱的那句“灯瓜瓜点灯半炕炕明，洋烟抽得哥哥翻不动身”，指的就是此类吸毒的“洋罈”。然而还有等外“烟鬼”呢，他们就连“灯瓜瓜”这种烟具也自备不起了，都是抽了上顿没下顿，急打急闹地弄上一片或一棍洋烟，跑到“洋罈”烟友家里站在地下说好话，蜷卧在人家炕上借光“灯瓜瓜”过一下瘾，闹不下片烟时就转到二等吸毒者家里，讨要乏烟灰喝上顶瘾，虽然已经狼狈到如此程度，可也总要“单等五月割洋烟”呢！不过天道无常，富贵难久，由于越抽

越穷的缘故，上、中、下的三等吸毒者经常自动降级，致使等外“烟鬼”群日益扩大，所以世代居住在土默川的人家，差不多有半数以上的家庭，都有好坏不等的烟具。

听老一辈人传说，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在殖民地印度推广罂粟种植，把印度人害了个草死苗荒，他们却发了大财。不过印度的吸毒者是把“生烟土”放在火盒里煨烧，众人围坐在火盒外边各用较长的竹管同时吸食过瘾的，传进中国时，起初也抽生洋烟，嗣因满清王公贵族嗜吸，嫌生烟味道不正，佣人为了巴结他们，就出现了前文所说的过滤熟烟膏子，亦即“清水净烟”，同时为了讲究排场，经过不断改进，形成了一全套高级烟具，并感染了一些大臣、缙绅、巨商们争相效尤，便把等而下之的烟具及熟膏烟流传民间，随之而来的又出现了烟具专业地，如在土默川流行的“汉口的烟灯，广东的罩，潞安府的烟枪实在好，大同的镊子响铮铮，宁武的猴头质量高”的串话，即可说明这事。

十、危害

如果把大烟灯比拟为招魂幡的话，就可以承认“掀起招魂幡，便有牛鬼神”这句话是富有哲理的。有一、二、三、四不等的男女人，都蜷曲着身子躺在炕上，围守着孤灯一盏，依次妄称“一人仙”，“二合公”，“锅架子”，“四合院”。“烟鬼”们过罢烟瘾，谈兴

陡浓，你说上下古今，他谈五关六将，我讲成败利钝，各述抱负，妙计千条，抽几口旱烟，饮一饮壶水，吃点干粮，挠挠痒痒，再挖猴头、煞烟灰、烧烟泡、上烟枪地交替吸食，不知白天黑夜地先后离去。一觉醒来，日过中午、张口流泪，四肢无力，燃灯再抽，形同僵尸，烟友又来，谈兴又浓，阔论风生。所以在土默川广泛流传着如下一个故事：某翁有两个儿子，当人们问他的儿子在干什么工作时，此翁喟叹道：“一个埋啦还没死，一个死啦还没埋”！——原来长子是下窑掏煤的，因旧社会的窑主对矿工的安全不重视，坑道坍塌丧命的事情常有；次子是吸毒瘾沉，已变成了活死人，什么也不干，只欠埋葬云。

人们惯用“蓬头垢面，衣履不整”来概括鸦片嗜好者的形象，在默川流传着一些“串话”和“歇后语”，把他们的外貌形容得最为生动逼真了，例如：“好睡个宽处好吃个腿，好吃些干的好喝点水”，“瘾来躺在炕上，瘾过炕上躺着”，“发家致富妙计高，一觉醒来全忘了”，“面黄肌松黑嘴唇瘦，颈细腰弯小屁股”，“说话没声气，走路没力气，吃饭没劲气（谐尽器，即吃不进一碗饭），劳动没了气”——如果把这些话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就画成了“烟鬼”们的“玉照”了！至于精神境界和志趣情操，那就更是空虚，齷齪和茫然了：“宁肯饿死爷爷娘娘，也要弄个洋烟泡泡抽上”，“房院地土，不如洋烟一口”，“儿孙庆满堂，不如洋烟一口香”。且当抽得骨瘦如柴、精神萎靡、一蹶不振的

时候，还要自我安慰，说什么“人能抽洋烟，赛如活神仙”，所以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甚而把寡妇老母亲卖了也要抽，简直变成一个无情的木石之人了！，怪不得有这样一个史实：某村某人瘾急，央告老婆为他姘一位嫖客挣洋烟过瘾，二人在前炕浪声荡语、缠绵枕席，他一人躺在后炕点着“灯瓜瓜”吸毒，烟瘾过罢，瞠目惊愕，还不解地搭讪道：“嘿嘿！你们就爱个乃（那），我哇就爱个这，那有啥意思”！——这并非笑话，而且不止某君一人，作为当时的社会问题来撰述，故隐其名。不过这总归是使用三等烟具的“烟鬼”，才会出此奇闻，那么二等以上者又如何呢？

他们在尚未自然降级到三等以前算是“瘾士”吧，还多想弄一位金屋藏娇的年轻女人来陪伴，殊不知“老年娶得少年妻，好比空中坐飞机”，身不由己，力不从心，常要借助洋烟的提神作用，却又慨叹“越软越抽，越抽越软”，结果连“娇娃”也给吸毒成瘾，自然也和后生们躺在一起“二合公”或“锅架子”了。于是丑声远播，无法收拾，结发妻趁机攻讦，他总想替小女人辩解，认为“二合公”和“锅架子”都无伤大雅，说是“大伯子咬住小婶子嘴，人只是人鬼只是鬼，没关系的”，原配糟糠一怒之下，也自立牛榻（烟具），另起炉灶，进行分庭抗礼的斗争。由于她能取得儿女和媳妇们的同情和支持，都常到她的烟盘子前送水端饭、烧烟泡、说宽慰，久而久之，便使烟毒在家庭里蔓延开来，沦为“洋罈门弟”，家业丧尽！

为什么本来是一些清廉正直的人，一旦染上嗜好就变成贪官污吏？一些勤劳俭朴的好劳动者，一旦吸毒成瘾就要坑害拐骗？一些冰清玉洁的闺女媳妇，一旦抽起洋烟就作风败坏？一言以蔽之：“烟毒的危害”！记得在四十年前，有一位老“瘾士”曾对我分析过烟毒的魅力，他的这种论点是否正确不必考虑，姑录之以存其说。“头次尝，二次香，三次有意思，四次不离床，上瘾了！”所以，“只要敢抽第一口，就等于有瘾啦！”这对于不吸毒的人来说，毋宁是暮敲晨钟，青天霹雳！他又说：“最主要的是因为洋烟是麻醉剂，有瘾的人不抽它，就感到筋酸、骨酥、头昏和血脉不通，六神无主，所以难以戒除，其次是由于人性憧憬光明，所以烟灯有吸引力，人还好逸恶劳，所以喜欢躺着抽，但人性又爱动，所以手里常用烟杆子、烟挖子有所活动，……总之是不抽不行，烟瘾难除了！”

在土默川被鸦片害得烟瘾难除、身名俱灭、断子绝孙的人俯拾皆是。如把什村的一位大学生，家资富有，他从学校回到家里吸毒上瘾，不几年就一贫如洗，又靠收房租过瘾，后来把一处十八间房子的里外院，连同室内衣物等也拍卖尽光，最后把老婆孩子也卖了。公布村有两位小知识分子，蔡某曾领上老婆到包头定襄巷去操皮肉生涯。苏某是自编自打的“莲花络”沿村乞讨，国民党“抓兵”时，他两次靠出卖壮丁的钱抽洋烟。大岱村的郭秃小，卖光房地卖老婆，最后自己也卖了壮丁。五甲桥姜某，长子与次子跑到王靖国的七十师当了兵，

死了一个，他先卖三子，次卖老婆，最后卖四子，自己孑然一身，靠乞讨偷盗聊度残年，也没有把烟瘾戒掉。张博文老汉幼年饱读四书五经，后来吸毒成瘾，他和老伴抽，房院卖尽，流浪寄居，闺女因婆家抽光走“活人妻”，他还去给写卖身契，挣写契钱，长子虽然不抽，但因被他们所累，终生没有娶上女人。口肯板申的云某，因年轻吸毒，诸伯父怕跟上他把祖产“踢跬”光了，竟把他活活勒死。总之，类似上述例子，土默川的所属各村，村村都有，不胜枚举！

据《土默特文档》残存的一折一九五〇年萨县第五区（现土左旗善岱乡）烟民统计表所列，“全区各村男女烟民共有一千二百人”，但这个统计表的数字，显然是登记时群众思想有顾虑，或者是认识到吸毒不光彩，而隐瞒缩小了几倍的数字，并不可信，因为从当时把什村吸毒的蒙胞，竟占全村蒙胞人数的百分之八十这一事实，就可以证明，另据毕克齐的老人们谈：“日伪时期，毕克齐遍地是烟苗，人们连粮食都不种了，吃粮必须到后山（指武川）、旗下营等地用洋烟交换，当时抽大烟的人有一半多，好人抽成病人，病人抽成死人，……”。足见土默川在日伪时期的烟毒危害，是何等的深重！

烟毒的危害还不止于此。一些年轻夫妇因为口角争吵，一些未嫁闺女由于婚姻不能自主，往往用自己“拾毛”攒下的“体体烟”自杀，媳妇扔下孩子，造成家庭不幸，闺女一死了之，父母遗憾终生。抽洋烟的妇女，

招致子宫萎缩，不易受精，即便生育，也须在分娩后就给婴儿口对口喷洋烟，孩子才能睡稳，叫作“胎瘾”。

但不要误为吸毒的人老是无精打采，懒得问事的，除了等外洋罨和个别“嘿嘿”某君而外，他们什么“弦股股也爱弹”，青年男女头顶头面对面地抽足以后，还好喝两盅酒，爱打八圈麻将，赌风因之而兴，日久天长的厮混，加上有瘾的“刘媒婆”有意撮合，形成了极不严肃的性关系，而淫风亦炽，故在三风交织的社会里，抽光的人弱者沦为偷盗，强者变成土匪，随时滋扰抢掠，为的就是大烟，有的受雇烟工在割洋烟时，就是怀着摸底“踏盘子”的目的而来的。虎官狼吏，巧取豪夺，无情收刮，所谓“善后”、“罚款”、“督察”、“稽查”、“稽核”云云，无非都是为了洋烟！应该说，土默川人之所以染有嗜好的多，除了前文谈过的那些原因外，与当时政治腐败，时局动乱很有关系，这却有民谣为证。

——民国初年，袁世凯“洪宪”垮台，说是“班儿头（匪首）刁人十几村，总统刁人十几省”。张勋复辟时说是“剃了辫子怕张勋，不剃辫子怕孙文”。进入民国十几年以后，国民军、晋军、奉军、彼来此去，蹂躏斯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人们仍然徘徊在十字路口，无所适从，便以吸毒来麻醉，自我排遣，借慰愁肠，于是又说下“张（作霖）去阎（勒山）来，反正待（得）害”和“守上一盏灯，管他奉军与晋军”的话。日本占领时期，国破山河碎，身家性命朝不他夕，内心

十分苦痛，越发以抽洋烟来消磨岁月，排除忧愤，说是“能抽一天算一天，管他明天不明天”和“与其丢完，不如抽干”，所以男女老少差不多都在抽洋烟了！致使土默川在日本投降之初，除城镇居民稍有格局外，广大农村都是土炕无席、缺鸡断狗、衣不遮体的人家。固然还有其它原因，但也不妨毫不扩大地说，十家就有五家有洋烟灯呐！城市里的旅店、饭馆、妓院，都用大烟灯招徕客人，赵仁甫在包头开设的包头饭店，不仅是旅店、烟市、赌场的联营公司，而且是人们“打野鸡”的安全所在。因此，把一个富饶的土默川变成了一个吸毒的多、嫖寨孤独多，乞丐多、盗匪多的土默川！

十一、禁 令

土默川烟毒的泛滥是在禁令中弥漫成灾的，这是因为历届政府都是些“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的反动政府，所以有禁不止，有令不行，有法不依，愈禁愈放，越染越广。种的、吸的、贩的与日俱增。这无情的历史，对于民国一“朝”衮衮诸公的绥远各位将军、都统、主席们是多大的讽刺和嘲笑！

辛亥革命后，土默特历任总管都曾明令禁烟，并且还规定若干惩处条例，但有的总管和秘书长以及他们的子弟，就是带头的吸毒者，而且抽得很凶。

民国六年（1917年），蔡成勋当绥远都统，春季广种洋烟，夏季铲除烟苗，而且雷厉风行，还成立了“绥

远禁烟总局”，颁发禁烟章程十四条，结果却是虎头蛇尾，逐渐弛禁了。

民国十年，马福祥为绥远都统，先后成立了“军粮局”、“筹餉局”、“清源局”、“禁烟善后局”，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地搜刮民财，激起绥远旅京学生的愤慨，他们以《绥远旅京学会半月刊》为武器，抨击“马儿”苛政虐民诸罪状，招致嫉恨，他后来便利用冯玉祥“首都政变”、曹錕下台、张作霖临时主持北京政局的时机，密电张作霖把还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的旅京学生领袖陈国英（字俊卿）扣捕，押在北京市警察局正要解绥法办时，经同学常斌魁等连夜去找中大校长王正廷和中大董事长冯玉祥立即向张说项，才使马福祥阴谋落空，但亦未能制止其继续作恶，成为最善于“善后”的绥远都统。

民国二十年（1931年）至二十六年间，傅作义先生主政绥远，他对鸦片是“抽税禁烟”的政策。这种按照阎锡山制定的“烟亩罚款”禁烟措施，前文已经说过，就不必从复了。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投降后，傅先生以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兼绥远省主席的身份，号召人们“要有大民国风度”，其中包括具备强壮的身体和新的精神面貌。次年五月二十九日，绥远省政府禁烟督察团赴各旗县督察铲除烟苗，九月十四日，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发布禁烟条例。

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土默特旗政府发布《禁

种罌粟彻底肃清烟毒》法令条文。八月三日，绥远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发布《拒绝烟毒训令》。同年，土默特旗政府也发布了《蒙民私种烟苗铲罚办法纲要》。

与此同时，这种由上而下的禁令，省属各市、县政府，市、县党部，也都三令五申，一再行文，有关“禁种”、“禁运”、“禁吸”、“禁售”的法令条文，规定得多如牛毛，杀气腾腾，甚至会议成灾，文件如蝗，而歪风不息，烟毒仍旧，所以到了民国三十八年，土默川地区却出现了一个大种特种洋烟的局面，其故安在？

——不是用于救济、建设和发展生产，而是因为弥补“反共”内战引起的财政奇绌，是一个主要原因；上梁不正下梁歪是第二个原因，如傅作义先生赖以决疑定计的某高级幕僚，他虽然是回民，却为老“瘾士”，而且是有名的受贿者，某主席某军长的夫人也都是吸毒“能手”，不过还好，他们本人并不抽。至于省、市、县各级参议会议长副议长以及参议员们，不少人都染有嗜好，所以就有“某议长和某议长，一家一杆洋烟枪”的顺口溜；第三，抗战时打游击的一些司令与团连长，有的吸毒，有的虽然不抽，却利用职权倒弄大烟黄金，收编的伪蒙古军、伪绥西联军的官兵多数吸毒，为禁令所难禁。这些收编的伪军官兵是烫洋烟的，俗称“坐飞机”，因办法简便省烟，就被推广了，后来就兴出“傅作义的飞机不大，灶火吞昆蹲的两架”，其实，傅作义嫡系部队的官兵，一直是不敢抽。烫洋烟的，纪律也比较维持得好些。

日本投降后的禁烟决心，虽然因为上述原因不能成为事实，但禁烟的职能机构，也绝不是吃素的，他们对于他们认为的“贱民”是毫不手软的。所以又出现了“烟犯告烟犯，烟犯抓烟犯，烟犯审烟犯，烟犯判烟犯，烟犯崩烟犯，烟犯越大越不犯”的民谣。不过也有刀下留人的时候，例如土默特旗的毛耗子，他因贩毒被绥远保安司令部扣起来，要在上午执行枪决的布告已经贴在街头，碰巧殷石麟（现政协土左旗委员），因公由旧城去新城偶尔看见，他不去新城急步去找荣祥总管，给傅作义一个电话起死回生，要了出来。但在绥远“九、一九”起义前夕，归绥市一位无业游民的“洋罨”瘾得发急，在夜间偷摘了马路照明电灯泡一个想换洋烟烫，被人抓获后，竟以“窃一灯泡，黑暗全市”（当时见报）的罪名枪毙了！这除了草菅人命外别无其他解释吧？可见在法律面前如果不能人人平等的话，这个法律不仅是一纸空文，而且还是“越大越不犯”的活恶依据！无怪乎在一九四九年的土默川要大种特种洋烟呢？

十二、轶闻

烟毒笼罩土默川大地，土默川人深受其害，民国一代的绥远各届政府，都对它采取了大同小异的做法和巧拙不一的手段，使它象瘟疫般的魔力，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就在鸦片肆虐与抗拒烟毒的斗争中，发生过不少趣事轶闻，流传下来，聊书数则，以博一粲。

大岱村有一位名叫赵英的清末老秀才，他愤世嫉俗，好为讥时之谈，就摹仿刘禹锡的《陋室铭》，写了一篇《烟室铭》，以讽刺抽洋烟的人。文曰：房不在高，有人则名，灯不在好，有油则灵，斯是烟室，唯鬼得心。苔痕舍间绿，菜色入脸青，谈笑尽烟友，往来无壮丁，可以调疏亲，阅近景（后三字语意似欠明确，也许我记错了）。无生计之乱耳，无国事之劳心，烟鬼云：“何怕之有！”

更生动的是流行歌曲《买糖戒烟歌》。这首歌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流传全国，波及土默川，歌词云：烟盘儿富丽烟泡儿黄，烟斗儿精致烟味儿香，断送了多少好时光，改变了多少人模样！牙如漆，口咸方，背如弓，肩相伤，眼泪鼻涕随时淌！你快快吹灭了迷魂的灯，你快快放下自杀的枪，换一换口味来买块糖，谁甜谁苦自己来尝，买糖呀买糖！

察素齐的潘秀俭，毕业于归绥中学堂，这一学历在当时知识分子少的绥远是相当可以的。但因酷嗜鸦片，懒于任事，就呆在家里躺在双亲面前抽洋烟，父母常常叨咕他是赖儿，不如哥哥那样光宗耀祖的好儿。他虽觉得很不耐烦，但只要到街上“喝茶”时，总要端回四盘稍美给双亲吃，并说：“爸（念哒）！妈！你们一天价说是好儿好，俺哥倒好，你们想见一面还见不上，我倒赖，还能给你们端回四盘稍美来，吃去吧！”他的哥哥潘秀仁已是绥远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兼省政府委员和教育厅长，也想督促他戒掉烟瘾，好给安排工作，于是有

一天就正色地问弟弟：“你这洋烟还抽哩吧？”潘秀俭也正色地答道：“哼！我这洋烟还，抽点行，不抽亦不行！”因为他把“不”字说得又短促又低，而且也违反语言逻辑，连一向庄重的潘秀仁也差点逗笑。从此以后，土默川地区抽洋烟的人，都喜欢用潘秀俭这句“抽点行，不抽亦不行”的话为自己辩解，成为名人名言了。

潘秀俭于一九三五年病死，归绥县人国民党中央委员李正乐（字子绍）写了一副挽联概括他的一生，文曰：“两句名言传塞外烟瘾难除，抽点行，不抽亦不行；四盘稍美奉双亲，孝行可贵，好儿好，赖儿也好”。当时的绥远报纸，曾登载发表，传为轶事名联，不啻烟鬼风流佳话了。

我的同学陈某，出身于“瘾门世家”，萨县才子也。一九四一年，他在后套国立绥中上高中时，虽然是公费读书，但他被烟瘾所累，就自动退学，流浪于陕坝，诸师友把他推荐到某高级小学任教，他在课堂上动员学生讲卫生，要在星期天晒被窝，但晒出的行李竟被人偷走了，后来发觉是此君所为，校方就把他解聘了，遂自拟一联云：“烟累人真个不了，毒害我却又奈何！”即凄然一身，返回敌占区抽洋烟去了。

十三、后 语

土默川的人绝不是甘心堕落、自暴自弃的，不论在

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曾涌现出一大批保家卫国、挽救民族危亡的英雄豪杰，故在烟毒泛滥的同时，一直燃烧着革命斗争的烈火。伟大的马克思洞察机先，他预言“鸦片不曾麻醉中国人，却起了惊醒中国人的作用”，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诞生了，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土默川和全国各地一样，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开元盛世。从一九五〇年起，经过生产建政、减租反霸、土地改革、扫盲扫毒各项政治运动，便彻底肃清了危害土默川人民百年之久的烟毒，而且是真的肃清了！这就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人民政府才能办得到！所以当时的群众就兴奋地说出“退了洋烟禁了赌，蹶起屁股好受苦”的顺口溜，他们赞扬自己的政府彻底肃清了烟毒，使自己身体康复、精力充沛，能安心闹生产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因而由衷地放声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主要参考史籍：《绥远通志稿》、《中国近代史简编》）

（编辑 李林）

我们家的变化

张志炯供稿 张尔杰整理

开头话须说得远一点：自满清王朝入主中原，鞭及外蒙，统一了全国以后，把阿勒坦汗与明王朝建立的马市制度废除，而辟张家口、多伦诺尔、归化城各地为蒙汉贸易中心。河北、山西、山东、陕甘各省的穷苦人，为了发财或避罪及逃荒等原因，大都跑到内蒙古来求生活。我的老祖先便是由于灾年荒旱进入土默川的。

一、 逃荒起家

据我家前辈人口传：远祖是山西省保德州新西化苏塔晋乐都十甲人，那地方地脊民穷，生计艰难，一般人家无不勤劳俭朴，刻苦度日，但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到了乾隆初年，由于遭了旱灾，五谷不收，就连富裕的家庭也不能自饱，贫苦人家就越发不好生活了。他们为了求生，就向口外逃荒。我的老爷爷（曾祖）张金文和他的兄弟张礼文几人，就是在这一时期渡过黄河，逃到准格尔旗落脚的。

起初，因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只是给蒙族奇家（秩名）放牧干苦力。日久天长，由于他们为人实在，也学会些蒙古话，可以交流感情，蒙胞同情他们的境况，对他们印象很好，经常给予方便和照顾。他们也始终保持着克勤克俭的祖传法宝，用积攒下的钱财向奇家买了些土地，也养起些牛羊，开荒垦植，农牧兼营，先后都娶妻生子了。因为他们是拓荒者，他们所住的地方就被人们叫张礼文尧（窑）子。

我老爷爷弟兄和妯娌几人，住在他们的张礼文尧子村，起早贪黑，辛勤劳动，艰苦耕作，经过几年的努力，碰巧天公作美，风调雨顺，光景一天比一天好。到了我的爷爷张有德（乳名永伟）手里，居然富起来了，称得上是牛羊满圈、粮食有余的大人家。因他从小就跟着父辈和堂兄们从事农牧业劳动，练就一套娴熟的农牧业生产技术，他既是守成的人，又是创业的人，致使这个大人家在原有的基础上，越发人财两旺了。

二、成了地主

赶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起义反帝，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逃难西安，兵荒马乱，全国大旱，晋、冀、鲁、豫、陕、甘各省，普遍受灾。我的爷爷和堂兄们商议，利用年馐时候，进入土默川，到了现在土左旗的小三和成、大水圪洞（大水桥）、忻州营三村的交界地带，又买下十来顷半荒地，每年从张礼文尧

子春出秋回，广种薄收地走“跑青牛犊”。因劳动力不够，开始雇些季节短工，因家大业大，季节短工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雇起长工，成为地主。他们的“跑青牛犊”是住在临时搭起的茅庵里食宿的。因为当时随同我的爷爷一块耕种土地的人家，还有一户叫老黄毛的，也有一个茅庵，另一户是我的岳父，叫刘恼不动，也住得一个茅庵房，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地方叫作三座茅庵村。后来，觉得每年“跑青”太不方便，经过弟兄们合计，我的爷爷就和他们分居了。他这一门子迁到三座茅庵另起炉灶，新建房院，直接当起拥有十来顷土地、每年雇工十来个人、能打粮食十万多斤的地主来。

年产十万余斤粮食，对一家地主来说，也不是小数字，除交“皇粮”、“工资开销”和全家十几人的口粮外，还能有不到两万斤的余粮，家大业大，骡马成群，村社官府也要给留点面子。但据比我年龄大的一些老人们传说：“张有德老汉是一个善地主”，他对长工不克扣算账，对穷人不放高利贷，贫苦人家找他求借，没有碰钉子的，甚至少还或不还也就不再要账了，所以能得到劳苦群众的拥护，说他是“救命恩人”。一般地说，“地主都是黑心眼儿”，但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开明态度”呢？这很可能是因受到他的父辈们从保德州逃荒到准格尔旗时，在蒙胞关照下富裕起来的家史有关。

三、过国民军”

民国十五年（1926年），阎锡山和冯玉祥两军打起来，人们叫“阎冯大战”，冯被阎打败了，从前线退下十来万军队，兵败如山倒，乱了套，海海漫漫的土默川，到处是散兵游勇。他们村村有、户户住地往后套（现巴盟）西去，这伙刚走，那伙又来，从秋天直到深冬，人吃马喂，支差应事，没完没了地勒索，人们叫“过国民军”。当时我是九虚岁，已经记事了，直到今天还记得一清二楚。如果和现在还活着的一些同时代人偶尔提起当年“过国民军”来，仍然觉得心情紧张。他们除了枪支、服装比土匪齐全以外，再无两样。由于国民军的伙子太大，到处抢劫，使人白天黑夜没有地方躲藏。我爷爷赖以当地主的十几头匹耕作骡马，被一鞭子赶走了，周村的人家也大多如此。俗话说：“煮饭没有米，种地断了腿，啃土不顶饥”，不用说牛犊安落不好，就连长工的工钱和自家的口粮也成了大问题。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年（民国十六年），却又起了土匪，我家和所有土默川地区的人民遭遇一样——过罢兵灾就罹匪祸了。

四、土匪刁枪

土默川的土匪是辛亥革命以后兴起来的，那时候由

于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告独立，绥远将军张绍曾解决了土旗两个陆军营，后又发生了“包头兵变”，达拉特旗的白彦公等部的流散官兵，也先后参加了卢占魁的“独立队”，民国十年（1921年），卢占魁率部去陕西参加了靖国军，没有跟他走的一些人就时隐时现的在土默川和后山（武川、固阳）刁人。到了“过国民军”的时候，潜伏在达拉特旗和萨拉齐县境的这些人，就趁火打劫，大概拧了几百支步枪，到第二年就啸聚成大小不等的匪股，兴风作浪起来，有名的匪首叫周长旺、杨猴小（杨耀峰）、周老二、鄂干粮等。

由于三座茅庵是仅有五户人家的小村子，正是零星土匪出没的理想地方。我爷爷自知名声不小，沦为“危险人物”，就东藏西逃地躲了今天躲不开明天，终于被土匪“请了财神”（绑票）。我的伯、叔父和父亲虽然都跑在外边，但都着了急，尽量卖土地、柴口粮、买洋烟、搬门子、送人情，向土匪联络，好不容易把他赎回来。

当时是反乱年头，谁也不愿意平价买土地，但急于赎回爷爷，只能低价出售。我爷爷在惊恐之余，见他所经营的大地主家庭一下破产，接病带气地攥着两个空拳头离开人间。我的伯、叔父领上家口各奔逃生，我父亲也带上我母亲和妹妹几人离开三座茅庵逃到察素齐镇，先住到我的老姨家。那时候，这家人家也是好人家，叫“和善堂”，就是现在的太平村委会东风巷内。亲戚总不能当自家住，后来，我的父亲又问了一家房子，搬

到西园子村张四德院去，住了几个月。我却有此机会进入察素齐的奶奶庙（现镇机械厂旧址）平民小学校念书，老师是察素齐的王有功和张必茂。

五、我的父亲

我的爷爷张有德勤劳致富，变成了地主，过上剥削生活以后，他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怕自己的儿子不学好，染上少财主的恶习，所以家教很严。他生有四个儿子，除对我的父亲外，都让他们跟着长工务农，希望将来都能抱拢住遗产，作一个以老为实的庄户人，他说“庄户人赚的钱最耐花”。我的父亲讳崇字宗山，乳名三小子，排行老三，自幼聪明好学，为我的爷爷所偏爱，天生性沉默寡言，善交朋友，不喜争逐。他的启蒙老师是鲁三毛，稍长以后就慕名到大岱村赵英先生的书馆里，攻读经史。赵为清末秀才，汉学渊博，但愤世嫉俗，不合时潮，他认为民国是“班儿头刁人十几村，总统刁人十几省”，和“大都督嫌钱少，二都督嫌官小”的黑暗社会，所以教导他的学生们要“学而优则耕”。后来，我父亲考进绥远中学堂，最后，从绥远一中毕业考进北平民国大学。学习一年之后，本人认为没有出息，次年又考入高等警官学校。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毕业于北平高等警官学校正科。这一学历在当时的土默川知识界是相当高的，但因他对于党政军警各项工作都不感兴趣，所以走出校门就回到家里田园自娱了。

前文说过，“过国民军”、土匪刁抢，家庭破产，我父亲带我们“逃反：到察素齐避难。住到第二年（民国十七年），不仅土匪越发多了起来，而且瘟疫和干旱灾情严重，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终于酿成了次年（民国十八年）的特大年馑，饿死的人、逃荒的人、卖儿卖女的人，到处可见。我们在察素齐没有生活来源，不能久住，父亲又把他的家搬回三座茅庵，并和哥弟三人四股分居。所谓分居，也只是每家分了顷二八十亩已经荒芜的土地，我父亲克服了从小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的困难，背朝太阳脸朝地地当起自耕农。

民国十九年（1930年）以后，与我父亲曾在赵英书馆、归绥中学堂都是同学的里素村人陈国英（字俊卿），已经是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委员兼宣传部长和《民国日报》社长，他几次邀请我父亲去协助工作，都被婉言谢绝了。我母劝说道：“省的在家受苦，你去吧！我给你种庄户，你不合心时再回来。”父亲却说：“你不懂得，一旦上了钩就抹不脱了！他们现在是捕杀共产党，共产党是打富济贫、解放劳苦大众的，我不能跟他们去干伤天害理的事，再说侍候人低三下四，不如种地舒服……”。

可是他没有估计到竟然有不让他种地的社会等待着他。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芦沟桥“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很快占领了土默川。国破山河碎，大树，小草也在西北风吹动下颤抖，我们的家苟安偷生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七月间，住在准格尔旗温布壕村的恶

霸地主贾万长，外出收租放帐，来到我们村，看见我大爹张喜种的二十亩好糜子地，是他以活约典给我大爹家的，因此他见财起义，随后到了我大爹家悬行找事。我大爹见事不对，满口好言说：“贾财主有话好说”。他恶狠狠地说：“我今天和你算你典我的活约地帐”。善良的大爹回答：“典你的活约地还不到期。”“你有何证据？”大爹说：“我给你找活约看就知道了”。当把活约交给贾万长手中后，贾万长没说长短，把约撕了个粉碎，便大摇大摆地向外走去。他边走边说：“我要到萨县告你”。不几天，真的衙门传话，让我大爹去赴案，由于弟兄之情，我大爹对我爹说：“三子，你有文化，会说几句，替哥哥赴案吧”。我父亲便起身赴案。谁知“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进不来”。质堂时，出现了所谓当年的见证人鲁三毛，他捏造得有根有叶，活灵活现，我的父亲被伪审讯官拍案训斥，加之，贾万长又给衙门送进去三花轱轮大车扁豆，收买了衙门的大小官吏，案子断为败讼。父亲明白这是贾万长依仗财势，收买鲁三毛（贾鲁是亲戚关系），贿通伪官吏，把二十来亩土地夺走了，一气之下，患了跑肚病，因无钱医治，回家不久就死去了。

六、苦难岁月

我的父亲终年四十四岁，当时母亲四十三岁，我是大儿子十九岁，妹妹十二岁，弟弟六岁，还有我的童养

媳妇二十一岁，由我个人务艺着仅有五十亩土地的庄户，负担着全家五口人的生活。俗话说：“庄户无牛立地死”，我辛勤劳动一年的收获，除交付“红粮”外，不够一家人的吃食，向地主春借一斗，秋还二斗，不借不行，借了还不起，光景一年比一年穷困。再加上日伪政权强迫佩戴“良民证”、“修筑公路”、“挖备战壕”、“烧房并村”等暴政，都依靠伪警察、特务们去执行，横打立骂敲诈勒索，害得人民上气不接下气，吞糠咽菜也不得安生。我被伪警察捆打过，被日本的狼狗咬过，……真是受不尽他们的灰气！

当时在大青山游击的八路军，已有工作人员到我们村活动，我和他们接了头。我村刘保和去延安学习回村后，搞地下工作，我要求跟他帮着干，他说：“这是保密的工作，你虽然还没有学习过，但我信得过”。他就这样答应了。不几天，他被善岱伪警察署扣捕。我要往大青山上跑，我的母亲认为我一走，家庭就拆散了。好不容易熬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政权“光复”以后，我是黑夜偷着种地，白天逃“抓兵”，养活着全家人。这时，我已有了孩子，负担更重了，生活的担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好在“再长的黑夜，也总有个天亮的时候”，一九四九年绥远解放了，我们穷苦人重见了光明。

七、翻身农民

绥远“九、一九”和平解放以后，遵照党中央“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的指示，于次年（1950年）春天开展了生产建政、剿匪肃特、减租反霸运动。我们村成立起农民协会，我担任了文卫委员，同群众一起向地主、恶霸、官僚资产阶级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我也和所有贫、雇农一样，分得了一份胜利果实，成为翻身农民。

“翻身农民万事乐”我的母亲看见她那初出窝的小鸡，也是乐得眉开眼笑的——这位做过地主家庭的儿媳、当过自耕农丈夫的贤内助、贫农儿子的母亲，由于党的恩情，人民政府的关怀，挽救了家庭的拆散，又成了翻身农民家庭的内务总理，她怎能不乐呢？

八、联村供销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四日，在乡人民政府支持下，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解决群众生活、生产困难，动员贫下中农入股投资，建立联村合作供销社。

因六合庄、三和成、十二牛三个乡相距较近，共有自然村十一个，总人口数一千三百五十人，除地富而外，贫下中农是一千二百八十五人，每人入股二元，可

用绿豆、胡麻交款作股，群众踊跃投资，很快就建起了联社，上级拨给生活、生产资料，马上开张营业。

农村供销政策有三，即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生活服务。这就解决了农民在生活、生产上的许多困难，不必托人或亲友去远方城镇进行买卖，挤出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中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我这个仅有初小文化程度的翻身农民，也被吸收到联社里服务，由于党的信任、培养和教育，逐步由一名普通售货员，变成供销联社主任。历任哈素公社供销社、大岱公社供销社主任。最后，由于患心脏病，不能正常坚持工作，加之，响应党的号召，在一九七七年因病退休。而今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由我的一个家发展为五个家，我自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欢度着幸福的晚年。我还常叮咛我的儿孙们，要为建设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不懈的努力和无私的贡献。

（责任编辑 张尔杰）

民国十六七年间在五里桥村

长 城

五甲桥村，现属土左旗只几梁乡，民国十六七年间（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则是萨拉齐善岱区北漳尔村附辖的一个间。全村六姓十七户共约一百二十来人，可耕地平均每人约六亩。由于该村位于后卜尔海子（哈素海）南畔，地形下凹，最多隔两年即被淹没一次，村民就又以渔业维持生活。我的家就在这里，虽不富裕，也还温饱。

可是民国十五年，晋军撵走了国民军之后，不到二年，奉军又赶跑了晋军，次年晋军又回师绥远，逐出晋军。这样一折腾，地方上的土匪遍地多有，起初是苏八音、郭秃子（郭青山）的小股，后来就啸聚成杨白皮、郭干粮等人的大伙子，并统归赵半吊子（赵青山）、杨猴小（杨耀峰）领头，蹂躏绥远大部。

官兵到来须“支差”，土匪出现就刁抢，五甲桥这样的小村子，在劫难逃。兵灾匪祸反复不已，致使社会动乱，人心不安，耕地荒芜，渔业停产，人们开始无米下锅了。特别是民国十七年，雨量稀少，旱情严重，连

后卜尔海子都干涸无水。这一史无前例的灾年，降临在五甲桥村民的头上，真是难以招架。他们有的铤而走险当了土匪，有的弃家出走外地逃荒，有的卖儿卖女卖老婆，拆散了人家。由于大旱是普遍的，所以后卜尔海子的蒲梨梨，都被周村饿民挖绝了根。这个海子真算是宝海，当年的蒲梨梨的确救命不少。

在五甲桥村，不甘饿死被迫“上马”的，有张大恩会、姜二金、姜长金、张威会。大恩会一去不复返。姜二金算是人在够本。张威会刁人后回到家里，有人劝他躲避些，他却说：“该死的×朝天，不该死的活了一天又一天。”次日即被官兵抓走枪毙了。还有张三喇嘛，出门时不巧跟在土匪后面走路，也被剿匪的军队逮住，真土匪远扬，倒把他这个假土匪崩了。

逃荒的计有张八银魁全家五口、张文魁五口、刘兔姓等人。他们沿途乞讨，到了现在的巴盟乌拉特前旗同义隆境内，一天夜晚，黑云夺地，饿罪难熬，无意中碰到一只小羊羔，众人用火烤吃毕，才认清是一个婴尸。张八银魁年老体弱，不久死去。

卖老婆的是张六文、张二羊会、姜四丑。姜四丑更惨，他先卖了二儿子，后卖了三小子，最后又卖了老婆，长子红眼九九，被迫投奔晋军当了兵。至于其他人家，不是由于女婿买老婆得些卖身钱，就是由于年纪青壮，能给民生渠挑渠，以工代赈活出来的，但还是受土匪的危害。民国十八年冬，二十多个土匪又“光临”到我们家一次。

直到民国二十年，傅作义先生主持绥政以后，强调军纪，剿匪安民，绥远才出现了太平景象，五甲桥的人也慢慢恢复了生机。然而，真正的幸福生活还是解放以后。

(上接192页)

梨园谱上的回族演员张富招

土默川上的回族演员张富招(艺名叫钵髯花脸)，生于民国十三年，祖籍察素齐。他自幼酷爱晋剧，专工净角，受益于“八百黑”(张树亭)，演唱技巧日趋全面，凡净行应工戏，皆能演能唱。他演过的剧目有：《二进宫》、《明公断》、《劈殿》等袍袋戏。解放后，他在集宁市晋剧团任花脸演员，吸收“玉眼黑”之长，加以创造，逐步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他的唱腔韵味醇厚、节奏鲜明、字正腔圆，嗓音高亢有力，表演大方、沉着端凝，土默川上颇有名望，被人们誉为第一个回族演员。一九八六年在察素齐逝世。

(编辑赵国恩)

解放前夕归绥县小学教师

加入国民党组织记略

郝希文

一九四六年初，我就在归绥县任教了，一直到解放以后，可以说是土旗的老教员了。过去社会上一些大的变革象暴风雨一样荡涤着我，有些事情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一九四六年、四七年、四八年的暑期，归绥县小学教师集体加入国民党组织的事就是其中的一件。

那时，国民党政府已经腐败堕落，临近末日。归绥县县党部为了收买人心，在政治上一向不理不看的教育界大作文章。他们在一九四六、四七、四八三年内，利用暑期举办小学教师讲习班这一机会（时间一般是两周到三周），竭力发展国民党员。一九四六年是在西茶坊西龙王庙内，人数一百多；四七年在玉泉区剪子巷，人数二百多；四八年在乃莫齐召，人数三百多。教材除教育学、心理学外，就是些反动的政治说教。三期讲学班

都在临结业的最后一周，排有“党团活动”节目。教育科长任报幕员，县党部的大员任指挥，并把已经印好的“入党申请书”象发散“剧情内容”一样发给每个“合唱队员”——小学教师。短暂的静謐过去后，场内的脚步声和“你填了个谁”这五个字的多部合唱声相互交织在一起，乱嘈嘈地响彻了整个庙堂。台上台下一片混乱，人人作弊，答卷雷同。“入党申请书”上的两个介绍人，不是教育科长张克议，就是督学李荣庭，或者是担任合唱队指挥的县党部大员独眼王以印（此人一只眼）。尽管答卷雷同，可那些担任主考的县党部大员们却很满意，因为没有一张白卷，把全县的小学教师都缚在了他的车上。这个节目就这样荒唐可笑地演完了。

戏唱完了，这些小学教师却背上了带有“蒋记”烙印的包袱。解放后，他们在历次运动中都被审查，尤其在“文革”中，这些人大都受批挨整。

痛定思痛，这一“入党儿戏”真是荒唐透顶，贻害众人。

（责任编辑 孙才）

察素齐崇仁小学及天主教

刘 惠 兰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绥远省教育厅厅长潘秀仁倡议天主教在察素齐办一所小学。

一九四六年，天主教会穆清海主教派高若山、白祥司铎与政府和当地名人郝秉玺、吕殿、吕宽协商办学问题。办校商定后，就暂借东龙王庙内空房为校舍，开办了察素齐第一所由天主教会主办的学校——崇仁小学。与此同时，察素齐天主教应运而生。

崇仁小学的校长是创始人高若山，教师有赵雪梅、李茂华、赵玉芳、吕殿。半年后又增派刘惠兰、赵瑞兰到校任教。校方又向长安街东边后街的马、金两家菜农购地六亩多，以备建校。

一九四七年春，学校又调入石俊梅任教，张建闻协助高若山建校。年末，建成两栋教室，共三十间，男、女厕所各一处。天主教教堂建在校舍附近，便于教师们祈祷。学生们可随意参加宗教活动。

一九四八年，崇仁小学全部迁入新校舍，张建闻任教导主任。一九四九年，又调入董秀峰、王贵贞二位老

师。一九五〇年，在校学生已有二百多名，所开设的课程和公立小学一样。那时，学校还设有读报组四处，兼办民校、夜校，这些全在晚上活动。

一九五一年，张建闻升任校长。学校先后又调入郭俊峰、高秉伟、韩相明、杨元建、王允、李淑贞等六名教师，学生人数增加到三百多名，学校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同年，旗人民政府对该校进行了改造，一九五二年正式接管，并更名为“察素齐第三小学”（即现在的察素齐二校校址）。当时政府接管学校的主要原因是教会缺乏经费，无力再办。

一九五七年，政府给教会买下房院一处（现东西巷14号）作为天主教聚会地点。教会贞女刘惠兰、李步英、赵雪梅、杜芝兰一直生活在这所院子里。他们将院内东边的一间小屋做为教堂，举行宗教活动。每当圣日或礼拜日，总有许多天主教教友在此聚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土默特左旗第五届委员会 组织概况

一、委员基本情况

本届委员会委员名额九十五名，一次会议实有委员九十四名（空缺一人）。委员各种结构比例：

性别：男79人占84%，女15人占16%。

年龄：平均年龄47.8岁。

民族：少数民族（蒙古、满、壮、回）35人占37.3%，汉族59人占62.7%。

文化：大专35人，中专11人，高中11人，初中以下37人，高中以上知识分子共57人，占委员总数60%。

党与非党：共产党员35人占37.2%，非党59人占62.8%。

二、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委、 委员名单

主席：戴清

副主席：云文俊(蒙) 乌铮(满) 赵仁钦(蒙)
王兆忠 彭皓芳

秘书长：王永常

常务委员：万青林(蒙) 云海(蒙) 王永常
王铎扎木苏(蒙) 王凤岐 王俊华(女)
刘耀 张世杰 苏临
阿吉利沁夫(蒙) 胡志英 曹敏
温秀英(女)

委员：

中国共产党

戴清 云文俊(蒙) 云海(蒙) 赵仁钦(蒙)
王永常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杨占林 杜学华 其其格(蒙,女)

工会

乌云(蒙,女) 王二豆(蒙) 王忠 王战胜
李蓉(满,女) 张德

妇女

王俊华 李粉桃(蒙) 杨光(满)

科学技术界

乌 锋(满) 于 琛 于 航
万青林(蒙) 王 冰 王凤岐 刘 耀 刘 章
李志明 苏 临 张玉亭 杨超 张世杰 周正基
曹 敏 银秀魁 银 勇 段 瑞 颜日才(壮)

教育界

王兆忠 丘谔兴 孙 才 刘 荣(女) 白文秀(蒙)
杨新民 陈铁生 柴永清 (蒙) 荣竹田(蒙)
韩玉清(蒙) 曹金杰 温秀英(女)

农 民

王三厚(蒙) 云喜旦(蒙) 吴国成(回) 张恒生
董挠挠 高老虎 赵玉平 赵金钟(蒙)

宗教界

王铎扎木苏(蒙) 刘月起(回)
朱威子 徐德增

少数民族

云巨才(蒙) 云志升(蒙) 田文贵(满)
白玉梅(回) 阿吉利沁夫(蒙) 康建民(蒙)

文化界

云雪冰(蒙) 杨福正

新闻界

张金阳 胡志英

工商界

云月威(蒙) 张新平 明计然(女) 周 义
鲁继汉

医药卫生界

马增骏 王文珠 吉雅(蒙) 袁效先(女)

三胞界

云凤英(蒙、女) 陈焕然 贾文明 黄美珍(女)

彭皓芳(女) 赵五秋

特邀

白贞(回) 苏日娜(蒙、女) 张尔杰 张来换

张洪礼 银振华 殷石麟(蒙) 谢洪武 熊文莹

三、各委员会、工作组负责人名单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彭皓芳(兼)

副主任：王永常 万青林

委员：胡志英 孙才 殷石麟 白贞 陈铁生

张尔杰

学习委员会

主任：王兆忠(兼)

副主任：王俊华 王二豆

委员：其其格 张金阳

提案委员会

主任：乌铮(兼)

副主任：云志升

委员：张玉亭 白玉梅 云巨才

工作组委员会

主任：云文俊(兼)

副主任：乌 铮 赵仁钦 云海

委员：曹敏 李志明 黄美珍 刘 耀 云志升

丘谔兴 张玉亭

工交城建电业组

组长：曹 敏

副组长：鲁继汉 周正基

农牧林水组

组 长：李志明

副组长：张世杰 颜日才

民族宗教组

组 长：云志升

副组长：王铎扎木苏

财贸商供组

组 长：张玉亭

副组长：张新平

文化教育组

组 长：丘谔兴

副组长：孙 才 康健民

医药卫生组

组 长：刘 耀

三胞组

组 长：黄美珍

副组长：陈焕然

丹 津 碑 文

(阳面)

……子加二级溢壮敏丹津碑文

……之勤泽沛朝端国家有酬庸之典矧其久

任边疆初终罔懈溢归泉壤褒恤宜隆尔原

……望属老成心存谨恪由羽林之宿卫晋都

统之崇阶坐镇雄城状金汤于塞上勤修武备

……成劳茂著忽闻俎谢良用軫伤省遗疏而

备悉悃忱情词堪悯考寻章而宏敷渥泽

……勒之贞石于戏松楸在望犹传大树之名琬

琰常垂共识祁连之冢膺兹茂典不亦休欤

……

十日

附注：1、“……”系陷入土内的部分（原碑在“文革”中被推倒在地，文头字无法辑录）。

2、丹津碑现存于牌楼板村丹府坟内。

3、丹津是土默特旗第四代都统，于清·雍正十三年逝世。

4、碑形见本辑附图拓照。

5、碑文中之简化字是因缺繁体字改用之。

乌云辑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土默特文史资料第三辑

作者 =

页数 = 2 5 1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